

中華民族 之 覺醒與反抗 及九步滅共



@那些珍贵老照片：1978年春，北京天安门广场，云南知青要求返城的请愿活动。

中华民族之觉醒与抵抗及九步灭共

现在、世界流行打击中共、消灭中共，不少人却把中国人民当成中共来一起打击，特别是西方一些人，出于无知及文化偏见且对黄种人的鄙视，坚定地把中国人民与中共捆绑在一起，恨不得也把中国人民一起打倒、像消灭印第安人那样消灭。

殊不知，中华文化才是马列主义的天敌，中国人民才是中共的最大敌人，中国人民才是马列主义的最大克星，中国人民天生就是反共的材料。打击中国人民，实质是在帮助中共。把中国人民与中共捆绑在一起，是中共的保命法则，何至于世界某些反共人士的行为也与中共一致？是愚蠢吗？还是共产党地下党的引导？还是西方马列主义者的指使？真的要好好考察，切莫像在二战时及其后期那样愚蠢、那样着了世界共产党者的道。中国人民被中共强奸了，凡是把强奸犯与被强奸者等同看待的，都是强奸犯的同谋。凡是把中国人与中共等同看待的，无论有意无意，都是中共的同谋。

还应该看清楚，中共只是共产主义者的一个支部，共产主义者不灭，马列主义不灭，只灭中共，人类的正义事业还没有获得胜利，还不能高枕无忧，共产主义者真正的毒瘤在马列主义，马列主义不灭，人类依然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而看看世界现在马列主义的泛滥，看看各国大学课堂里马列主义向学生们的传播，这才是马列主义未能被消灭的根本原因。

说中国人天生就是反共的，这话许多人不相信，其实这话才是真理！

看看中国的文化，中国文化没有阶级与阶级斗争，中华文化讲和谐、讲善良，天生就与马列主义相对立。中国从秦始皇统一之后就结束了封建社会，这就是对马列主义的否定。

看看现在世界各国的大学里，热火朝天式传播马列主义病毒。对比马列主义传入中国时的遭遇，真的觉得中国人民很伟大，那么早就看出马列主义是谬论、是病毒，并作剧烈抵抗，甚至中国知识界对马列主义群殴，只因下面五大责任者的糊涂或者是有意作恶，才使中华大地落入中共之手。

请问，世界上有哪个民族与国家对待马列主义，有如中国人民那样抵抗、那样群殴的吗？

看看俄罗斯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马列主义能成功，看看马列主义在日本、在欧洲、在美国所受的欢迎。有人说，那是过去的历史！那么请看现在：看看印度共产党的武装夺取政权的宣言，看看美国大学里左派马列主义教授的超高比例，看看世界各国大学里把马列病毒当成真理地传播。那才是最可怕的，那才是马列主义未倒的原因，那才是中共未倒的原因。由此，我们就能知道中华民族的伟大，知道中国人民的伟大，知道中华文化的伟大！

这里引用林昭对中共说的话：

“老实警告先生们：从个人所历这些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我对于当前政治现实的认识是愈来愈深入本质而接触核心。随着认识的深化每使我从心底深处愕然震惊，但觉寒冷彻骨沉痛欲绝而悲愤无已！这样多的罪恶！——这样污秽！——这样暴虐！——这样酷厉！——这样残忍！——这样恶毒！——这样惨无人道！呵哟！先生们，供职于堂堂中央党报里的可敬的先生们哪！**你们可也曾想过没有？对于已经作下的一切！你们到底准备怎样收场哪？……**

‘当复仇的大地血海潮起，

逐食的鸦群呵何枝可栖？！

……想到一个问题我每打冷噤：

天哪！谁知道你们将来怎么死？……’ ”

……

不说了，看看中国人民的觉醒与抵抗吧！

本来这只是《马克思谬论》中的一章，写着写着，就写成一本书。其实还有许多内容没有写进来。

目录

中华民族之觉醒与抵抗及九步灭共.....	2
目录	4
一、共产党的诛心之恶.....	6
二、中华民国的十大荣耀.....	8
三、中共沦陷大陆的五大责任者.....	11
四、中华文化是马列主义的天敌与克星.....	15
五、马列主义在中国受到知识界的群殴.....	17
六、梁启超对共党“赤祸毒菌”的大痛恨.....	19
1、梁启超的金睛火眼.....	19
2、梁启超反对“赤祸毒菌”毒害中国.....	31
3、文：梁启超对“大革命”的大恐惧.....	36
七、中共在与张东荪的论战中战败.....	45
八、沈定一血脉觉醒从建共先锋到灭共先锋.....	50
九、陈独秀的血脉觉醒令中共恐惧.....	57
十、看清共党就反共党.....	62
十一、1946年全国人民反苏反共运动.....	65
十二、反右前中国知识界对马列主义再次群殴.....	73
附录：揭穿右派分子雷海宗“研究学术”的外衣.....	78
十三、英雄林昭.....	80
附1：林昭十四万言书——《给人民日报部的一封信》摘录.....	83
附2：秋声辞并序——林昭.....	93
附3：狱中短诗几首——林昭.....	93
附4：自诔——林昭.....	94
十四、逃港大反抗.....	95
十五、八九民运是世界共产主义坍塌的开始.....	99
十六、上访大反抗.....	108
十七、律师出版人信仰团体大反抗.....	112
十八、中共穷凶恶极.....	113
十九、中共最怕回忆录.....	116
二十、美国九步可灭中共.....	119
1、光明正大地亮出反共旗号.....	120
2、分开中共与中国人民.....	121
3、分化中共高层与普通党员并精准打击中共高层及抬轿者.....	122
4、推动信息自由化.....	123
5、扩大留学生人数.....	123
6、公布中美关系史.....	124
7、强迫日本公开二战时与中共的交往资料.....	124
8、推动两岸“一国一制”和平统一.....	125
9、解剖马克思理论及辩证法.....	127
廿一、附：中共十九大恶行：分裂民族杀戮人民摧毁文化通敌卖国.....	129
后记	136

版权声明.....	141
-----------	-----

一、共产党的诛心之恶

人，不但从恶有罪，不作为也有罪！

人就是正义的人，匡护正义是人的本分，弃恶从善是人的本分。中国人早就讲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但说明了兴亡与普通人的责任，也激励着普通人站出来不了国家民族与正义而奋斗。中国没有在日本人的侵略下灭亡，也得益于多数人参与了救国之举。

我为什么还说“中共沦陷大陆的五大责任者”，前面三者是作恶之罪，后面二者美国与台湾部分人的罪恶属于不作为之罪。

一直以来，中共通过教育来放大中国人的不作为与平庸之罪，甚至想让中国人达到从恶之罪，中共这样做就是在**诛灭中国人的良心**，这就是中共的诛心之罪。

中共以日本文化中的“识时务者为俊杰”来堕落中国人的道德，想让中国人不计中共历史之罪且不反抗中共。中共甚至还篡改历史、颠倒是非，想让中国人无法知道历史真相、无法知道是非，甚至把中共这个中华民族的罪人当成中华民族的恩人来对待，让中国人成为中共恶徒，最后借用上天之手消灭中国人。中共为了它的生存而在毁灭中华民族、毁灭世界。

中共篡改历史，堕落人民，这是中共在行诛心之恶。中共才是最大的恶魔。

了解大革命历史的人老去，中共就篡改大革命历史欺骗新人，有一大批的人被骗；了解中共勾结日寇破坏抗战的人老去，中共就篡改抗战历史，现在的电影电视剧，天天放中共如何抗战；了解大饥荒、文革历史的人老去，中共又在淡化大饥荒与文革历史，甚至篡改这些历史，为中共抹去罪行、甚至歌功颂德……

中共还伪造谬论，如马列主义、辩证法、一分为二、唯物主义等等，让中国人无法从理论上打破中共的邪恶，从而无法解脱中共布设的困局。这是中共在设置的迷魂阵。

没有了正确的历史观，就相当于蒙住了中国人的双眼；没有正确的理论为依据，就相当于诛灭了中国人的良心。没有良眼与良心，中国人如何能辨别共产党之邪恶？连辨别都无法做到，更不可能摆脱共产党的操纵，就是喝了中共的迷魂汤，迷迷糊糊地从了中共之恶，最后中共借上帝之鞭消灭中国人。因为人应该是正义之人，一旦从恶，都难逃上天的惩罚。

中共篡改历史、伪造谬论，就是对中国人行诛心之恶，蒙住中国人的双眼、诛灭中国人的良心！

中共把中国人诛心之后，就彻底把红色社会变成红色社会监狱，有时比真正的监狱更加恐怖。

著名学者芦苗述说他上山下乡第一天看到的境况：

灭。我终生难忘的，就是下乡进村第一天见到的景象：村头的大树上高高低低地吊满了“阶级敌人”，被革命群众用泡了水的棕绳抽，抽得受害者如陀螺一般地转，鲜血便成圆锥状洒下来，宛如水滴从旋转的雨伞上甩出来一般。另一个永远无法忘记的噩梦镜头，是一对地主夫妇被背靠背捆在一起，中间塞了雷管与炸药，武装民兵用枪逼着他们的儿子上去点燃引线。和这比起来，奥斯维辛的毒气室难道算不得天堂？

第五，纳粹屠杀犹太人，靠的还是一小撮盖世太保，绝大部分

（民兵逼迫地主儿子点燃引线炸死自己的父母）

中国人是最讲亲情的，人恐怖到什么程度才会如此？！连孔子说的：“亲亲相隐”都不存在了。这是多么凶残加恐怖的世界，真是邪教领地。

没错，那阵子绝对没婊子，就连小偷也很少，骗子则基本没有听说过，有的都是正义感塞满胸臆的志士与信徒，而且绝对无人抱怨社会道德滑坡，这恰是令人不寒而栗之处：世上最大的恶，就是作恶者出于神圣的信念去作恶，因而不以为恶，反以为是人间至善。

（芦苗如是说）

芦苗描述他看到文革时对黑五类迫害后的感叹。这就是被中共诛心之后中国人的真实表现——“充满神圣信念去作恶”，这是邪教所表现出来的特征，还不是一般的邪教能做得得到，而是最邪的邪教才能做得得到这一点。可见，马列主义就是最邪的邪教。

中共为了对中国人进行诛心，就剥夺了人民的言论权利。一个恶毒到不让人民说话的政权竟然号称人民政权，中共真是邪恶之极。我始终坚信：一个不让人民说话的政权绝对不是人民政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是中华五千年历史中最邪恶的政权，对内实行愚民与残暴镇压，对外却打着“国际主义”及“领土换政治”的旗号光明正大且奴颜卑骨地出送领土，特别是毛泽东时代送出最多，连高举“国际主义”并号称“世界无产阶级祖国”的苏联都不曾如此送出领土。中共政权不但是中华五千年历史中最邪恶的政权，在全世界范围内、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也是绝无仅有的邪恶与愚蠢，远比苏联政权邪恶与愚蠢，它为什么至今不倒，靠的是它的愚蠢与邪恶。中共政权如此卖国，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埋下无比险恶的元素。

国家及公有制是无法代替个人家族在世界上操控经济的，无法到其他国家投资而不被提防与限制。中共的另一项最大罪恶，是打碎了中国原本较为广泛存在的经济家族，使得中国人的经济能力在世界上处于劣势。看看几百年来，世界经济被控制在几个比较大的家族手中，什么罗斯柴尔德家族、洛克菲勒家族、摩根家族、杜邦家族、阿斯特家族，这个家族那个家族，世界操纵在少数几个家族的手中。中华文化中的血缘凝聚力是其他民族无法相比的，本来就容易形成亲人家

族文化，就容易形成家族经济势力，结果被中共用公有制把这些家族打碎甚至消灭，世界经济落入其他民族的家族手中，中华民族散失这部分能力。中共打碎中国经济家族的行为，为犹太人操控世界经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想借用林昭的话对中共如是说：

“当复仇的大地血海潮起，逐食的鸦群呵何枝可栖？！……想到一个问题我每打冷噤：天哪！谁知道你们将来怎么死？……”（引自《牢狱之花》）

其实，不只是中共，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的共产党国家也都施行了这种诛心之恶！

共产党的诛心之恶，就是想让人民减少反抗。必然是枉作小人！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都在人民的反抗中垮台，中共也时刻在人民的反抗之中！中华民族对马列主义的反抗，更是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时就开始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是在经济崩溃下造成的，而在中国，即使是经济获得巨大的成就，马列主义也会垮台，因为中国人与中华文化天生就是反马列主义的。

二、中华民国的十大荣耀

中华民国的十大荣耀中共与后来国无法完整继承。

中华民国的十大荣耀：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中日战争战胜国，联合国四大发起国，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亚洲及中国 2000 年历史中第一个共和国（共和制之国），亚洲及中国 3000 年历史中第一个民国，废除中国所有的不平等条约之国，把台湾从黑暗的日本殖民统治下解救出来，守住并建设台湾为民主基地免遭马列病毒的荼毒。

中华民国结束了 2000 年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制度，从独裁、腐朽、堕落、崩溃、灭顶之灾的大清国中站起来，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统一了中国，阻止了俄国的黄俄计划，获得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付出惨痛的代价打败了侵略中国的军事强国日本，阻止了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对世界的危害，解除了列强对中国的所有不平等条约，结束了世界列强百年来对中国的欺侮，让中国人真正地站起来，也把台湾从日本水深火热的殖民统治中解救出来，坚持反共、守住台湾不受共产主义荼毒，把台湾变成民主堡垒、反共基地，把资源缺乏的台湾建设成富裕的台湾。

中华民国所经历的是中华五千年历史中最艰难困苦时期，中华民国扛过了中华民族灭亡的危险，在最艰难的时刻战胜了凶残的日本法西斯，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中最伟大功勋和最辉煌的业绩。有一个美国历史学家说过：“如果不是国民党在内战中战败，如果不是国民党逃到台湾，那么全世界的历史学家都会以无比崇敬的心情，歌颂中华民国的抗战。”（辛灏年演讲）。可见，中华民国的抗战史是人类历史的最辉煌之篇章。

中华民国对中华民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人类的正义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华民国是中华民族的功臣，是人类的功臣，光芒四射。真正的中国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光芒四射。

中华民国在败坏的大清国之中站立起来，在那么艰难的情形下，还大师倍出，人才济济，经济腾飞。不是中共为夺权而搞暴乱、不是日本无耻的侵略而打断，中华民国早就是世界上最强的国，是王者归来之国！

更改国号就会阻断历史，就会湮灭这些牺牲、业绩和功勋，就是在毁灭中华民族和人类文明史。因此凡是倡议更改中华民国国号者，应以汉奸罪论处，应以反人类罪论处，绝不宽宥。

世界上没有一个其他国家同时具备这么多的荣耀，看看，中华民国多么光芒四射吧！要是更改国号，这些荣耀会全部丧失，只是继承下“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位置。

中华民国的这十大荣耀，中共之国一个都没有，新的国号也不会有。

特别是“守住并建设台湾为民主基地免遭马列病毒的荼毒”这一个非常了不起，让中华民国成为世界民主标杆、民主示范地。现在的世界还被马列病毒所荼毒，美国被安提法等共产主义者扰乱，美洲的委内瑞拉被社会主义者所占领，欧洲也被共产主义思潮侵蚀，而在台湾，除了一些台独者在使用马克思理论外，马列病毒已经没有市场了。

国号优劣表

比较项目	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其它国号
名正言顺性	+100, 最优	+40, 很差	+60, 一般
国际法中的继承问题	+100, 最优	+50, 很差	+30, 最差
处理与日本的关系	+100, 最优	+50, 很差	+30, 最差
对民族与世界的贡献	+100, 最优	-100, 最差	0, 无功无过
解决国内民族矛盾	+100, 最优	-60, 最差	+50, 一般
谁有资格协统一	+100, 最优	-100, 最差	+40, 一般
总分	+600 相当于100制的 100分 大满贯	-120 相当于100制的 -20分 负值, 最差	+210 相当于100制的 35分 不及格

联合国宪章中白纸黑字写着：第一位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华民国。如果用新国号，就存在衔接问题。联合国不可能为此修改宪章。

由于“中华民国”现在还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法继承“中华民国”。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坐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位置上是不正当的、是盗坐。这也是中共为什么那么焦急地想灭掉中华民国的深层原因——想继承中华民国的一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加入联合国的时候，打出“重返联合国”的旗帜，也只是蒙骗中国人的。

如果中华民国不存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可以继承中华民国，作为继承国坐正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位置，但是中华民国的荣耀无法继承。

继承只能继承位置不能继承荣耀。你绝对不能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打败日本国”，只能说：“中国是二战战胜国”、“中华民国是二战战胜国”、“中国打败日本”。但是，清朝也是中国，“日本也打败过中国”。如果不改国号，现在的中国——中华民国就是打败过你现在的日本国的国家，你得尊敬点。日本人出于对胜利者的尊敬，不敢再图谋不轨，我们不用再时时提防。

虽然秦始皇与秦二世都是秦朝皇帝（位置继承），但只听说过“秦始皇统一中国”，没听说过“秦二世统一中国”吧？谁的荣耀就是谁的，别人不能拿走。一旦国号更改，这些荣耀都丧失。我们无缘无故为什么要失去这些荣耀？傻吗？

皇位可以继承，荣耀谁的就是谁的，你祖上的荣耀不是你的荣耀。要明白：你的祖上与你不是同一个生命，而且当你的祖上是被你搞死的时候，人民更加无法原谅。国家这个长命千岁的东西，换了国号，就形成巨大的断层，就相当那个国家灭了，在中国就是那个朝代灭了，那些荣耀只能沾一点光，不能全盘收走。就像阿Q一样，只能高喊：“我祖上阔过”。越是这样人家越看不起，阿Q越喊“我祖上阔过”人家越鄙视。当阿Q被人家鄙视时，他最恨的是搞穷家族的人。当中国人被人家鄙视时，最恨的也是灭掉荣耀之国的人。必然有人会问：“既然中华民国有那么多的荣耀、那么好，为什么把它灭了？谁把它灭的？”这个问题如何向后代交待？改换国号的人无疑就是历史的罪人。

然而，后面的政权绝对不愿意把被它所推翻的政权作为光荣的楷模，不但不愿意继承它的荣耀，反过来把它搞臭。清朝说明朝如何腐败，明朝说元朝如何残暴，都是说前朝如何地坏、如何臭，它自己是替天行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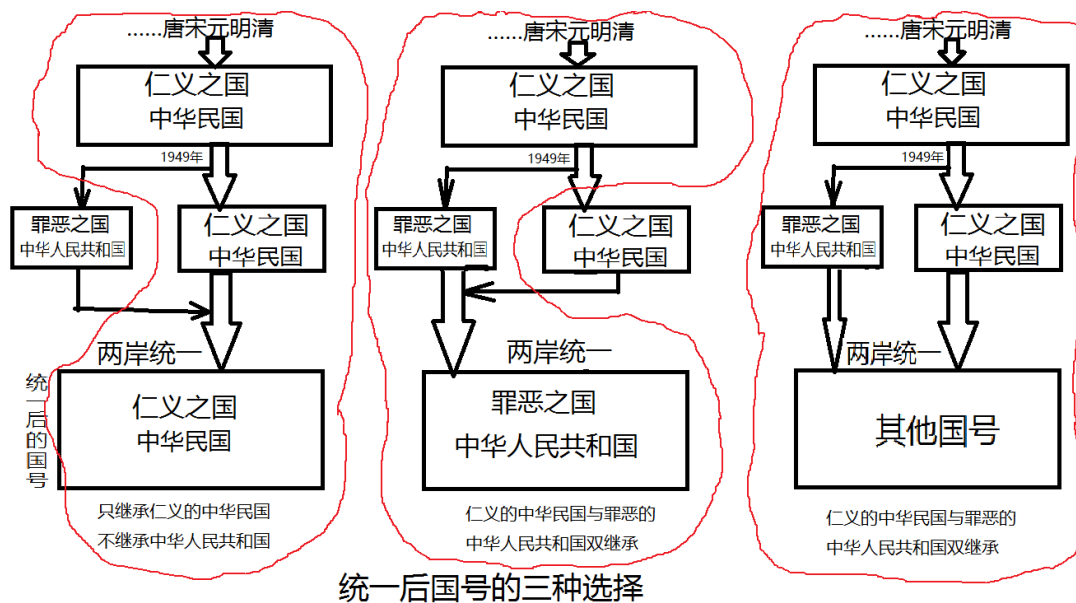
共产党为了说明它抢夺政权的合理性，就篡改历史编造谎言，把中华民国污蔑成“万恶的旧社会”、将国民党污蔑成腐败透顶，并将中国伟大的抗日进行彻底的污蔑，把抗战的功劳归为它的身上。可见，中共不只是极端贬低中华民国，也是在极端贬低中国的历史。

将来，如果还用中共的国号，为了说明换国号的合理性，还会继续篡改历史、继续网络封锁，继续编造谎言，最后必然放弃甚至掩盖中华民国的荣耀，这就相当于中国人自我阉割。对了解这段历史又有良心的人来说，非常痛苦。现在是网络时代，全球化越来越广泛，谎言终有破裂的那一天，届时我们如何面对世人？如何面对后代？

中共国是奴隶社会，还开展了杀戮中国人、消灭中国文化的各种运动，最少杀了 8000 万中国人。中共国随着中共干下了诸多罪恶滔天的恶行。如果继续使用中共国的国号，就得承担其罪恶。

两岸统一，最好是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中华民国这些荣耀，在全世界都是极其罕见的，根本就没有任何其它国家同时具有。中华民国的这十大荣耀，中共之国一个都没有，新的国号也不会有。

所以，只有中华民国才有资格统一两岸，并延续中华民国的种种荣耀。如果国号更改，便截断历史，就会丧失上述的光芒，将来中国的历史不再那么辉煌，在世界上的地位也会自我矮小，对中日关系的处理增加难度和变数。中华民国才是正统，才有资格统一中国。



第一种选择才是最佳选择。用中华民国的国号与宪法统一两岸，对中华民族才最有利。

三、中共沦陷大陆的五大责任者

在中共沦陷大陆这场战争中的主要五大责任者：

一是中共党徒，1949年时中共大约有200万党徒及几百万军人，中了马列主义的魔咒，传播马列病毒，并且暴力夺权。这些人只占当时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一不到百分之二。

二是俄罗斯民族，俄罗斯人把错漏百出的马列主义到处传播，并且大力、大金钱、大量武器援助中共。中国内战时，苏联转给中共34亿（也有40亿之说）美金的二战美援剩余武器，加上80万关东军的武器，和日本在东北武器库里的武器（比80万关东军的武器还多），并把20万日本战俘编入林彪部队，使得共军的战力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苏联甚至用军舰大量运武器至山东威海交给共军，都是中共夺政的最大原因。二战时，美国仅援助国民政府8.45亿美金的武器。美国政府还在内战的最关键时刻，对中华民国进行武器禁运。中共从苏联获得的武器才是最大的胜算，“小米加步枪”是骗人的。

三是日本民族，他们为实现八紘一字统治世界，把中国打伤，才使得中共有机可乘。特别是一号作战，既消耗了日本的国力，又把东北挪空让苏联容易得手，还消耗了国军兵力为共军开辟出大片江山，实在是为中共打的仗，真是愚蠢至极。内战时有20万日本战俘编入林彪部队，为中共夺取江山作出巨大且不可磨灭的贡献！日本民族是中共的帮凶及打手。这也是毛泽东多次感谢日本侵略军、邀请侵略军的将军们回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原因。

四是美国国家，美国人过分天真，看不懂马列主义的邪恶，放弃了他们应该站在正义立场的责任与义务，纵容中共。而且惯于无知、傲慢与粗暴的美国人，1943年拒绝了国民政府贷款10亿美金的请求，并拖延了机场建设费用的支付及中国购买的黄金运送中国，导致中国的经济崩溃，为后来中共夺取江山增添筹码。日军进行一号作战时，史迪威为争权暗使中国失利。内战时，美国

政府阻止国军收复东北，使得共军有喘息与壮大之机。美国政府还在内战的最关键时刻，对中华民国进行武器禁运。

五是台湾人，想在国共内战中中立，没有站在应该站立的反共卫国立场，没有参加反共的中华民国国军。中华民国各个省都有很多人参加国军抗击共军，只有台湾例外。在正邪较量中，没有中立者，中立就是纵容邪恶。而且台湾人在 1947 年 228 暴乱中胡乱杀害大陆人及中华民国政府工作人员（参见《金剑：通共媚日的二二八 可怜的外省同胞》），致使国民党不得以从山东战场抽调部队来台（来台并没有镇压台湾人）。在国共内战中，山东战场是最先失去优势、最先失利，后面就像多米诺效应。

谁出卖了中华民国？谁出卖了中国？蒋介石与中国经常被别人出卖：抗战时被**斯大林出卖**（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被**英国出卖**（曾关闭中缅公路抗战后与中共合作拿到香港），被**史迪威出卖**（使中国在日寇一号作战中失利、曾实施暗杀盟国领袖蒋介石），被**美国出卖**（拒绝中国 10 亿美金贷款、拖延中国购买的黄金运到中国）；内战时被**马歇尔**出卖（阻止追击林彪、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被**赫尔利**出卖（撂挑子就是不负责就是出卖盟友出卖正义），被**杜尔门**出卖（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被**斯大林**出卖（背叛《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支持中共并把东北交给中共）。世界上的豺狼、贼与糊涂人那么多，它们都在出卖中国（中华民国）！这些出卖，每一个都是致命的，中华民国能不败吗？中华民国代表着人类的正义事业，出卖中华民国就是出卖人类自己！

谁出卖了中国（中华民国）？中共及其追随者、苏联、日本、美国、部分台湾人。中共国就是这五大责任者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从另一个角度上说，五大责任者前面三个就是三大施害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共国）不是大陆人民的选择，而是上面五大责任者（其中有台湾人）的选择。中共国是枪杆子里面出的政权，而不是得人心者得来的天下。“得人心者得天下”只是人类的理想状态，不是人类所有的历史事实；日本侵略台湾与东北，难道也是得人心得来的天下吗？哪一块殖民地是得人心得来的？在这场共产主义者沦陷大陆的战斗中，是枪杆子里面出的政权，是上面五大责任者的责任，最无辜的是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大陆普通人民，并且在这场灾难中，大陆人民是最大的受害者而不是施暴者。现在，台湾及国际上的一些人，由于反感共产党而对大陆人民进行歧视，污蔑大陆人民选择了中共，把大陆人民当成中共，把大陆人民推给中共，甚至把反共变成反中，这是极端错误的。那些使中共沦陷大陆的责任者，反过来指责大陆人，是何道理？是中国共产党与马列主义危害了世界，而不是中国人民与中华文化危害世界！连这都看不明白也自称反共，真得查一查其真实面目！这些人的智慧都达不到蒋介石的水平，蒋介石认为，中华文化才能打败并消灭唯物辩证法，共产主义者就是唯物辩证法主义者。说中国强大、富有就威胁世界安全，真是胡说八道。事实是中国（不是中共国）强大世界才安全。只有消灭了中共与马列主义，世界才安全。中华文化就能消灭马列主义，中华文化天生就是马列主义的克星。

把大陆人民与中共合体是中共的保命方略，何至于反共人士也有此心？这再次体现了白人至上主义者的粗暴与无知，甚至是恶毒。黄种人的平均 IQ 值是 106，白种人才 100，祸害世间如此惨烈的马列主义、辩证法、唯物主义、纳粹主义，这些荒唐至极的谬论也都是白人发明的，白人也未必那么智慧高超嘛！杀得人类血流成河、伏尸千里的一战与二战，也都是白人与脱亚入欧的日

本人（假白人）发动的，白人也未必那么至高至大；恶毒的殖民主义制度也是白人与假白人发明甚至长期热衷与实施的，白人也未必那么平等与善良嘛；在相同武器的热兵器战斗中，白种人打不过黄种人！白人至高至上毫无道理！白种人曾经产生过长时期的阶级制度，而中国人根本就极少有阶级制度，中国真正的阶级制度是太平天国，中国的封建社会比西欧的封建制度早一千多年结束，白人至上主义毫无道理！白人文化是酝酿马列主义的土壤，中华文化才是马列主义的天敌，中华文化才是人类未来的希望，凡是迫害中华文化的，都是人类的共同敌人！

生活在自由国家的人民，无法想像信息不自由的邪恶！美国也不是那么乐意看到中共灭亡，如果美国真的那么需要中共灭亡，是很容易实现的！传播本书与《人世间最大的谎言——辩证法》；扒开互联网，还大陆人民信息自由，连大陆的五毛党都会欢迎的，中共就会在大陆人民的反抗下垮台！由于中共的理论太荒谬，中共在历史上做尽了坏事，一旦大陆人民实现信息自由，能进行历史反思、理论反思、文化反思，大陆人民很快就会觉醒，中共就会在大陆人民的反抗中垮台，这场反抗当然包括普通党员都参与。八九民运时，大陆人民才稍为自由一点、稍为历史反思一点，人民（包括普通党员）就反抗中共，中共几乎就崩溃。八九民运，还引发了世界共产主义的崩溃潮，也就是苏联解体、东欧共产党国家垮台，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极大摧毁！

美国如果真正想中共垮台，很容易的。向联合国提议建立信息自由法案：拦截互联网属于一级信息不自由地区，像台湾民进党政府不发牌照给不喜欢的电视台，应该属于三级信息不自由地区。对于三级信息不自由地区提出警告。一级信息不自由地区是流氓政权所为，针对于这种流氓政权就是要整治它。让马斯克的星链向该地区开放，任何人都可以不用账户与金钱上网，所有费用从该政府的外汇储备中扣除，或者美国政府垫付，或者建立信息自由基金，或者向信息自由后获得利益的公司收取一定费用，如谷歌、youtube、ebay等。也应该让 windows、安卓等操作系统抑制拦截系统（如长城防火墙）、流氓软件及其公司其它软件的运行。

并向联合国建议建立世界恶人榜，对于恶人榜上的人物，发全球追捕令，连其子孙也要受牵连，限制或者剥夺其子孙财产。也要追究历史上的恶人。特别要把建立与保护恐怖组织、建设信息不自由制度、恶意篡改历史者都要上榜。像日本的许多历史博物馆的建立者肯定上榜，他们篡改历史歌颂侵略；台湾许多绿营的历史学家和理论家也是走不脱的，因为他们恶毒地篡改了历史。列宁斯大林肯定是在恶人榜首位。建立恶人榜，就是要把许多书生误国、误世界者，钉在历史耻辱架上，警告后人，人类才可能有光明的未来！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人类的堕落是因为有许多人作恶，而有许多人作恶是因为从作恶中得到好处且不受惩罚，一旦看到恶有恶报，人类就导向善良，人类就会有美好的未来。

共产主义是世界性问题，也要提防各国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不但是实践问题而更重要的是理论问题，要彻底打倒共产党，必须彻底解剖其理论，指出其理论的荒谬性，才能彻底打败甚至消灭共产主义。那么在全世界推广金剑的两本书：《马克思谬论》与《人世间最大的谎言——辩证法》，并且继续解剖马列主义，才能在世界范围内消除共产主义的危害。

可以说，228暴乱，是中华民国最终失败于中共的开始，中华民国的失败从台湾开始，使得中华民国与中华民族遭受巨大的挫折，并掉入无底深渊，使

人类的正义事业遭受巨大的失败，至今未得解脱。现在，世界围堵中共，正是台湾人补当年的过错之时，台湾人应该有所正作为。别忘了，第五大责任者是台湾人！而台湾的马列主义者是以蒋中正为首的大陆人消灭的。

中华民族很善良，中华文化很善良，天生就与马列主义相排斥，残暴的马列主义不可能与中华文化相结合。在中华大地上的中共，不可能只通过自身的力量获得政权，没有苏联巨额的军事援助，中共不可能夺取政权。俄罗斯文化与日本文化很残暴，没有外力帮助还是可能获取政权。

蒋中正认为，中华民族是个善良的民族，残暴的马列主义不可能在中国自然获胜。蒋公的认识很对，但是他忽略了苏联、日本、美国的外部因素，也没有想到有毛泽东这样一个如此邪恶之人当中共的领导，于是，中华民族就悲惨了，全世界人民都麻烦了。

马列主义是邪魔魔鬼的恶卒，邪恶与正义的斗争是任何人都不能逃避的，当年，美国政府与台湾人想逃避，结果成了中共沦陷大陆的五大责任者之二。

中华民族是个善良的民族，中国社会自古就没有阶级与阶级斗争，中国的封建社会早西欧一千多年结束，印度的阶级社会到现在都没有真正结束。中华文化与马列文化是完全对立的，马列主义更容易在西欧、俄罗斯、日本、印度这种有阶级社会深深烙印的社会里传播与取得政权。在俄罗斯，马列主义能通过本国马列主义者的力量获得政权，在中国绝对不行，因为中国人善良，因为中华文化与马列主义对立，只有在巨大马列主义外力的作用下，中共才能获得政权。世界上任何一个具备以上五个条件的国家，照样会落入共产主义者的魔爪。其实，日本文化更加接近马列主义，除“八紘一字”与共产主义类似；“慰安、援交”与共产共妻类似，都是淫性文化；日本人的“拜狐拜妖拜怨灵”比无神论更差；日本与共产党社会都是有阶级而无是非，中国人是有是非而无阶级；日本与共产党都是崇尚残暴鄙视生命，而中国是崇尚仁义鄙视残暴珍惜生命；日本其它文化也与马列主义接近。俄罗斯、日本、印度与西欧比中国更容易跌入共产主义的泥淖，因为文化接近，特别是日本。

美国也比中国更容易坠入共产主义的泥淖。

现在美国的大学里，教社会学的、教历史的，左派教授与右派教授的比例是十三比一，这个比例可能比现在中国大陆都高。大陆的许多教授对马列理论很鄙视，不少教授由于反马列主义言论被学生告发，而美国左派教授灌输给学生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那套东西，美国能不向左转吗？美国掉入社会主义的泥淖并非不可能。美国大学里教经济学中，左派教授占七八十；在教技术方面，右派教授也不占主导地位，看看美国的左派与共产主义者多么猖狂。由此可见，白种人的文化与马列文化有天生的相亲性。打败马列主义，还得靠我们中国人与中华文化。

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等学说，在 20 世纪 20 年代传到中国时，当李达、郭沫若挑头创建“有奴论”时，除了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李达等六七个共产党自己的御用史学家外，中国没人相信中国历史上有奴隶社会。对于把人类历史说成是阶级斗争史，史学家们更是深恶痛绝。中共这几个御用史学家被中国的一般史学家们与其他学者的围殴，连中共的祖师爷陈独秀，都撰文否定中国历史上存在奴隶社会，而中国的大史学家更觉得马列主义的幼稚而嗤之以鼻不屑于参与论战。可以肯定地说，马列主义学说在中国的正常论战中已经战败。

批判马列与辩证法最严厉的张东荪，他说：“把马克思主义列为学说，乃人

类之奇耻，是思想史上的大污点。”“如有人要我在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二者当中选择其一，我就会觉得这无异于选择枪毙与绞刑”。还没到打右派就被弄起来，把他一直关到死，连累到他的几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儿女，死伤惨重。

就算如此，一直到打右派前的大鸣大放，史学家们又趁机大力围殴中共御用史学家。中共对这些史学家进行迫害，用暴力结束了这场在中国旷日持久的史学大论战。马克思的这些谬论最后只能靠暴力来推行。谬论总是与暴力同在。

可见，马列理论在中国是不能自然发展起来的，因为，中华文化与马列主义是对立的，马列主义的党更不可能自然的通过自身获取政权。

毛泽东死后，大陆学者继续不间断斗争、继续批判马列主义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现在，这个“五阶段论”在大陆已经被否定，学者们连“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这两个名词都不用在中国历史的身上。马列主义在中国已经处于半破产状态。

八九民运，就是中国人对共产党的巨大反抗，虽然被残酷镇压下去了，但是，鼓励了世界反共事业，紧接着，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共产主义从此走上了下坡路。

现代人的文化，创立了马列主义、辩证法这两种邪恶至极的理论，至今还津津有味地在传播着。世界上有四大恶魔组织：纳粹、马列主义、八紘一宇、ISIS，其中纳粹与马列主义都是白种人文化孕育出来的，真不能过分相信白人创立的现代文化了。

在这场中共沦陷大陆、祸害中国及世界的巨大罪恶中，中华民族是最大的受害者、受难者，不是施暴者和责任者，而真正的责任者是上面所列出的五大责任者。在消灭中共的时候，任何人不能对中华民族进行迫害，否则，就是中共的同谋者。

厘清责任，是为了更准确地追责，和更准确作出行动。特别可恶的是，某些责任者反而把责任推给中国人民，现在，他们围攻中国，他们反中而不直接反共。如这五大责任者中的美国政客、日本侵略者（极右势力）、台独者，甚至俄罗斯民族，当年就是他们帮助了中共，现在，他们把火力对准中国人民，甚至想把中国人民推入中共阵营，他们这样做其实是在帮助中共，这是中共保命法则，何至于反共阵营在实践？如此拙劣的行为，不得不令人警觉，或许他们就是中共的同路人！**记住：中华民族是马列主义的天敌，分清中共与中国人民才能真正的反共，凡是打击中华民族或者把中国人民往中共阵营里推送的都是共产党的同路人！**

四、中华文化是马列主义的天敌与克星

前面讲了许多有关文化的东西，就是想让大家明白：中华文化是马列主义的天敌，也是马列主义的克星，中华文化一定会克死马列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化的代表与最高级的表现，它也一直在学校的课堂里流毒。辩证法的两大规律——矛盾律与否定之否定，宣扬的是斗争真理论与革命真理论。马列主义是在辩证法的基础上诞生的，它是阶级文化与斗争文化，日本文化与印度文化也是如此，讲阶级、讲斗争，号称“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动力”这个谬论，也就是鼓吹“家斗万事兴”这种谬论。

中华文化是和谐文化，是平等文化，是仁义文化，没有阶级，号召和谐，

摒弃斗争，宣扬的是“家和万事兴”这个真理。从前面那章节就可以看到这些文化一直在中华大地上践行着。

人类的科技越来越先进，个人做坏事的能力越来越强。做好事的能力也越来越强，但是，做好事是无法消除做坏事的。人类只有善良、只有道德高尚，才能消除做坏事，所以，只有道德才能救世界，只有道德才能让人类长命百岁。划分阶级、搞斗争，必然产生并增加仇恨，仇恨是最大的堕落，仇恨无异于把人类推向灭亡。大家想一想，不久的将来，个人或者小团体也能制造核武器、病毒，或者更高级杀人武器的时候，一个人或者一个小团体的仇恨，就能把整个人类毁灭。西方文化讲阶级，讲斗争，讲唯一；中华文化讲平等，讲和谐，讲仁义，讲包容，讲多元。中国历史上很少有民族压迫，没有阶级压迫、没有宗教压迫与宗教战争。中国人的这种模式，是人类未来不得不选择的唯一模式。中国连学说都不定于一尊，而是诸子百家，除了独尊儒术，还有道家、佛家、墨家、法家、兵家、侠义道、阴阳家……各种学说没有被除掉，依然也有生存空间，甚至还在大放异彩。

人是善恶同在的，善是人的佛性，也就是人的神性、仙性，恶就是人的魔性。人类的教育、宗教、文化，都应该放大人的佛性抑制人的魔性。凡是抑制人的恶性、放大人的善性，就是正教；凡是放纵人的魔性，缩减人的善性都是邪教。

放纵人类的欲望是放大人的魔性的主要手段。要人类堕落，最好的办法是让人类自己堕落，从放纵人类的欲望开始，过度放纵就会魔性发作，就会堕落。马列主义与其它邪教都是引诱人类放纵欲望与仇恨，并告诉人们，全世界的人都是堕落的、古今中外的人都是堕落的，让人类看不到希望被迫“从众”而堕落。人类的堕落就使得人类自我毁灭。

马列主义是编造谎言、煽动仇恨、鼓吹暴力，就是想尽一切办法释放人性之恶，而且是魔性中最邪恶的那部分——仇恨，释放魔性出来搞乱人间、杀戮人间，最后达到毁灭人类目的，什么马列理论、什么阶级仇恨只是为编造仇恨理由而编造的借口而已，只要相信了就上当了。正是这个原因，以致马列主义所到之处无不是血流成河、尸横遍野、天怒人怨。

所谓马克思理论、马列主义，做的就是这件事——让人类自我毁灭，而毁灭的第一步就是放纵，放纵人类的欲望、放大人类的仇恨。这也是所有的邪教组织的共同步骤，只不过一般的邪教没有马列主义这么明目张胆，没有马列主义这么理直气壮，没有马列主义编造得看似合理合情，也就是没有马列主义这么邪。马列主义不但引诱人类自我毁灭，还教育人类在相互斗争中自我加速毁灭。

马列主义及许多邪教为什么会仇恨中华文化及中国人呢？因为中华文化是神传文化，是修炼文化，不但教人向善、爱惜生命，也是教人自我约束、自我纯洁、自我圣洁，走的是放纵与堕落的相反方向，从而达到神的标准，最后成神。而放纵是马列主义及所有邪教走的第一步，变成魔鬼的第一步，约束便成了它们最需要破除的东西，最后因仇视约束而欲毁灭之，自然就仇恨上教人自我约束的中华文化。另外，中华文化宣扬仁义、教人向善，也是以煽动仇恨为主体的马列主义及所有邪教所惧怕与仇恨的，所以，马列主义及所有邪教仇恨中华文化是它的天性使然！

马列主义天生就是中华文化的敌人。马列主义及其它邪教从仇恨中华文化，发展到仇恨承载中华文化的中国人，这是它的邪教本质使然。这就是毛泽东为什么要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消灭中华文化、搞大饥荒消灭中国人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共搞计划生育消灭中国人的根本原因，都是马列主义者的邪教使命。毛泽东

年代，就是马列主义在中国最盛行的年代，也是中华五千年历史中最黑暗的年代，就是万恶的旧社会，也是奴隶社会，普通民众都是奴隶，真的是吃不起茶叶蛋、吃不起酱油、厕所没门，而黑五类就是连贱奴都不如的、为恐吓其他奴隶的待宰人牲。现在的中共并未退掉马列主义的外衣，并未清除马列主义的内核，还是马列主义的党，只是搞了修正主义而已；现在的大陆，是半奴隶社会，连人类的最基本权利——言论权信仰权生育权都没有，还在歌颂邪教教主毛泽东，随时都可能恢复毛泽东的那一套。

中华民族才是马列主义的最大受害者，中华文化才是马列主义的天敌，中华民族才是消灭马列主义的最大最中坚力量。凡是把中国与中共等同看待的，凡是把中华文化与马列主义等同看待的，都是十分可疑的，也是中共最希望做的，也是中共的保命之术。

中华文化是马列主义的天敌。所以，凡是祸害中华文化的都是可疑的。

有的人骂共产党，看到中共没有倒台，就把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相连，认为是中华文化与共产党有相亲性，还认为中国人的奴性重。其实这都是错误的，也是中共有意伪造的假答案。

事实上是中华文化与马列主义有天生的相克性，中国人的造反精神最发达。中华文化的核心是儒家，而儒家却是造反精神的教导者。孔子说“君君臣臣”，就是说：“作君的要像君那样，作臣子的要像臣子那样”，这句话其实是约束君王的。如果“君不像君那样”，那么“作臣子的也可以不像臣子那样”而造反。儒家的亚圣孟子更加直接鼓励造反。孟子的影响比孔子更大，所以中国历史就是一部造反的历史。看看，中国几千年来干掉了多少皇帝与王朝，在中国，当皇帝是最不好当的职业，短命、劳累、被杀与被囚概率很高。

中共就想把中共与中国人民捆绑，从而达到续命，这是中共续命原则。现在有人把本应反共的事业变成反中，实在是在帮助中共。就如某个时候的台湾政府，把本应反共保台变成反中保台，这正是中共想要的，他们的行为十分可疑。

有的人反马列主义、反共产党、反中国共产党，也趁机反中、反中国人民、反中华文化，这实在是糊涂，还不如趁机反西方文化、反日本文化、反印度文化好了，那种阶级文化才是马列主义的来源地。

其实，把中国与中共捆绑，把中共党员与中国人民捆绑，这是中共拼了命都要做的事情，这是中共保命的唯一策略。所以，凡是把中国与中共一样看待、把中共党员与中国人民一样看待的，无论其面目如何表现得反共，都可能是中共的同路人，是在为中共保命。

其它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国家，它们的垮台是因为经济崩溃导致的。我始终相信：在中国，即使是经济高速发展、中共很富有，中共也会垮台，因为中华文化是马列主义的天敌与克星！

五、马列主义在中国受到知识界的群殴

中华民族是个非常崇尚历史的民族，中国古代只有文科没有理工科，读书人从小读书就是读《四书五经》和相关的文学与历史，对历史研究的人很多，有些人在世界上都有影响，马克思的那套歪理在中国难以自然而然地推行。

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等学说，在 20 世纪 20 年代传到中国时，就受到中国史学界的强烈批判，中国史学界一齐并且一直抵制中共御用史学家的马列

史观，一直到中共上台前，都是如此。马列主义者在中国的文人社会里，几乎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中国文人集体抵制马列主义，这在世界史上是绝对少见的，在共产党历史上更是绝无仅有的。一些开始相信马列主义的青年人，有不少也觉醒，反对马列主义及共产党。在国民党对付中共的机构里，几乎都是共产党的叛徒在操作。

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之时，多数知识分子，特别是著名的、年龄大的、中华文化深厚的知识分子，对马列主义嗤之以鼻，当时在中国产生了对马列主义巨大的批判潮，只有寥寥可数的七、八个中共的御用文人信赖马列主义。在清华北大，也只有在学术上没什么成就的李大钊、陈独秀相信与传播马列主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国学导师都是我国近代最杰出的学者，都是马列主义的反对者，甚至不屑于批判。国学大师王国维的自杀也与马列主义的传播有关，不愿意被马列主义者污辱。陈寅恪说：“我在宣统三年（21岁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他甚至认为马列主义是“桎梏”，后来陈寅恪要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

知识分子们的最直接领导者——北大校长蔡元培，直接推动国民党清除中共的“四·一二”运动，当时以蔡元培为首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作出“清党”指示，蒋介石只是执行者，蔡元培才是斩共的先驱与首领。

当李达、郭沫若挑头传播马列史观、推行“社会发展五阶段论”时，除了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李达等六七个共产党自己的御用史学家外，没人相信马列史学，更没人相信中国历史上有奴隶社会。对于把人类历史说成是阶级斗争史，史学家们更是深恶痛绝。中共这几个御用史学家被中国的史学家们与其他学者群殴。中共上台后，对这些批判马列主义的学者进行迫害，马克思的这些谬论最后只能靠暴力来推行。谬论总是与暴力同在。

早在四十年代，激烈批评国民党的储安平就已经看穿了[共产党](#)。他曾在四十年代的《中国的政局》（《观察》第二卷第二期）一篇文章中如此写道：“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

他还指出，“要知道提倡民主政治有一个根本的前提，而且这个前提一点在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须承认人民的意志自由（即通常所称的思想自由）；惟有人人得到了意志上的自由，才能自由表达其意志，才能真正贯彻民主的精神。”“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

然而，将共产党看得如此透彻的储安平后来却变得十分天真，也许是因为或多或少相信“中共会变好”的谎言。

“马列主义传入中国时竟然受到中国知识界的围殴”，据我所知，[这是全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的](#)。说明马列主义与中华文化相对立，说明中华文化是马列主义的克星，说明中国人是马列主义者的克星。这就是中共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消灭中华文化的原因，这就是中共大规模消灭中国人（发动大饥荒消灭中国人，搞计划生育消灭中国人）的原因。看看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所受到的欢迎，看看欧洲大学课堂里的马列主义盛行，更能体现中华民族的伟大！

中国知识界围殴马列主义，这是中华文化对马列主义的巨大冲击及打击，这是世界其他各国都没有出现过的，如果马列主义在俄罗斯也像在中国一样受打击，列宁就不可能在没有外部援助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获得成功。可怜的中华民族，虽然对马列主义打击，却扛不住上面所说的五大责任者的出卖，最后落入马列主

义者的手中。

马列主义知识分子，其实是一小撮少知且心浮气躁之人，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书生误国群体，连鲁迅也是这个无知群体中的一员战将，他甚至叫喊要把中文消灭，实在是无知加胡来。汉语拼音是这个群体搞出来欲消灭中文的尝试，歪打正着，搞成了低效的新型注音符号，只因用了拉丁符号而得以普及。

以阶级斗争为理论基础的马列主义，在无阶级的中国受到知识界的群殴，而在阶级社会的日本却妥妥传播，无阶级的泥土与阶级社会对马列主义的接受的确不一样。

六、梁启超对共党“赤祸毒菌”的大痛恨

梁启超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是百年来中国最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史学家（包括经济史、科技史）、语文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包括财政学、货币银行学）、社会学家、佛学家、文艺批评家、文学家和诗词家、新闻出版家和政论家、文物和图书馆学家、地理学家、科普作家……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其57岁时去世，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他留下的不仅有1400万字的著作，而且还留下许多宝贵的思想，其中就包括对共产党将毒害中国的判断。



（中国近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梁启超）

1、梁启超的金睛火眼

梁启超很早就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进行了解，梁启超是最早向国内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人。1901年，他写的《南海康先生传》中就介绍过，其后不断介绍。1903年2-10月，梁启超游历加拿大和美国，并与美洲的社会主义者进行了接触。特别是《纽约社会主义论坛》（马克思恩格斯曾在该刊发表过不少著作）

总撰述哈利逊氏，向梁启超全面介绍了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梁从他那儿得知：“现在全地球社会党之投票权，合各国计之，已共九百万余，而近一二年来，其党员以几何级数增加，不及十年，将成为全地球第一势力。”梁虽认为此言“不无太过，然其盛大之情况，固在计意之中。”在那次会见中，哈氏送梁“其党之主义纲领等小册子及丛报凡数十册”。

梁启超应该算是中国最早了解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人，十几年后的俄罗斯共产党才夺取政权，陈独秀的《新青年》才创刊，并开始介绍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同时张东荪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与《新青年》齐名，也宣传社会主义，陈独秀与张东荪成了宣传社会主义的风云人物。后来，张东荪抛弃了社会主义与马列主义，最早退出了中共上海发起组，他说：“**我反对在这样工业未发达的中国鼓动阶级斗争的罢工与怠工。**”

1904年2月14日，梁启超写《中国之社会主义》时说：“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概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可见，梁启超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鼻祖，对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了解深入骨髓。

一开始，他对社会主义还有一点向往。但是，他很快看出社会主义不良的端倪。1905年成为梁启超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大言倡导革命，“心醉共和政体”，甚至一度准备与孙中山合作。但在之后，他开始反对革命。导致转变的原因，一方面是他阅读当时欧洲知名学者伯伦知理（Bluntchli Johann Caspar）的《国权政治论》和波伦哈克的《国家论》之后，加上他对美国共和制度的考察，认为中国不具“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另一方面是俄罗斯1905年革命的影响。梁启超同年写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剝目，全球翘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梁启超在写到“谓全俄之秘密结社，不下百数，而主义互相出入”之后，作了“中国国民党闻词语当起如何之感”注解，于是他主张“无血革命”，也就是“君主立宪”。在此文中，他说：“吾以为今此俄民之要求（指废除土地私有），苟其不成，固无论矣；即其成也，而所生之影响，犹至可危。可则使地球上忽失去一大帝国，或则使帝国将来之骚动，倍蓰十百于今日焉。”可见，梁启超开始反对革命。

1902-1907年间，在与革命党人的论战中，梁启超认为，马克思和倍倍尔等人属于“**社会革命主义派**”，该派主张“**不承认现在之社会组织而欲破坏之以再谋建设者也**”；与之相对的，则是以瓦格纳等人所提倡进而由俾斯麦所实施的“社会改良主义派”，该派属于“承认现在之社会组织而加以矫正者”；二派“最大异点，则以承认现在之经济社会组织与否为界”。梁氏以此立论，**指认革命党人的民生主义属于“社会改良主义派”**，并以此指责**革命党人“始终未识社会主义为何物”**，“凡不为生产机关者（如家屋、器具、古玩等），则承认其私有，其为生产机关者，则归诸国有而已。必如是而后可以称社会革命”，此其一。其二，在民族国家存立的前提下，**梁启超不认可“社会革命主义派”的主张**，因为该派所设想的新社会经济组织“以简单之语说明之，亦曰：**国家自为地主自为资本家，而国民皆为劳动者而已**”，由是“国家为一公司，且为独一无二之公司，此公司之性质，则取全国人民之衣食住，乃至所执职业，一切干涉之而负其责任”。在这种经济体制下，生活资料的分配“宜依各人每日劳力之所直[值]，给以凭票，其人即持凭票以向公立之种种商店换取物品者，如是则并货币亦废置不用，只以

种种劳力与种种物品比价而立一标准，则物价无复贵贱之可言”。在失去了“物价”这一指示器的作用下，企业家精神就会遏绝，“此无他，经济动机实以营利之念为之原[源]，私人之企业家，为此营利之一念所驱，故能累发明以发明，重改良以改良，冒险前进，有加无已”。与之相反，“若夫公共团体之企业，则公吏之执行庶务者，虽缘该事业发达故而获大利，其利不归于己；反之，若缘冒险而致失败，则受行政上之责任，而已之地位将危。故为公吏者，常横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之心，其精神恒倾向于保守而乏进取。倾向于保守而乏进取者，必非能完企业之职务，而不为国民经济全体之福明矣”。

不得不说，梁启超对社会主义的了解非常深刻，他能辩明马克思主义派所搞的是“社会革命主义派”，而革命党人的民生主义属于“社会改良主义派”，这两派是极大的不同。指出“在失去了‘物价’这一指示器的作用下，企业家精神就会遏绝”的种种恶果，时至今日，世界各国社会主义的许多弊端，120年前的梁启超早已了然于心。梁启超最反对“社会革命主义派”，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派，是从原理上反对的，远比至今反对共产党的许多人高明。

要把中国推上立宪之路，以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一边与革命派论战，一边在行动。立宪派能量也很大。

作为保皇党领袖的梁启超也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

知道辛亥革命的人多，知道滦州兵谏的人则少之又少，知道没有滦州兵谏就没有辛亥革命成功的人更少。滦州兵谏是梁启超亲手策划的一次宫廷政变，策动滦州兵谏进而逼迫清政府交出政权、实行君主立宪。

立宪派反对暴力革命推翻清朝，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采用暴力手段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不论是尊皇，还是君主立宪，还是虚君共和，都需要皇帝。滦州兵谏也是要保皇帝，实行君主立宪，虚君共和。只是方式不同，由袁世凯接替摄政王，掌控实权。皇帝改汉姓，废八旗，满人赐汉姓，消弭满汉矛盾。以立宪派为主组成国会议政，实行虚君共和。

由梁启超与张绍曾、吴禄贞、蓝天蔚等北洋新军统领策动的让晚清政府奄奄一息的“滦州兵谏”。

张绍曾，驻防滦州的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吴禄贞，驻防保定的新军第六镇统制；蓝天蔚，驻防奉天（沈阳）的新军第二混成协协统。此三人被称为北洋“士官三杰”，都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康、梁君主立宪思想的忠实追随者，而这三人同时又是早期同盟会员，与革命党人也有联系，此三人被清廷倚重并付与兵权以对抗袁世凯的新军。三人商定在1911年9、10月间趁清军在直隶永平滦州一带举行秋操演习时行动，先灭禁卫军，扣压摄政王等清廷高官，再整军入京，密约武汉新军同时举兵，形成南北同举事，使清廷首尾难顾，逼迫清廷实现立宪共和。滦州在唐山地区，离北京仅有300公里。有火车直通，旦夕可达北京。

湖北革命党人因此决定，“待北方秋操进行后，南北两方同时举事”。不巧的是，湖北新军在汉口俄租界里秘密制造炸弹时，不慎将炸弹引爆，引来俄租界巡捕，搜走了起事的名册和旗帜，转交给了湖广总督瑞澂，开始搜捕革命党人。革命党人被迫提前起兵。10月10日，武昌新军工程第八营打响了第一枪。辛亥革命爆发，举国震动。

事发突然，清廷取消儿童操。10月27日，张绍曾和蓝天蔚等根据梁启超的战略部署，屯兵滦州，联名电奏清廷，提出实际由梁启超起草的“请愿意见政纲十二条”，要求立开国会，制订宪法，“特赦擢用革命党人”等。这个电报实

际是一道最后通牒，威胁清政府要把多年来拖延未办的大事在两个月内全部办完，否则马上杀奔北京。同时，梁启超还让张绍曾扣留南下军火，削弱朝廷南下军队的力量。梁启超在日本军人的护卫下秘密潜入奉天，与熊希龄、蒋百里等人会合，策划和指挥滦州兵谏。后因吴禄贞被杀，失去新军护卫的梁启超被迫再次逃亡。

在武昌起义爆发之际，手握重兵的张绍曾、蓝天蔚等高级将领提出这样的政纲，不啻是给清王朝当头一击，清朝最依重的新军三杰，用于拱卫首都的部队，结果三杰共同造反了，把清廷吓得够呛，执政的隆裕太后当场吓哭了。清王朝不得不下**罪己诏**，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规定成立国会，实行责任内阁制，皇帝的权力以宪法的规定为限度，国会有制宪、改宪、选举内阁总理大臣，宣战、媾和及决定财政等权力。就这样，君主立宪制度仅仅几天就实现了，虽然只是昙花一现。

没有“滦州兵谏”，仍然会有武昌起义，但却很难保障武昌起义的成功。

“滦州兵谏”的一个重要目的是逼迫皇帝下“罪己诏”，摄政王载沣交出摄政大权，袁世凯北洋军控制了北京，清王朝此时已处于事实上的崩溃状态。“滦州兵谏”中一个重要行动就是牵制北军的南下支援，这就为武昌起义的成功提供了必要的保障。没有对北方军队的有效牵制，武昌起义单靠革命军的单打独斗，是很难取得成功的。何况，对于一个庞大的王朝来说，南方爆发一两次革命或武装暴动，实在不算什么，随时爆发，可以随时消灭，并不是致命的；而“滦州兵谏”虽然没有提出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君主制的要求，但对清政府的打击却几乎是致命的。因此，滦州兵谏才是辛亥革命成功的关键。在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共同武力压力下，清廷退位，王国灭亡，民国创立，共和建立。

不久，滦州革命党人与军人再度起义，再次加速清廷退位。



（滦州起义的革命军人）

辛亥革命发源于武昌，实促成于滦洲。孙中山在评价滦州起义时说：“滦州大计，石庄联军，将犁虏廷，建不世勋”。

没有立宪派思想的影响及梁启超的统筹策划，不可能有“滦州兵谏”，没有“滦州兵谏”，则不可能对北京的军事力量形成有效牵制，而武昌起义的成功爆发也难以保证。没有“滦州兵谏”，中国不可能由清朝走向民国，不可能由封建

专制走向民主共和。而“滦州兵谏”以及与此相关的宫廷政变计划，其策划者主导者和实施者，正是身处海外和政治边缘地位的立宪派领袖梁启超。

立宪派领袖梁启超对辛亥革命的作用在于实际的军事及政治行动上。请愿国会运动、开放党禁运动、联合满清贵族、策动“滦州兵谏”、发布“十二条政纲”、提出“虚君共和”方案等，皆是梁氏的大手笔。

“中华民族”这个词就是梁启超创造出来的。革命党人是要建立皇汉种族只包括皇汉十八省的中华；立宪派是要建立各族共和的中华，也就是大清国内包括各族的中华民族的共和国。最后，革命派与立宪派都胜利，大中华民国建立，大中华是立宪派的，而民国是革命派的，共和是双方的，这多亏大清朝廷的大度**自动退位——禅让给中华民国，免遭大战乱大动荡**。所以，革命派与立宪派虽然都是中华民国的功臣，**满族清廷才是中华民国的最大功臣。国民党不要只顾自己抢功劳**。

梁启超金睛火眼，洞悉当时马列主义下群魔乱舞的中国。

梁启超**根本不相信“万应灵药式”的什么什么主义**，可以适用于任何国家。政治原理可以有世界性，政治问题及政策，只是国别的，不会有世界性。哲学、科学上问题可以有普遍且永久性，政治上问题，只是“当时此地”的，不会有普遍且永久性。所以侈谈外国流行的时髦主义，不管那主义本身好坏如何，纵令好极，也不过是学堂里的“洋八股”！也不过是由横文译出来的“井田封建论”！共产主义在俄国是否实行，行得好不好，我们不深知，亦不必多管；纵令实行，行得好，万不能因为俄国人吃大黄芒硝治好了病，便把大黄芒硝硬给中国人吃。如其有这样“头脑冬烘”的主张，无论他的动机如何纯洁，我们只能上他个徽号“莫斯科贡院里出身的洋举人”！共产主义能否为将来人类造最大幸福，我们不知道；纵令能，却不能因为人参是补身子的药，便随便找一个发大寒热的人也灌他参汤。如其有这样纯任理想的主张，我们只能上他个徽号“坐城楼读《周易》却敌兵的书包军师”！

梁启超**根本不相信专制政治可以叫做良政治**。当中共高喊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之时，梁启超说**“专制总是政治上最大罪恶”**。一九二五年，梁启超说：“我根本不相信专制政治可以叫做良政治，尤其不相信无产阶级专制可视为得到良政治的一种手段。专制总是政治上最大罪恶，无论专制者为君主，为贵族，为僧侣，为资产阶级，为无产阶级，为少数，为多数。我相信“专欲难成”这句格言。我相信无论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种种问题，国内总不免有一部份人和他部份人利害冲突。冲突的结果，当然不免抗争，抗争的结果，总要双方有觉悟，裁制自己利益的一部分，承认对方利益的一部分，以交让互助的精神而得较圆满的解决。二次、三次抗争，亦复如是。如是递迭交争交让之结果，自由幸福的质和量都随而加增。尤其是经济事项，非在**“两利俱存”**的条件之下，万无健全发展之望。若一方面得势便将别方面尽量地摧残压抑，其势祇能循环报复，陷国家于长期的扰乱。尤其是言论、集会、出版、罢工各种自由，若全被禁压——像苏俄现政府所行为，我以为祇能令国民良心麻痹，精神萎瘁，能力减杀，不能不认为是绝对的恶政治。”（注2）。

梁启超**根本不相信中国有所谓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相对峙**。若勉强要找中国阶级的分野，或者有业阶级和无业阶级还成个名词。有业阶级，如真的农人、工人、商人和在官厅、学校、公司里拿自己的脑筋或气力换饭吃的，这些人无论有产无产、产多产少，都谓之有业。无业阶级，如阔军

人、阔官僚、阔少爷……乃至租界里的流氓，学堂里及其他演说场里高谈什么时髦主义的政客们并不见得都无产——也许自命代表无产阶级的人便有不少的产，这些人通通叫做无业阶级。如其说中国必须有阶级战争吗？那么，只能有业阶级起而奋斗，打倒无业阶级，便天下太平；若无业阶级得意横行，国家便永沉地狱。至于从“洋八股”里贩来有产、无产阶级这个名词，在中国绝对不适用。

梁启超**根本不相信“全民革命”事业可以用宣传呐喊及其他煽动手段得来**。全民政治成立之条件有二：一须全民为自己切身利害有深切的自觉和不得已的自动；二、须全民有接管政治的相当能力。这两个条件都非仓卒间所能造成，必须指导社会的人们很耐烦，肯下水磨工夫，慢慢地启发他们扶植他们；而且要社会在比较的安宁状态之下，才有着手的余地。换句话说，若盼望全民政治出现，总要给全国人民补药吃，培养好他们的体子，令他们有气力，那么，什么“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他们都会自动地办，而且包可以办到。如其不然，专用兴奋剂去刺激他们，他们吃醉了狂叫乱舞一阵，酒气过后，躺下便像死人一般；闹得几次连兴奋性也失掉；若要加分量去兴奋，或者如赵飞燕的妙药活活送了汉成帝一条命，亦未可知。再者，一群醉汉乱叫乱闹，闹不成功也还罢了，一定把全场秩序搅得稀烂，令不醉人无从插手。所以煽动式的革命论和革命手段，只是野心家利用群众心理弱点，造成“趁火打劫”的机会。这些人不惟不是全民政治之友，换一方面看，还可以说是全民政治之敌。

梁启超**根本不相信一个国民的政治活动可以和别个国民合作；尤其不相信今日的中国有联某国某国之可能或必要**。既有两个国家存立在世界，当各有各的利害不相容地方，一国民想改革自己的政治，而藉重别国人的指导或帮助，除了甘心做吴三桂、李克用的人，不该有这种丧心病狂的举动。这种话若在国内流行，便是国民品性堕落到十二万分的表示，这个国家简直已经宣告死刑了！至于外交，除却绝交宣战的场合外，无论对何国保相当的友谊是应该的，却没有什麼联不联。联人须有本钱，中国配吗？拿什麼去联？若说我有一个大敌，要联别个来制他，譬如绵羊怕老虎，跑去和狼拜爸，老虎撵得走撵不走，是另一回事，自己除了送给豺狼当点心，怕没有第二条路！朋友们请睁眼一看，清末联日、联俄、联英、联法闹得乌烟瘴气，哪一回不是送一份大礼物完事！真不料在民国第十四个年头，还有道光间《海国图志》派的“以夷制夷论”发现于社会，且成为一个问题，重劳知识阶级之讨论！与论界之耻辱，真莫此为甚了。

蒋介石在给廖仲恺的信中也说：“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其能有成也，绝无此理。国人程度卑下，自居如此，而欲他人替天行道，奉如神明，天下宁有是理？**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恺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也。”可见，梁启超与蒋介石英雄所见略同，

梁启超指出，**中国之所以积弱，根源之一就在于国人不能正确区分国家与朝廷的概念，以致爱国心没有用在正确的地方**。国家是什么？朝廷又是什么？“今夫国家者，全国人之公产也。朝廷者，一姓之私业也。国家

之运祚甚长，而一姓之兴替甚短。国家之面积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此皆朝名也，而非国名也”。从殷族的商、姬族的周，到嬴氏的秦、刘氏的汉、李氏的唐、赵氏的宋、朱氏的明，还有蒙古人的元、满人的清，它们都是一族一姓的朝廷，而不是国家，都是一族一姓的私业，而非全体中国人的公产。

国家的功能，一是抵抗异族压迫，一是调和国内纷争，前者对外，后者对内。调和国内纷争是就消极方面来说的，积极方面国家还需履行一定的公共职责，如救灾、赈济等。

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曾经长期陷入一个难解的困境：即人们需要政府，但政府却不能履行人们期待的外而抵抗异族压迫、内而提供公共服务的国家功能，在很多情况下还常常演化成一个与民争利、侵害民权的组织。要使政府尽职尽责，人民必须有监督政府的权力，而最有效的监督方式是用投票的方式去选择政府的权力。人们有必要了解一个常识——即梁启超所说的国家不是朝廷（政府），朝廷可换而国家永存，人们应该爱的是国家而不是朝廷。

梁启超所不相信的，正是中共长期向中国人民灌输的；梁启超所倡导的，正是中共最害怕的、禁止人民明白的。

梁启超认为苏俄为侵略中国拿马克思当骗人偶像。

梁启超早在 1925 年写信给《晨报》社会周刊编者刘勉己，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梁启超写道：“我老老实实告诉你，苏俄现状，只是‘共产党人’的大成功，却是共产主义的大失败。你跟他们走，自以为忠于主义，其实只是替党人张牙舞爪当鹰犬，和你脑子里理想的主义相去不知几万里。傻子，醒过来罢！”

在那场“友俄仇俄”的论争中，梁启超反对联俄，不认同走俄国人的路。梁启超写道：马克思便是化身的希腊正教上帝，列宁便是轮转再生的大彼得！苏俄啊！你要辨明你是不是帝国主义吗？你哪一天把在中国的活动停息，我们就哪一天立刻相信你！梁启超说，苏俄本身是共产国家吗？若是共产国家，怎样会“大人虎变，君子豹变”，翻一个筋斗会变出新经济政策来？天真烂漫的青年们，听啊！你信仰共产主义，而教你信仰的人却没有信仰。马克思早已丢在粪坑里了，因为侵略中国起见，随意掏出来洗刮一番，充当出庙会的时候抬着骗人的偶像。

梁启超是在俄国已经表示出对中国“友好”的背景下说这番话的。1919 年 7 月 15 日，苏俄外交部副部长加拉罕发表了《加拉罕宣言》，其中第一项为“苏维埃政府不承认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1920 年 9 月 27 日，苏俄又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重申放弃帝俄对清政府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若从文字上解释，“其他地区”应包括根据《尼布楚条约》、《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从中国获取的东部西伯利亚，沿海州及根据《伊犁条约》和其他许多条约获得的新疆、外蒙古的边境地区。但这并未付诸实行，特别是对外蒙古问题。

1919 年、1920 年，加拉罕两次向中国发表声明，宣布了非常“开明”的对华政策，废除沙俄帝国同中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其中包括取消沙俄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租界地。加拉罕的声明于 1924 年写进了苏俄与北京政府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引起了国人的极大好感。在当时作为中国新式知识分子堡垒和思想舆论中心的北京大学的师生心目中，列宁的地位因此而超过威尔逊，跃居世界伟人之首。甚至胡适也曾填词两阙，讴歌俄国革命“去独夫‘沙’，张自由帜”，吟诵出“新俄万岁”的词句。

在国人普遍对俄国怀有好感的背景下，梁启超却如此旗帜鲜明地持不同意见，原因究竟何在？要回答这个问题，须弄清楚苏俄向中国靠拢的真实目的和诚意。

1922年8月，苏俄特使越飞（犹太人）来到中国，他向当时任北京政府外长的顾维钧表示苏俄十分愿意在外交上支持中国。但同时，他希望中国政府采纳苏俄的建议，即中国单方面正式宣布废除与其它西方国家缔结的条约。由于中国政府未采纳此建议，越飞认为中国政府“不愿接受苏俄进行合作的建议”，谈判因此受阻。此后，加拉罕以苏俄外交部副部长身份来到中国，其“目的是想通过谈判，就所谓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与中国达成一项协议。事实上，他同时还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即中国先同意与苏俄恢复正式外交关系，才能开始谈判”。

加拉罕提出的先决条件，中国方面未能轻易接受。当时俄国人在外蒙古，“采取了一系列严重损害中国利益的措施，致使外蒙这块领土实际上从中华民国分离出。存在着破坏或取消中国的外蒙的利益和中国在外蒙的地位的企图。一千多名商人和工人被赶出外蒙，而且连政府特派员和他带去的卫队也被驱逐出境了”。在这样的形势下，同苏俄先恢复正式外交关系，再商讨具体谈判事宜，中方显然难以接受，因为苏俄显然是以极不公平的方式来对待中国。

不唯如此，之后的“王正廷—加拉罕协议草案”更说明了苏俄当时放弃沙俄时代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是有条件的、有所图的。1924年3月14日，当时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王正廷与加拉罕拟妥《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草案》15条、《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草案11条及中俄协定附件7种。其内容主要是不提及“苏联与外蒙古”签订的条约，中国不答应条件苏联就不从蒙古撤军。而对1919年和1920年废除对华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宣言，则避而不谈。

由于该协议草案置中国利益于不顾，因此在签协议草案的第二天，即1924年3月15日，中国政府否决了该协议草案。3月19日，加拉罕致函中共外交部，要求中国政府在48小时内宣布接受这一协议，还威胁说，如果中国政府不在所限的时间内给予圆满答复，中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并蛮横宣称：“中苏交涉已结束，《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草案》不能修改，此后非无条件承认，不能恢复邦交。”可见，苏俄对中国表示“友好”的真实意图包藏祸心、其行为野蛮霸道。

外蒙古的独立，蒙古人民由此遭到斯大林党徒的残酷杀戮。蒙古独立不只是对中国的伤害，对蒙古民族是更大的伤害，对蒙古国人民是最大的伤害，一些毫无理智的理想家闹出了这出蒙古人民的巨大悲剧至今还在延续。

下面内容选自《金剑：两岸统一该用什么国号》中的“蒙古独立血路”一小节，从12700多字删减成2100多字：

{

外蒙古问题是俄罗斯人推动出来的。1911年12月29日，趁辛亥革命内地混乱之时，白俄军队驱除大清势力，蒙古宣布独立。后来蒙古取消独立，回归中国，要求中国中央政府派驻军队。

1921年，苏俄借口沙俄时代遗留的白军在蒙古屯住一事，派红军越境进入蒙古，苏联红军驱除中国军队后。从此，红军就一直驻扎在蒙古境内。同时，苏俄政府也一直在暗中积极鼓动所谓的蒙古亲俄人士，古再次宣布独立，脱离中国。蒙古人民党（共产党的另一个名词）夺取政权。从此，蒙古人民走了一条地狱之路。

在苏联指示下，蒙古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大力推行各项恐怖政策：强制集体化、消灭民营经济、关闭寺院、没收教产充公……这场杀戮官吏喇嘛人民、消

灭庙宇、在最不适合搞公有制的游牧民族强力推行公有制导致经济被摧毁浩劫，激起全蒙古人民（包括人民党党员及青年团团员）大规模暴动。蒙古三十八个民间团体曾经联名写信请求中华民国政府和班禅活佛（大清国班禅管理蒙古事务）帮助，驱除苏蒙政权，事发后参与的人全被处死。蒙古人民的反抗，引来更大的镇压。苏军再度派兵，调入飞机、坦克等重型武器入境镇压，才将 3 年暴动平息，斯大林在党内寻找“极‘左’路线”的替罪羊，许多蒙古人民共和国与党的领导被清洗。这场大屠杀在七七事变后更加肆无忌惮、更加恐怖、更加广泛，在“美丽的蒙古大地”，从最高领导开始，党政军领导人一批批被杀戮，宗教界著名人物亦被杀戮殆尽，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被一扫而光，传统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文字也被篡改，经济亦完全被苏联所控制。蒙古大屠杀只有红色高棉（红色柬埔寨）大屠杀可以相比，都是共产主义者所为。超过十分之一的人被屠杀，来自中国内地的汉蒙两族人士几乎未留一个活口。从此，美丽的蒙古大地上斯德哥尔摩症泛滥，蒙古人怕上了俄罗斯人，再也没有可以反抗的力量，蒙古变成苏联不加盟的加盟共和国。

1921 年 10 月 18 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致信列宁，兴奋地表示：

“（蒙古）革命政府是我们手中的一张王牌，它的成立彻底粉碎了日本从太平洋到黑海建立反革命战线的计划，我们相当长的一段边界线变得非常安全了，这段边界将由友好的蒙古遮掩起来。”

看看，被推动独立的外蒙古，只是俄罗斯人为了自身安全运作的棋子，为了这棵棋子，这惜对蒙古人进行大杀戮，一直杀到蒙古人不敢反抗为止。

大屠杀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才彻底结束，蒙古人马上连国名都改掉，改成蒙古国。蒙古独立是苏联在其附属组织——蒙古人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完成的！让蒙古人民在地狱中走了一回！



（蒙古纳粹思维盛行）

看了上面的图片，你是否觉得那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德国？不是，是在现在的蒙古国。如今，蒙古国世界上唯一一个公开宣扬纳粹主义的国家，而且矛头直批中国。

蒙古有几个大的纳粹组织：“达亚尔蒙古”(DayarMongol)、“白色纳粹十字”(TsagaanKhass)、泛蒙古运动、蓝色蒙古，有的专门针对中国人，有的已经正式注册。据说，纳粹党的人数已经达到 3000 人，对这个只有 300 多万人的国家来说，已经是非常之多。

当然他们也需要“娱乐”，在这些新纳粹组织通常光顾的酒吧和娱乐场所中总播放着当地嘻哈乐队“4 Züg”的歌曲《中国佬》、《不要太过分》，其中合唱部分的歌词是：“杀掉他们，统统都杀掉，统统”。图为蒙古首都乌兰托巴，一间某新纳粹组织的酒吧内，随处可见纳粹装饰。

复制 标记 批注 转发到随笔

在乌兰巴托市街道两旁建筑物的墙上经常出现与新纳粹有关的涂鸦和反中国人的涂鸦，而且近年来，这些涂鸦符号越来越广泛的在房屋上、公共汽车上、寺院的墙面上和中国餐馆的玻璃上，甚至国家纪念碑也未能幸免！除此之外，这些蒙古国新纳粹组织的成员，每天都在学习格斗技巧。这些新纳粹组织常自称为“社会执法团体”，其成员会到外国饭店。涉外公司等场地“临时检查”。2005 年 11 月 26 日是蒙古独立日，当天夜里，三家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中资企业几乎同时被袭击，此事即是“泛蒙古运动”成员所为，这也是近几年来蒙古极端组织最为严重的反华事件。印度大使曾因长得像华人被蒙古人打成重伤（注 199）。

美国《时代》周刊 2009 年 7 月 27 日（提前出版）的一篇文章让人读了之后吓了一跳：“蒙古出现‘新纳粹党，目标对准中国人’”。该文章称，蒙古目前活跃着一批崇尚纳粹信条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他们强烈地反对中国人，甚至杀害与中国人有关系的蒙古人。

《时代》称，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类似纳粹的“卐”标志和“射杀中国人”等涂鸦随处可见，这些都出自“新纳粹”之手。目前有三个极端民族主义组织在乌兰巴托，他们的人数有好几千，这对于只有 300 万人口的蒙古来说是个不可忽视的数目。这些人还都具有强烈的反华倾向。文章写道，“一个名称叫‘蓝色蒙古运动的组织将那些与中国人谈恋爱的妇女剃光了头。该组织头目恩赫巴特去年被判为杀人犯，他杀害了自己女儿的蒙古男友，仅因为后者去中国留过学”。

蒙古的新纳粹运动已经引起世界许多国家的注意，连美国都要求到蒙古旅游的国民必须注意这种情况（注 199）。

蒙古国已经信仰破产（藏传佛教被苏俄铲除）、经济破产（贫穷到可怕的程度、政府向民间募捐）、文化破产（文字被苏俄篡改）、道德破产（酗酒、纳粹思想盛行、单亲女性家庭超多），蒙古人不恨俄罗斯反而恨中国。天理何在？

至今，蒙古这个财政靠援助的政府，这个只有一千多人搞科研的国家，这个 70%土地沙漠化的游牧草原，这个纳粹思维盛行、女人干活男人酗酒、找不齐建筑工人、女性单亲家庭超量的民族，前途在何方？这里只谈了七种病态，个个都是绝症。

蒙古的独立运动，就是一场蒙古族高层在利欲熏心与无知之中搞的闹剧，演变成一场把蒙古民族推向灭顶深渊的悲剧。这一场闹剧加悲剧早在 85 年前（全面抗战之前）就该结束了，因为有斯大林的阻挠才没有结束；或者在 100 年前就该结束了，因为有利宁的阻挠才使得灾难延续；都是马列主义造的灾。回归中国对蒙古人最有利，回归才能有好生活，民族才能有前途，毕竟生活才是最重要的追求。独立那么久，其实已经烦了、已经穷怕了，加以引导就会回归。抱团才能取暖。

}

蒋介石开始对苏俄也好感，主要也是因为蒙古问题才看清苏俄的帝国主义面目。蒋介石领团考察苏联，整个苏联领导层上上下下都要使蒙古独立。托洛茨基在会谈中明确地告诉蒋介石，“国民党可以从自己国家的本土而不是蒙古发起军事行动”。苏俄支持外蒙古独立，使蒋介石认为：“俄共政权一旦臻于强国，其帝俄沙皇时代的野心复活，则并非不可能。当念及此，不禁担心到对于我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前途，会不会带来灾祸？”正如蒋介石所说：“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绝不是在国内时想象所能及的。”“在我未往苏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念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的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主义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是危险。”回国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蒋介石都处于愤懑状态。他多次在公开场合抨击苏俄的外交政策，认为苏俄只不过是改了名字的帝国主义，即与英美相比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话中不无厌恶之情。蒋介石还亲自写信给廖仲恺，称“俄党对于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言信我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

除了协议草案外，中东铁路的利权争执也反映了苏俄的真实用心。越飞和加拉罕先后曾以苏俄政府官方代表的身份，试图与张作霖达成某种解决方法，“以便能重新控制与苏俄接壤的满州境内的这条十分重要的铁路”。

事实上，苏俄同中国恢复邦交，是从维护苏俄的国家、民族利益出发的。而梁启超在此时坚持反对苏俄的立场，除了政治制度上不认同苏俄之外，很大程度上乃是意识到了苏俄此举可能对中国造成的侵害，目的是要提醒国人不要轻信苏俄，是为了捍卫民族利益、国家利益。

梁启超当时对苏俄的看法代表了一批人的看法。当时任《晨报》副刊编辑主任的徐志摩就曾指出：“我与多数赞成联俄者不同的地方，在我的赞成为有条件的赞成而已。什么条件呢？并不大，并不难，只要苏俄不在中国内政上捣乱就行了。”苏俄对中国的政策“完全是一个以俄国为发端，以俄国为归宿的私利政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仁义道德在内”。而且，苏俄放弃在中国的许多权利，事实上“这种放弃也只是一种宣传手段，根本还是为了他自己的较大利益设想，怎见得是赤心利他的行为呢”。另外，丁文江也撰文道：“主张联俄的人说苏俄与其它帝国不同，对于我们是完全没有私意的。但是苏俄在北海外蒙的举动，我是知道得清楚的，我最近得到苏俄运到库伦的军火秘密单子”，“试问苏俄在这四个月里面为什么要运大宗的军火到外蒙来？这种举动，同帝国主义的国家，有什么分别？！”

从上所述可以清楚看出，梁启超反对苏俄，反对走苏俄式的路，的确有其不得不反的道理。在国人向苏俄接近，主张“走俄国人的路”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梁启超清醒地看到了一般人未曾看到的东西，并对国内日益激进的联俄思潮提出了警告。如果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审视，其所具有的捍卫民族利益及国家利益的用心，值得肯定。当然，梁启超反对走俄国人的路，反对马克思主义，还有其政治立场的因素。梁启超坚持改良主义，站在其认定的“集产社会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的立场上，不主张革命，而主张在不改变社会政治基本现状的前提下，进行改良。因此，他对俄国式的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

级专政的道路持反对态度，不认同俄国式的社会主义，不赞同中国走俄国式的路。

不得不说，梁启超眼光独到、智慧超群。直到今日，在经历了几十年苦难及马列荼毒之后，中国许多的学者、甚至小粉红依然没有 100 多年前的梁启超看得透彻。

事实上，孙中山也反对苏俄共产制度。正如在不久后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所表明的那样，孙中山对苏俄式的社会主义的真正态度是：“共产组织，甚至苏菲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固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菲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孙中山不主张中国人在政治制度上“走俄国人的路”，同梁启超看法一致，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梁启超观点的正确。但是，孙中山上当了，上了列宁、斯大林、托洛斯基及苏联的当，当时苏联要搞世界共产革命，就是要让中国及世界各国都变成如苏联那样，苏联哪有诚信可言，其包藏祸心，所有的条约都是骗人的，苏联人表面支持国民党，暗中支持共产党把国民党吃掉。1945 年，苏联与中华民国签订条约，其中规定苏联不支持中共。苏联却暗中支持中共、指挥共军作战、甚至卖武器给共军并运武器到山东交给共军，致使中华民国在内战中失败。苏联人虽然酗酒时糊涂，其奸诈之时亦让人难以提防。

历史上俄罗斯民族占领中国的土地最多，他们在东北比日本人更坏。1945 年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后，到处抢劫强奸，至今，东北老百姓多记得老毛子的恶行，少记得日本人的恶行，可见俄罗斯人更恶。在甲午战争之后，俄罗斯人进入东北，也是恶行累累，东北人称他们为老毛子，不要把俄罗斯人当成什么善类。日本人占领地盘后，就把当地人同化成低等的日本人；而俄罗斯人占领地盘后，就把当地人清理掉，海兰泡惨案、江东六十四屯惨案、火烧瑷珲城，俄罗斯人在欧洲也是如此行事，导致被欧洲人仇视。甲午战争后，正是俄罗斯人太坏，导致在日俄战争中，中国政府及人民忘记了日本人的恶行而帮助日本打赢战争。我建议，要向俄罗斯要、换或者买回北方出海口，不行就不与它做朋友。

看看现在的地图，俄国人把中国珍贵的出海口变成他们的无用之地，世界上只有俄罗斯人能做出这种损人不利己的愚蠢行为，中国人自古以来都不敢做这种断人路的事。如果不是害怕引起核战争毁灭人类，我们就抢回那块地盘，把他们打服，热兵器战争中，武器对等时俄国人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请看后面的“以正治国 以奇用兵”那一节）。苏联共产党从来没有说过要还回来中国北方的出海口，还为小小的珍宝岛差点用核武器对中共国小弟作“外科手术式的切除”，以致中共国与美国结盟造成苏联垮台，你说苏联共产党愚蠢不愚蠢？俄罗斯这种“只有自己没有别人”的民族非常值得提防，马克思主义也只有在俄罗斯这种暴力加傲慢的民族里才能在没有外力援助、自然而然的情况下获得成功，由此祸害世间许多年。如今，他们脱离了共产党的罪地苦海，我们还在苦海里沉浮，他们从来就没有想过帮助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还他们的首举共产党的孽债！他们还信神呢，不知道他们的神是怎么教导他们的？难道要等老天爷算总账吗？

注 2：《梁启超论共产主义和苏俄》

<http://blog.10jqka.com.cn/59715073/1962735.shtml>

注 199：失败的蒙古国：捧着金饭碗却一片贫瘠，GDP 相当于我国一个县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6587397073224517&wfr=spider&for=pc>

蒙古是个怎样的国家？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345044>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716/23/6748870_300485590.shtml

美刊称蒙古“新纳粹”威胁中国人

<https://www.fx361.com/page/2009/0721/5649246.shtml>

印度大使曾因长得像华人被蒙古极端组织打成重伤

<https://china.huanqiu.com/article/9CaKrnJJC1U>

2、梁启超反对“赤祸毒菌”毒害中国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梁启超游历欧洲时，曾想亲自去苏联看看具体情况，却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这一愿望。当时，各种社会主义理论涌入中国，其中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工读互助主义、实用主义、泛劳动主义、新村主义。梁启超发起的共学社也大力翻译与介绍有关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书。但他不同意马克思的说法，认为中国不存在无产阶级。他反对在当时中国的条件下提倡“生产机关”“归到国家”，反对中国实行社会主义。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梁启超去世，只有短短的八年时间。这段时期是国民党与共产党联合“北伐”并分裂的时期。虽然那时梁启超一直住在北京或天津，没有去过国民党统治区的广东，但国民党以及共产党统治区的情况还是传到他那里。他对这些情况进行了批判。

1921年梁启超写了《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长文，支持张东荪与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等马克思主义者论战。他在文中说：“吾认为社会主义所以不能实现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总原因在于无劳动者阶级”。“故中国之社会运动，当以多数人取得劳动者地位为第一义”。1925年，他又在《无产阶级与无业阶级》中说：“中国社会到底有阶级的分野没有呢？我其实不敢说，若勉强说有，则我以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成对待名词，只有有业阶级和无业阶级成对待名词。什么是有业阶级？如农民（小地主和佃丁都包在内）、买卖人（商店东家和伙计都包在内）、学堂教习、小官吏与及靠现卖气力吃饭的各种工人等，这些人或有产，或无产，很难就‘产’上画出个分野来。什么是无业阶级？如阔官、阔军人、政党领袖及党员、地方土棍、租界流氓、受外国宣传部津贴的学生、强盗（穿军营制服的包在内）、乞丐（穿长衫马褂的包在内）与及其他之贪吃懒做的各种人等，这些人也是或有产，或无产，很难就‘产’上画出个分野来。”

虽然只存在有业阶级与无业阶级，但梁启超看到“无业阶级的人脸皮真厚，手段也真麻俐，他们随时可以自行充当某部分人民代表。路易十四世说‘朕即国家’，他们说‘我即国民’。他们随时可以把最时髦的主义顶在头上，靠主义做饭碗。记得前年上海报上载有一段新闻说，一位穿洋装带着金丝眼镜的青年，坐洋车向龙华去，一路上拿手仗打洋车夫带着脚踢，口中不绝乱骂道：‘我要赶着赴劳工大会，你误了我的钟点，该死该死。’这段话也许是虚编出来挖酷人，其实像这类的怪相也真不少。”

所以梁启超说：“我近来极厌闻所谓什么主义什么主义，因为无论何种主义，一到中国人手里，都变成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他主张：“欧美人今天的运动，大抵都打着‘无产阶级打倒有产阶级’的旗号，这个旗号我认为在中国不适用，应改写道：‘有业阶级打倒无业阶级！’”

梁启超写这篇文章时是1925年，那年发生了“五卅惨案”。他后来在给《给孩子们书》中说：“这回上海事件，纯是共产党预定计画（划），顽固骄傲的英侨和英官吏凑上去助他成功，真可恨。君劭、百里辈不说话，就是为此。但我不

能不说，他们也以为然（但嫌我说得太多）。”他又在《与顺儿书》中又说：“各地工潮大半非工人所欲，只是共产党胁迫。其手段在闯入工场，打毁机器，或把烧火人捉去。现在到处发现工人和共产党闹事（因不愿罢工而打），实为珍闻。”

梁启超真是金睛火眼说对了。1925年1月，中共的四大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决定加强党对工农群众运动的领导。四大以后，在中共的鼓动下，革命群众运动，特别是工人阶级政治斗争迅猛发展。1925年2月起，上海22家日商纱厂近4万名工人为反对日本资本家并要求增加工资而先后举行罢工。**中共中央专门组织了领导这次罢工的委员会。3月9日罢工结束。**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资本家因存纱不敷，关闭工厂，停发工人工资。中共党员、**工人纠察队和罢工鼓动队领导者**顾正红带领群众冲进厂内，与资本家论理，要求复工和开工资。日本资本家非但不允，而且向工人开枪射击，打死顾正红，打伤工人10余人，成为五卅运动的直接导火线。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第32号通告，紧急要求各地党组织号召工会等社会团体一致援助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19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第33号通告，决定在全国范围发动一场反日大运动。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作为中心口号，发动群众于30日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同时，为加强工会组织的力量，决定由共产党人李立三、刘华等主持，成立上海总工会。随后，刘少奇到达上海，参加上海总工会的领导。工人的正当罢工应该经济罢工，而中共领导的罢工都是**政治罢工**，为了搞夺权而进行的政治罢工。由于英国巡捕的傲慢，使得运动越演越烈。中共**“决定把工人的经济斗争发展成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中共指挥下的无理智政治夺权罢工，对于我们这个极端贫困且刚刚走向工业化的国家是巨大且无可恢复的灾难，沉重打击了中国的经济及工业化建设，**无异于在中华民族的命门上插上一刀**，为后来的日本侵略者送去珍贵厚重的礼物。

梁启超不喜欢共产党，他参与创办的中原公司被共产党“共了产”，于是他在给孩子们的书信中，多次把他的尿血症称为“赤祸”、“赤化”。如果说上面这些只是他对共产党发起“工潮”不满的话，那么下面这些就是直接对共产党进行批评了。1925年9月3日的《与顺儿书》说：“共产党横行，广东不必说了，（广东完全变了外蒙古，鲍罗廷即唯一之主权者。）”

梁启超1927年1月27日给孩子的信中说：“现在南方军人确非共产派，但他们将来必倒在共产派手上无疑。现在南方只是工人世界，**‘知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两湖、江西大小公私学校完全封闭，以改组名义封闭，但开学总不会有期。）而所谓工人又全是不做工的痞子流氓，看着生产事业都要停止真是不了。将来我们受苦日子多着哩，现在算什么？我们只有磨炼身心，预备抵抗，将来还可以替国家做点事业，教小孩子们也要向这条苦路进行。”

中共把“**‘知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中华民族正是缺乏现在化知识才落到如此地步，中共革命却打击知识阶级，无异把中华民族往火坑里推，正如日本人不让台湾人接触技术一样邪恶。

蒋介石发起“四一二”事件之后，于是他5月5日在《给孩子们书》中这样说：

“……**‘党军可爱，党人可杀’**，这两句早已成为南方极流行的格言，连最近吴稚晖弹劫共产党的呈文上都已引及。但近来党人可杀的怨声虽日日增加，而党军可爱的颂声却日日减少，因为附和日多，军队的素质远不如前了。总而言之，所谓工会、农会等等，整天价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饭。

而在这种会中（完全拿来报私怨，他们打的是“打倒土豪劣绅”旗号，**其实真的土豪劣绅，早已变做党人了，被打者只是无告的良民。**）主持的人，都是社会上最恶劣分子，（**报上所说几次妇女裸体游行，的确的确是真，诸如此类之举动，其举不胜举。**）半年以来的两湖，最近两个月的江西，（今年年底两湖人非全数饿死不可，因为田已全部没有人耕，工商业更连根拔尽。）凡是稍为安分守己的人，简直是不容有生存之余地。（今日见着一位湖南人，说他们家乡有两句极通行话，说道：**‘今年湖南人没有饭吃，只怕明年湖南便没有人吃饭’**。这句真一点不错。）”

“**这种罪恶当然十有九是由共产党主动；**但共产党早已成了国民党附骨之疽 - 或者还可以说是国民党的灵魂 - 所以国民党也不能不跟着陷在罪恶之海了。原来**在第三国际指挥之下的共产党，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牺牲了中国，来做世界革命的第一步。**在俄国人当然以此为得计，**非如此他便不能自存，**却是对于中国太辣手了。近来南北两方同时破获共产党机关 - 即俄使馆及领馆发现出那些文件（现在发表的还不到十分一、二），真真可怕，真真可恨。现在国内各种恐怖情形完全是第三国际的预先计画，中国人简直是他们的机械。即如这回南京事件，思永来信痛恨美国报纸造谣。不错，欧美人免不了有些夸大其词（把事情格外放大些）。然而抢领事馆等等，类似义和团的举动谁也不能否认。（据说被奸淫的外国妇女至少有两起，还有些男人被鸡奸，说也来真是中国人的耻辱。）这种事的确是预定计画，由正式军队发命令干的。为什么如此呢？就是因共产党和蒋介石过不去，要开他顽笑，毁他信用。共产党中央执行会的议决，‘要在反对派势力范围内，起极端排外运动，杀人放火，奸淫抢掠手段，一切皆可应用’。这个议案近来在俄使馆发现，已经全文影印出来了。（俄人阴谋本来大家都猜着许多分，这回破获的文件其狠毒却真意想不到，大家从前所猜还不到十分之二、三哩。）他们本来要在北方这样闹，但一时未能下手。蒋介石当然也是他们的‘反对派’，所以在南京先试一下。他们最盼望帝国主义者高压中国，愈高压则他们的运动愈顺利。自五卅惨案以来，英国完全上了他们的当，简直是替他们做工作。他们的战略真周密极了，巧妙极了，但到他们计画全部实现时，中国全部土地变成沙漠，全部人民变成饿殍罢了。”

“共产党如此，国民党又怎么样呢？近年来的国民党本是共产党跑入去借尸还魂的。民国十二三年间，国民党已经到日落西山的境遇，孙文东和这个军阀勾结，西和那个军阀勾结 - 如段祺瑞、张作霖等 - 依然是不能发展。适值俄人在波兰、土耳其连次失败，决定‘西守东进’方针，倾全力以谋中国，看着这垂死的国民党，大可利用，于是拿八十万块钱和一大票军火做钓饵。那不择手段的孙文，日暮途远（穷），倒行逆施，竟甘心引狼入室。孙文晚年已整个做了苏俄傀儡，没有丝毫自由。（孙文病倒在北京时，一切行动都在鲍罗庭和汪精卫监视之下，凡见一客都先要得鲍罗庭的许可，每天早半天鲍或鲍妻在病榻前总要两、三点钟之久，鲍出后孙便长太息一声，天天如是，此是近来国民党人才说出来的，干真万真。）自黄埔军官成立以来，只有共产党的活动，那里面有国民党的活动。即专以这回北伐而论，从广东出发到上海占领，那一役不是靠俄人指挥而成功者。（说来真可耻，简直俄人来替我们革命。）党中口号皆由第三国际指定，什么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资本阶级等等，那一句不是由莫斯科的喊筒吹出来。除了这些之外，国民党还有什么目标来指导民众？所以从国民党中把共党剔去，（这几天五一节、五四节等，不惟北京销声匿迹，即党

军所在地，也奄奄无生气，可以窥见此中消息。）国民党简直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了。近来蒋介石们不堪共党的压迫，已经翻过脸，宣言”讨赤”，而且残杀的程度比北方利害多少倍。同时共党势力范围内也天天残杀右派。（前面那几张纸都是十天以前陆续写的，现在情形天天剧变，很有些成了废话了。）据各方面的报告，最近三个礼拜内双方党人杀党人－明杀暗杀合计－差不多一万人送掉了，中间多半是纯洁的青年。可怜这些人胡里胡涂死了，连自己也报不出帐，一般良民之入枉死城者，更不用说了。尤可骇怪者，他们自左右派火并以来，各各分头去勾结北方军阀：蒋介石勾孙传芳，唐生智勾吴佩孚（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双方又都勾张作霖。北军阀固然不要脸，南党阀也还像个人吗？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可见所谓什么为主义而战，都是骗人，现在揭开假面孔，真形毕露了。现在军事上，形势蒋派似颇有利，其实他们党的内部，早已是共产党做了主人翁，共党也断不肯抛弃‘国党’这件外套。最后的胜利，只怕还是共党。共党也不能得真的胜利－不会像俄国那样，但是这种毒菌深入社会，把全国搅到一塌糊涂，人民死一大半，土地变成沙漠，便算完事。现在南方大多数人都天天盼望外国人来收拾。这种卑劣心理之可耻可痛，自无待言。其实外国人又何能收拾，只有增加扰乱的成分，把垂死的国命民命，更加上些痛苦罢了。”

上面的‘党军可爱，党人可杀’（党军——即国民党军，党人——共产党人）——金剑注。共产党这样胡搞，必然是“今年湖南人没有饭吃，只怕明年湖南便没有人吃饭”了。

同月 11 日《与顺儿书》说：“南方党军已到潮落的时候，其力不能侵北，却是共产党的毒菌在社会传播已深，全国只有一天一天趋到混乱，举国中无一可以勘定大难之人，真是不了。”

当时武汉与南京分别存在以汪精卫和蒋介石为代表的政府，在”宁汉合流”之前的六月十五日，梁启超在《给孩子们书》对局势做出分析：“以现在局势论，若南京派得势，当然无避地之必要；若武汉派得势，不独我要避地，京津间无论何人都不能安居了。以常理论，武汉派似无成功之可能。然中国现情，多不可以常理测度，所以不能不做种种准备。”

（梁的分析是对的，武汉政权是共产党半主宰，汪精卫再糊涂一点，武汉政权就由中共全主宰了。——金剑）

于是他为了避难，甚至把钱寄给远在美国长女梁思顺（即梁令娴），以备避难的时候用。最后果然是蒋介石派胜利了，梁启超用不着“避难”。他去世时，南京政权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阎锡山、北平特别市市长何其巩还向其送了挽联。阎锡山的挽联是：“著作等身，试问当代英年，有几多私淑弟子；澄清揽辔，深慨同时群彦，更谁是继起人才？”

梁启超说“最后的胜利，只怕还是共党”。不幸言中。在梁启超刚好去世 20 周年的时候，共产党终于依靠“强盗”、“小偷”、“土棍”、“流氓”，借“抗日战争丰满了羽毛”，借助于“苏联人的帮助”与“美国人幼稚”，以及利用“蒋介石的人性”打败了国民党，正式开始祸害全中国，至今已经 70 多年。中共的所作所为，几乎完美地实践了梁启超的预见。

梁启超曾说：“中国全部土地变成沙漠，全部人民变成饿殍罢了”、“人民死一大半，土地变成沙漠”。确实中共发起内战，导致数千万的人死亡。其建政后，又导致数千万上亿的人死亡，单单是六十年代的大饥荒就至少导致 6200 万以上的人饿死，以及导致数亿人受到迫害。而现在全国三分之一的土地

已经荒漠化，加上计划生育使中国损失数亿人。这一切累累的罪恶，不出梁启超所料。

全国人民这样，梁启超的家人与后代也不例外：梁启超二夫人王桂荃文革中受迫害，1968年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与世长辞；梁启超给其写信讨论共产党最多的长女梁思顺，1966年文革爆发时受迫害自杀；长子梁思成虽然为中共政权设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还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但他还是在1972年因受迫害去世；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梁思庄文革中被揪；追随共产党参加新四军的梁思宁，早在1948年就被开除党籍……对此，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文革中对表妹、梁思庄的女儿总结说：“梁氏家族全军覆没。”

……

梁启超是知日者与最坚定的抗日者。当年他游历台湾，看到台湾人民在日本殖民下的沉重苦难，坚定了他的反日情感。日本人多次救了他、多次帮助了他，他身受日本的再造之恩，当他发表反日文章时，整个日本民族感到恐惧。他的去世使中国失去了一位知日抗日者，是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的损失。

他最著名的弟子是蔡锷与蒋百里，蔡锷在他的帮助下带头反抗袁世凯称帝，蒋百里是持久战与全民战争的发明者及呼吁者。

民国元年（1912年）年，袁世凯起用30岁蒋百里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是中华民国中央军校第一任校长。蒋百里在保定军校就以日本为假想敌训练新军。后来，蒋百里提出了“寓兵于农”这一全民抗战的崭新军事理念。蒋百里在一战结束不久，就著文称中日必战，并开始阐述建立国防中心区的初步构想。1922年，蒋百里发表《军国主义之衰亡与中国》一文，首次指出日本侵略的危险，说：“至于从中国现状言，吾侪所最感危险者，即邻近富于侵略性的国家……”。蒋百里再次向中国人预言“中日必有一战”，呼吁中国备战。

蒋百里最迟是1923年提出持久战。1923年春，蒋百里从家乡返北京，由津浦路北上，车过徐州时，他指着窗外对同行的学生龚浩说：“在不久将来，中国和日本必有一战，一旦战事爆发，津浦、平汉两线将被日本占领，中国国防线大体应北起太原，经洛阳、襄阳、衡阳这三阳线，是为东部平原与西部山地的连接地带，日后可作抗击外敌入侵”。

蒋百里1925年任吴佩孚部总参谋长，后辞职。

1927年，国民革命军克复南京、上海、杭州。国民政府迁都南京，总司令蒋介石接蒋百里进京晤谈，礼遇优渥。蒋百里指陈时局，认为当时形势对日宜采缓兵之计，不要让日本人有所疑虑引起无谓纠纷。于是蒋介石派蒋百里赴日，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和朝野人士说明国民政府政策与组织“无意抗日”，游说的效果很好。不久，蒋介石被迫下野，也亲自赴日实施蒋百里的对日缓兵之计。

蒋百里在1937年全面抗战前出版了《国防论》，在扉页上写道：“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他在《国防论》中说：“中国国家的根本组织，不根据于贵族帝王，而根据于人民。中国国民的军事天才，不发展于侵略霸占，而发展于自卫”，“利用国民自卫心来保卫国家，没有不成功的”，“彼利速战，我持之以久，使其疲敝；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则置之第二线，使其一时有力无用处”。1937年，蒋百里作《张译鲁屯道夫全民族战争论序》，提出：“新军事的主流，是所谓‘全体性战争’”，“未来的战争不是‘军队打仗’而是‘国民拼命’”。1938年1月，蒋百里又写出了一篇针对抗战形势的重要军事论文——《速决与持久》。文章开头就提出：“以此现代战术战略的趋势，也自然向速决方向走去。但从整个国家的立场说来，即从所谓

‘全民战争’的范围说来……就注重在‘持久’两字……”。他关于抗日战争最著名的一句话：“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它讲和！”。

1938年8月蒋介石任命他为陆军大学校长，他坚辞不受，蒋介石只好任命他为代理校长。抗日战争在蒋百里的战略指导下得以胜利。

梁启超，不但自己优秀，弟子与儿女皆优秀。梁家被号称一门三院士，三个子女皆为院士，弟子更是名满天下、功满天下。

3、文：梁启超对“大革命”的大恐惧

有一篇文章“梁启超对“大革命”的大恐惧”，当时在国内网站找到的，现在只能在国外才能找到。文章写得很好，本人不用再着笔。其实由本人来写的话，题目会是“梁启超对共党“大革命”的大痛恨”。

对这段历史了解的人就知道梁启超“痛恨与恐惧”的理由，如果不清楚这段历史，建议看《金剑：人世间最大的谎言——辩证法》一书，里面用对“大革命”历史的深入剖析来证明：“阶级斗争是民族毁灭的动力”这一理论。

下面是“梁启超对“大革命”的大恐惧”的一文：

{

梁启超对“大革命”的大恐惧

[辛亥百年，重温历史，认知革命（77）](#)

作者：[民主思想者](#)

转自：

<https://szbbs.sznews.com/thread-3575458-1-1.html?from=indexlink1926>

<http://cn.rocidea.com/one?id=2923>

年度事件：北伐战争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拉开序幕。因为聚合了苏俄的卢布、新党军体制以及工农运动，这场北伐取得了国民党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战果。但在这辉煌的战果之外，质疑与恐惧也同时在人心

中弥漫……

梁启超对“大革命”的大恐惧

1926年的“大革命”，是在爱国忧世的青年们集体倒向社会主义的大背景下开启的。这场“大革命”，包括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两个部分，前者指的是通过军事北伐推翻北洋军阀政权；后者则是指工、农群众运动。前者大致上处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后者则完全由中共包办。政治革命获得了时人的高度认同；社会革命却收获了知识界最严重的分裂——支持者将其赞美到天花乱坠，批评者将其贬斥得一无是处。

如何看待这种分裂？尤其是如何看待那些批评？那些批评背后有没有坚实的事实作为依据？梁启超1926-1927年间写给子女们的书信里的那些对时局的评论，或许是个极好的视角——1、这些评论系私密性质（家书），能够完全代表作者的真实想法；2、梁氏毕生致力于救亡和开启民智，其立论的动机显然是善意的；3、梁氏在政治信仰上反资本主义而主张国家社会主义，不至于被解读成“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文人”。

1926年9月29日：不反对研究系人物辅佐军阀孙传芳

梁启超家书：

“时局变化极剧，百里所处地位极困难，又极重要。他最得力的几个学生都在南边，蒋介石三番四复拉拢他，而孙传芳又卑礼厚币要仗他做握鹅毛扇的人。孙、蒋间所以久不决裂，都是由他斡旋。但蒋军侵入江西，逼人太甚(俄国人逼他如此)，孙为自卫，不得不决裂。我们的熟人如丁在君、张君勱、刘厚生等都在孙幕，参与密勿，他们都主战，百里亦不能独立异，现在他已经和孙同往前敌去了。老师打学生，岂非笑话(非寻常之师弟)。好在唐生智所当的是吴佩孚方面(京汉路上吴已经是问题外的人物)，孙军当面接触的是蒋介石。这几天江西的战争关系真重大。若孙败以后(百里当然跟着毁了)，黄河以南便全是赤俄势力。若孙胜蒋败，以后便看百里手腕如何。百里的计画是要把蒋、唐分开，蒋败后谋孙、唐联和。果能办到此著，便将开一崭新局面。国事大有可为，能成与否不能不付诸气数了。”(1926年9月29日)

笔者(梁启超对“大革命”的大恐惧一文的作者，下同)注：

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勱这些知识分子，都是围绕在梁启超周围，以梁为精神领袖的“研究系”人物。“研究系”的前身，是辛亥年后与国民党分庭抗礼的“进步党”；“进步党”的前身，是辛亥年前与革命党分庭抗礼的立宪派。“进步党”搞“开明专制”失败后，放弃党派活动模式，成为松散的“研究系”。很显然，在1926年，“研究系”知识分子仍然寄希望于通过影响当权者，走“政治改良”的道路。梁启超本人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和直系军阀孙传芳的合作，但并不反对“研究系”人物去辅佐孙传芳。次子梁思永曾致信梁启超质疑此事，梁启超回复道：

“思永问我的朋友何故多站在孙传芳那边？这话很难说。内中关系最重要者，是丁在君、蒋百里二人，他们与孙的关系都在一年以前，当时并没有孙、蒋对抗的局面。孙在北洋军阀中总算比较的好，江浙地方政象亦总算比较的清明，他们与孙合作并不算无理由，既已与人发生关系，到吃紧时候舍之而去，是不作兴的。直到最近两个月，孙倒行逆施，到天津勾结二张，和丁、蒋等意见大相反，他们方能老老实实的和他脱离关系。中间这一段诚然是万分不值(既有今日何必当初)，然在一年前他们的梦想原亦很难怪。(故丁在君刻意欲在上海办一较良的市政，以渐进手段收回租界。)至于我呢？原来不甚赞成他们这类活动(近数月来屡次劝他们自拔)，但我们没有团体的严整组织，朋友们总是自由活动，各行其是，亦没有法子去部勒他们(也从未作此想)，别人看见我们的朋友关系，便认为党派关系，把个人行为认为党派行动，既无从辩白，抑亦不欲辩白。我之代人受过，总是免不了的(亦自甘心)，但因此颇感觉没有团体组织之苦痛，朋友中有能力的人确不少，道德学问和宗旨都是对的，但没有团体的一致行动，不惟不能发挥其势力，而且往往因不一致之故，取消势力，真是可痛。(1927年1月25日)

“研究系”与军阀孙传芳的合作，主要是丁文江的主导，梁启超只是一个不反对的旁观者。丁文江之所以愿意选择军阀，用傅斯年的话来讲是：“他认为改良中国的政治(他的政治大体上是行政)决不能等到所谓时机成熟，有机会不可失机会。他之参加孙传芳团体，是个三人团，陈陶遗、陈仪和他。他们三人想借机试验一回”；但更重要的，则是“研究系”一以贯之的“政治改良”立场——如梁启超所说，“孙在北洋军阀中总算比较的好”，宁愿在一堆

烂苹果中选择一只腐烂程度最轻的，也不愿意抛弃苹果去选择别种水果，这是“研究系”一贯的政治立场。

1927年1月2日：中产阶级不能自存，正当工人全部失业

梁启超家书：

“时局变迁极可忧，北军阀末日已到，不成问题了。北京政府命运谁也不敢作半年的保险，但一党专制的局面谁也不能往光明上看。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动工潮，现在汉口、九江大小铺子什有九不能开张，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我想他们到了北京时，我除了为党派观念所逼不能不亡命外，大约还可以勉强住下去，因为我们家里的工人老郭、老吴、唐五三位，大约还不至和我捣乱。你二叔那边只怕非二叔亲自买菜，二婶亲自煮饭不可了。）而正当的工人也全部失业。放火容易救火难，党人们正不知何以善其后也。现在军阀游魂尚在，我们殊不愿对党人宣战，待彼辈统一后，终不能不为多数人自由与彼辈一拚耳。”（1927年1月2日）

笔者注：

信中所谈及的两个问题：1、“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2、“正当的工人也全部失业”，是梁启超谴责中共包办下的“社会革命”，也就是工、农运动的主要理由。这两个问题是否属实？长期致力于工人运动，1927年前后战斗在“大革命”工运战场第一线的刘少奇，在1937年2月26日，给张闻天写了一封信，对十年前的那场稚嫩的“大革命”中稚嫩的工人运动做了深刻的反思。刘少奇说：

“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倘若你们看看汀州的工人运动是‘左’倾得‘岂有此理’，倘若某某同志咒骂苏区国营企业的工人‘要求过了’、‘不努力工作’，是‘左’倾得‘糊涂’，那我就要告诉你：这还算不了什么！一九二七年前，武汉、长沙、广州工人的‘左’倾错误，比这还严重到十倍！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名义上或还有十小时以上）。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火车轮船，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这在当时是较平常而且是极普遍的。工会是第一个政府，而且是最有力量，命令最能通行的政府，他的权力有时超过正式政府，你总听说过吧？……这些事干起来而且越干越厉害，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人心上要发生严重的影响，这是无疑的。企业的倒闭，资本家的关门、停业与逃跑，物价的飞涨，物资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与农民的反感（当时有许多小城市的工会被农民捣毁，而且是农民协会领导的），军官与国民党人的非难，就随着这种‘左’倾的严重程度而日加严重起来。而工人运动当时是共产党员负责的，这一切非难，就都加在共产党身上。人们并不责备工人，而责备这是出于共产党的指示，这就影响共产党与各方面的关系。”（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刘少奇的反思，证明梁启超信中所谈及的“现在汉口、九江大小铺子什有九不能开张，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确属事实。至于“正当的工人也全部失业”，1927年6月，武汉失业工人救济局有过一份统计，称当时武汉有失业工人14万人；武汉国民政府内部的报告中，外交部长陈友仁则有另一个数据：“失业的将近二十万人。”汪精卫所估计的数据，则是“失业的工人现共有三十万之多。”

何以一场以维护工人利益为宗旨的“工人运动”，最终带来的却是大量的工人失业？刘少奇的反思里其实提供了答案——“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其实情况比刘少奇所描述的还要糟糕，据郑超麟回忆：工人们不但以武装化的纠察队封闭商铺厂店，强迫店主厂主接受自己的要求，而且“手工业工人和店员向雇主算账，不仅要求增加以后的薪水，而且要求补加以前的薪水甚至算至几十年前的，所加的又比原薪多好多倍”，这样激进的结果，自然只能是雇主关闭商铺厂店逃亡。张国焘还记载了运动的一种恶性循环——随着工厂的纷纷倒闭和雇主的纷纷逃亡，失业的工人越来越多，其结果就成了：“工人们一方面要工厂复工，才不致失业，另一方面又提出一些迫不及待的经济要求，使企业更难经营”——失业时间越长，工人生计越艰难，“迫不及待的经济要求”就提得越高，企业就越不敢重新开张……国民党中央工人部在调查武汉纺织业迅速衰落的原因里谈到：工会势力过于庞大，工人纷纷怠工，无病也要求带薪休假，管理者则“简直不敢说”，以至于“商人纷纷歇业，以避工人之锋”。

社会普遍的不满，也反馈到了主持“工人运动”的共产党那里。据刘少奇给张闻天的书信里说：

“在起初，人们都期求共产党设办法，就是政府都并不直接去干涉工人。共产党在当时责无旁贷答应政府这些事，但共产党未能改正这些事，而且连阻止这些事的发展，都未作到。这就使人们都上了另外的路途。反革命从而大施阴谋，利用来组织反革命的暴动。共产党要来阻止工人这些事，又因为说服得不够与采取强迫办法（与逮捕工人），就不能不引起了工人的反感，大大的丧失了工会与党的信仰。如是一方面工人不满于工会与党，另一方面国民党人及其他的许多人又责备工会与党……”（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这也正应了梁启超所说的那一句：“放火容易救火难，党人们正不知何以善其后也。”

1927年1月25日：只有“国家主义青年团”有希望救中国

梁启超家书：

“思永来信所讲的政治谭，这种心理无怪其然，连我都有点如此，何况你们青年呢？打倒万恶的军阀，不能不算他们的功劳，我们想做而做不到，人家做了当然赞成，但前途有光明没有呢？还是绝对的没有。他们最糟的是鼓动工潮，将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一翻，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配者，安分守己的工人饭碗都被那些不做工的流氓打烂了。商业更不用说，现在汉口、武昌的商店，几乎全部倒闭。失业工人骤增数万，而所谓总工会者每月抽勒十余万元供宣传费（养党人），有业工人之怨恨曰增一日，一般商民更不用说了。”（1月18日）

“……万恶的军阀，离末日不远了，不复成多大的问题；而党人之不能把政治弄好，也是看得见的。其最大致命伤，在不能脱离鲍罗庭、加伦的羁绊——蒋介石及其他一二重要军人屡思反抗俄国势力，每发动一次辄失败一次，结果还是屈服。——国民党早已成过去名辞，党军所至之地，即是共产党地盘，所有地痞流氓一入党即为最高主权者，尽量的鱼肉良善之平民。现在两湖之中等级（中国本无资产阶级），已绝对的不能生存，全国生产力不久便须涸竭

到底，前途真不堪设想。若我们稳健派不拿起积极精神往前干，非惟对不起国家，抑亦自己更无立足地了。

“我看现在国内各党派中惟有“国家主义青年团”一派最有希望，近来我颇和他们为交谊的接洽。但其中主张亦不一致，内中有一派主张意大利莫索尼尼式者，结果还是一党专制，还是剥夺人的自由，我们绝对的不能赞成。但这一派人最有朝气，最能奋斗，将来希望他们能稍折衷以归于中庸，才有合作余地。留美学生中，此团体发达状况何如(听说从前是不甚多)，你们不特随时留意，恐怕将来要救中国，还是要看这一派的发展运用如何。”(1月25日。编辑注：此信分两次写成)

笔者注：

梁启超在信里提出了第三个他反对“大革命”中的工人运动的理由：“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在工人运动中呼风唤雨，真正的工人则流离失所。工运的领导者主观上是否有利用地痞流氓来打开局面的想法，笔者目前尚未见到相关资料，更多的材料则证明，帮会势力一直是中共在组织工人运动时的严重阻力和重要敌人，原因很简单——中共是一个以工人阶级为专政基础的政党，其势必要在工人当中积极发展工会，而工会势必与已经广泛存在于工人中的帮会势力发生利益冲突，二者极难互容。但在梁启超的语境，似乎是把一切破坏“中等阶级”生存的工运参与者，都视之为地痞流氓了——梁氏很早以前就说过：“夫所欲用之以起革命之多数下等社会，其血管内皆含有黄巾闯献之遗传性也。”所以，梁氏虽然赞成国民党的“政治革命”(北伐推翻军阀政权)——“打倒万恶的军阀，不能不算他们的功劳，我们想做而做不到，人家做了当然赞成”，却反对共产党包办的“社会革命”(工农运动)，在他看来，这样的社会革命，会激发“下等社会”民众血液里的“黄巾闯献之遗传性”，最后变成地痞流氓当道的“革命”。

梁氏接受“政治革命”，但坚决排斥“社会革命”，他希望中国能够走一条“社会改良”的道路。而要走通这条“社会改良”之路的关键，是一个“中等社会”的存在。在梁氏看来，：一个国家的进步和强盛，靠的是富人而非贫民，在经济发展方面尤其如此。梁氏为自己的“富人”概念作了一个定义：排除了那些“剥削兼并他人之所有以为己肥，乃害之而藏之”的剥削者之后，所余存的“中等社会”，颇类似于今天所谓的“中产阶级”。梁氏主张先在中国造就一个“中等社会”，然后再由这部分人去发动社会改良。如此，也就不难理解梁氏在目睹“中等社会”遭遇大破坏之后，对“大革命”的强烈抵制的态度了。

被梁氏寄予希望的“国家主义青年团”，是中国青年党的前身。该党与中共渊源极深，都是从少年中国学会分化出来的。青年党后来成为国、共之外的民国第三大政党，党魁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人信奉“国家主义”，长期在政见上与中共分庭抗礼——青年党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中共推崇“工人无祖国”(其实是工人阶级利益高于一切——金剑注)；青年党主张全民的民主政治，中共信奉世界革命和阶级专政。(详见[《转型中国 1923·民国第三大政党》](#))

1927年1月27日：“知识阶级”已成为反革命代名词

梁启超家书：

“近来耳目所接，都是不忍闻不忍见的现象。河南、山东人民简直是活不成，湖南、江西人民也简直活不成，在两种恶势力夹攻之下。全国真成活地狱了。不惟唐生智头痛，连蒋介石们也头痛。总而言之，共产党受第三国际训练，组织力太强了，现在真是无敌于天下。我们常说：‘他们有组织，我们没有组织。’谁知陈铭枢给他的朋友的信（我亲看见的），说的也正是这两句话。现在倒蒋陈、倒唐之声大盛于两湖、江西，李济琛在广东想自己练些非共产的军队（四师），到底被他们破坏，练不成功。蒋、唐他们自己安慰自己道：‘好在军队不在他们手里。’不错，现在南方军人确非共产派，但他们将来必倒在共产派手上无疑。现在南方只是工人世界，‘知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两湖、江西大小公私学校完全封闭，以改组名义封闭，但开学总不会有期。）而所谓工人又全是不做工的痞子流氓，看着生产事业都要停止真是不行了。将来我们受苦日子多着哩，现在算什么？我们只有磨炼身心，预备抵抗，将来还可以替国家做点事业，教小孩子们也要向这条苦路进行。”（1月27日）

笔者注：

梁启超所感受到的“‘知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的状况，其实与工、农运动中严重的“民粹”倾向有关。所谓“民粹”，有两个基本特征：1、绝对的排斥社会精英，也就是梁启超所谓的“知识阶级”；2、绝对的“平民利益”。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中有一段话，可谓大革命中的“民粹主义”的最佳注释：

“在第二时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后增入“恶意地”三个字）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所有一切过分（后更改为“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间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据《毛泽东选集》，中国共产党晋察冀中央局编译。1947年3月出版；其他版本对文字有所修改，见括号内注释）

“必须不准人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这其中的民粹味道是很浓烈的。更何况当时还有这样的认识：“乡下农民中，还是那些闯祸不怕大，生事不怕多的游民无产阶级分子，才有胆来领导这个革命。”李维汉多年后反思这段历史说：毛泽东将那些“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游民，即流氓无产阶级当作贫农的一部分，列入革命先锋之中，**说他们“最革命”，缺乏一分为二的分析**。农民运动中民粹若此，工人运动自然也不例外，知识阶级成为“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1927年3月21日：暴烈分子定要和我过不去

梁启超家书：

“今日下午消息很紧，恐怕北京的变化意外迅速，朋友多劝我早为避地之计（上海那边如黄炎培及东南大学稳健教授都要逃难），因为暴烈分子定要和我过不去，是显而易见的。更恐北京有变后，京、津交通断绝，那时便欲避不能。我现在正在斟酌中。本来拟在学校放暑假前作一结束，现在怕等不到那时了。……南方最闹得糟的是两湖，比较好的是浙江。将来北方怕要蹈两湖覆辙，因为穷人太多了，（浙江一般人生活状况还好，所以不容易赤化。）我总觉着全个北京将有大劫临头，所以思顺们立刻回来的事，也不敢十分主张。但

天津之遭劫，总该稍迟而且稍轻。你们回来好在人不多，在津寓或可以勉强安居。还有一种最可怕的现象——金融界破裂。我想这是免不了的事，很难捱过一年，若到那一天，全国中产阶级真都要饿死了。现在湖南确已到这种田地，试举一个例：蔡松坡家里的人已经饿饭了，现流寓上海，他们并非有意与蔡松坡为难（他们很优待他家），但买下那几亩田没有人耕，迫着要在外边叫化，别的人更不消说了。恐怕北方不久也要学湖南榜样。”（3月21日）

笔者注：

梁启超担心“暴烈分子定要和我过不去”，不是没有道理的。随着“**知识阶级**”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1927年6月，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临时执行委员会曾呈请中央**通缉“学阀”，排在首位的是章太炎**，随之家财被没收；“研究系”的骨干张君勱、张东荪也列名其中。

蔡松坡即蔡锷。蔡家在湖南尚有几亩薄田，也未遭到农民运动的直接冲击，但仍不得不为生计流亡上海，个中原因，与当日底层贫民搞的“平粜阻禁运动”有密切关系。该运动的本意，是底层贫民担忧一旦遇上青黄不接的年份，省内粮价暴涨，进而威胁自己生计，故而以农民协会的名义，禁止一切粮食出境。

这种措施既然是贫农自己所定，本来理应对贫农有利。但实际却不然。措施最先损害的是佃农、自耕农、中农、富农和地主们的利益——这些农民，都有在市场上自由出卖粮食的需求，“平粜阻禁”之后，粮食不能在丰收与荒歉之间流动，导致其价格极低，种地反成了亏损之事，中共的《向导》周报描述说：“政府催还田赋，地主即推谷卖不出去”，政府对此也无计可施；无力抗拒政府催赋的自耕农和佃农，则纷纷抛荒或违背租佃契约逃走。蔡锷家中多是老弱妇孺，几亩薄田又无人愿意租耕，无奈只能流落上海，寄食乞讨于故旧之门。佃农、自耕农们放弃种地之后，粮食大量减产，贫农们美好生活的愿景自然也落了空——更严重的是：贫农们这样闹，将粮食控制在省内，不许外运，导致前线的北伐军补给出现了严重问题，激起了军队的愤怒。

而贫农们之所以能够将“平粜阻禁运动”付诸实施，是因为他们掌控了农民协会。据时人的调查，农民协会不仅“参加乡村统治权”，而且取代政府，实行“农协专政”，执行司法行政大权，独裁一切，“遂成为一个农民专政的机关”。不但乡村的一切权力归农会，“并且已经进一步蚕食、干与县政府”，几乎所有的农民问题要交给农会，工人问题要交给工会，学生问题要交给学联才能解决，“而县政府则门可罗雀，简直等于一种装饰品”。这时的湖南，“统治权在城市确已转到工会，在乡村中确已转移到农民协会。”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湖南的农民运动，虽然由共产党包办，但发动起来之后，却已不受共产党的控制。按中共湖南区委1927年3月公布的数据，“在农协会的旗帜下，起来了的已1000万余人”，但当日湖南的农村党员仅仅只有1700余人，绝大多数的农民协会，都不在中共的控制之下；许多则直接落入了地痞流氓手里，成为社会危害。舆论批评汹涌而至，以至于1927年1月，湖南省农民协会不得不做出对各级农协进行“洗会”的决定。

所谓“洗会”，就是清洗掉各级农协里的地痞流氓。该决定要求：一、为使真实农民意见，在各级协会中充分表现，乡农协执行委员须绝对是耕田农民、专营手工业者，或体力劳动者亦可，其他的分子，尤其是地痞流氓，应严加淘汰；二、区农协执行委员3/5须属真实农民，专营手工业者，或体力劳动

者亦可，2/5 则属于有职业的知识分子，或是行动上表现为农民谋利益的人。带有流氓地痞性质的人，即应严厉防止，以免扰乱农民组织；……

但因为毛泽东以“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为宗旨的《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的出炉，这次整顿没有被严格贯彻下去，中途流产。农民协会这一事物，因其失控，也越来越被国民党人所诟病，汪精卫 1927 年 6 月 1 日在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的愤怒批评，与梁启超的言辞几乎一模一样：

“照他们这样胡闹，打到湖南，湖南完了；打到江西，江西完了；打到河南，河南又完了。中央只好关门，还革什么命！本席可以大胆说一句：农民协会是一个空前的错误，国共两党同志都应该明明白白承认的。我们看，农产品被摧残完了，工商业家都打得跑光了。上不要中央，下不要人民，还革什么命！”

1927 年 5 月 5 日：所谓什么为主义而战，都是骗人

梁启超家书：

“近来连接思忠的信，思想一天天趋到激烈，而且对于党军胜利似起了无限兴奋，这也难怪。本来中国十几年来，时局太沉闷了，军阀们罪恶太贯盈了，人人都痛苦到极，厌倦到极，想一个新局面发生，以为无论如何总比旧日好，虽以年辈很老的人尚多半如此，何况青年们。所以你们这种变化，我绝不以为怪，但是这种希望，只怕还是落空。

“我说话很容易发生误会，因为我向来和国民党有那些历史在前头。其实我是最没有党见的人，只要有人能把中国弄好，我绝对不惜和他表深厚的同情，我从不采那‘非自己干来的都不好’那种褊狭嫉妒的态度。……受病的总根源，在把社会上最下层的人翻过来握最高的权。我所谓上层下层者，并非于富贵贫贱等阶级而言，乃于人的品格而言。贫贱而好的人，当然我们该极端欢迎他。今也不然，握权者都是向来最凶恶阴险齷齪的分子，质言之，强盗、小偷、土棍、流氓之类个个得意，善良之人都变了俎上肉。这种实例，举不胜举，我也没有怎么闲工夫来列举他。‘党军可爱，党人可杀’这两句，早已成为南方极流行的格言……总而言之，所谓工会、农会等等，整天价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茶饭，而在这种会中，完全拿来报私，然他们打的是‘打倒土豪劣绅’旗号，其实真的土豪劣绅，早已变做党人了，所打者只是无告的良民。

“……近来蒋介石们不堪共产党的压迫，已经翻过脸，宣言‘讨赤’，而且残杀的程度比北方厉害多少倍。同时共产党势力范围内也天天残杀右派。（前面那几张纸都是十天以前陆续写的，现在情形天天剧变，很有些成了废话了。）据各方面的报告，最近三个礼拜内双方党人杀党人——明杀暗杀合计——差不多一万人送掉了，中间多半是纯洁的青年。可怜这些人胡里胡涂死了，连自己也报不出帐，一般良民之人枉死城者，更不用说了。尤可骇怪者，他们自左右派火并以来，各各分头去勾结北方军阀，蒋介石勾孙传芳，唐生智勾吴佩孚（都是千真万真的事实），双方又都勾张作霖。北军阀固然不要脸，南党阀还像个人吗？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可见所谓什么为主义而战，都是骗人，现在揭开假面孔，其形毕露了。

“……思永来信说很表同情于共产主义，我看了不禁一惊，并非是怕我们家里有共产党，实在看见象我们思永这样洁白的青年，也会中了这种迷药，即全国青年之类此者何限！真不能不替中国前途担惊受怕，因此越发感觉有做文

章之必要。你们别要以为我反对共产，便是赞成资本主义。我反对资本主义比共产党还厉害。我所论断现代的经济病态和共产同一的“脉论”，但我确信这个病非“共产”那剂药所能医的。我倒有个方子，这方子也许由中国先服了，把病医好，将来全世界都要跟我们学，我这方子大概三个月后便可以到你们眼边了。思永不是经济学专门家，当然会误认毒药为良方，但国内青年象思永这样的百分中居九十九，所以可怕。等我的方子出来后，看可以挽回多少罢。”

（1927年5月5日）

笔者注：

正如那个年代大部分的爱国忧世的青年们（如胡适）集体左倾倒向社会主义一般，梁启超的两个儿子，梁思忠与梁思永也不能例外。其实梁启超本人也倾向于社会主义，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反对资本主义比共产党还厉害”。所以，梁氏与他年轻的儿子们的思想区别，不在于是否同情社会主义，而在于是要“社会革命”，还是要“社会改良”。

梁启超很早就对“社会主义”下过定义，他说：“社会主义，是要将现在经济组织不公平之点，根本改造。……要之，对于现在的经济组织，认为不合人道，要重新组织一番，这就是社会主义。”——“改造”二字，既包括“革命”，也包括“改良”，但梁氏始终都非常坚决地提倡“社会改良”。

不过，梁氏批评1926-1927年的“社会革命”，称其“受病的总根源，在把社会上最下层的人翻过来握最高的权”，却没有看透“社会革命”的实质——尽管他努力做了补充：“我所谓上层下层者，并非于富贵贫贱等阶级而言，乃于人的品格而言。贫贱而好的人，当然我们该极端欢迎他。今也不然，握权者都是向来最凶恶阴险齷齪的分子，质言之，强盗、小偷、土棍、流氓之类个个得意，善良之人都变了俎上肉。”恰恰是这段补充，偏离了“社会革命”最危险的内涵：“阶级斗争”。——“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最关键的区别，正在于有无“阶级斗争”。“政治革命”针对的是执政者，是现政权，它推翻的是暴政，而不是某个阶级；“社会革命”则不然，欲以“社会革命”的形式搞社会主义，“将现在经济组织不公平之点，根本改造”，则必然会走向穷人革富人之命，无产者革有产者之命……

晚年梁启超。梁氏如此评价“国共合作”：“近年来的国民党本是共产党跑进去借尸还魂的。民国十二三年间，国民党已经到日落西山的境遇，孙文东和这个军阀勾结，西和那个军阀勾结——如段祺瑞、张作霖等——依然是不能发展。适值俄人在波兰、土耳其连次失败，决定“西守东进”方针，倾全力以谋中国，看着这垂死的国民党，大可利用，于是拿八十万块钱和一大票军火做钓饵，那不择手段的孙文，日暮途穷，倒行逆施，竟甘心引狼入室。孙文晚年已整个做了苏俄傀儡，没有丝毫自由。”

青年胡适。1954年，在台北《自由中国》社的茶话会上，胡适对众人谈起自己1926年的社会主义信仰：“那时候我与这位朋友所讲的那些人有同样的错误（信奉社会主义）。现在我引述一句。在民国十五年六月的讲词中，我说：

‘十八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当时讲了许多话申述这个主张。现在想起，应该有个公开忏悔。不过我今天对诸位忏悔的，是我在那时与许多知识分子所同犯的错误；在当时，一班知识分子总以为社会主义整个潮流当然是将来的一个趋势。我自己现在引述自己的证据来做忏悔。”（《从《到奴役之路》说起》）这番忏悔未见到位——胡适没有来得及看到国民党的社会主义性质在台湾70-80年代造就

的均富奇迹——但却很直观地反映了爱国忧世青年在 1920 年代普遍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

地质学者、“研究系”成员丁文江。目睹南方“社会革命”的乱象，许多国、共之外的知识分子们期望将梁启超推向政治前台以做抗衡，梁启超自己曾如此描述：“近一个月以来，我天天被人包围，弄得我十分为难。简单说，许多部分人太息痛恨于共党，而对于国党又绝望，觉得非有别的团体出来收拾不可，而这种团体不能不求首领，于是乎都想到我身上。除直接找我外，对于我的朋友门生都进行不遗余力。（研究院学生也在他们运动之列，因为国家主义青年团多半是学生。）”研究系成员内部对此意见不一，张君勱极力主张梁启超出来登高一呼；丁文江却坚持认为梁的性格不适宜搞政治，坚决反对。

1926 年前后的刘少奇。此一时期，刘少奇主要在武汉和上海领导工人运动。在 1937 年给张闻天的信中，刘少奇用亲身经历详细讲述了“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并对中国工运的独特性有所总结：“‘流氓性’带得很重。中国工人的流氓式生活，流氓组织在工人中的长期存在，也影响工人运动。在工人得到解放以后，他们就随心所欲、无所顾忌的，不顾及将来与前进地行动。”

王国维。关于王国维在 1927 年的自杀，梁启超如此理解：“静安先生自杀的动机，如他遗嘱上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才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捶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

中国青年党党魁曾琦。曾氏毕生坚守“国家主义”和“民主政治”的信仰，史学家沈云龙如此评价曾氏的一生：“民国以来，能像慕韩先生以书生创党，无武力，无外援，一空依傍，不倚赖任何已成势力，始终以国家主义号召爱国青年，领导全党同志从事反对阶级专政及所谓‘党治’，并促使民主宪政卒能奠其始基，如此奋斗逾三十年之久的政治家，环顾海内，能有几人？”

海陆丰地区的“农民协会”会员证。按照国民党为农民运动划定的尺度范围，“农民协会”必须在政府领导下工作；但实际情况则是“农民协会”架空了地方政府，实行“农协专政”，执行司法行政大权，独裁一切，“遂成为一个农民专政的机关”。

1927 年湖南境内的宣传木刻版画《农民协会万岁》。因为农协禁止粮食外运出省，威胁到北伐军队的后勤补给，给了国民党发动清党一个极好的借口。

}

七、中共在与张东荪的论战中战败

以色列的犹太人屯垦区基布兹(Kibbutz)农场也是社会主义，人们自由组合，并没有阶级斗争，也没有伤害他人，至今，基布兹农场纷纷破产。赫茨尔在他的《犹太国》中，提出的“社会主义犹太国”构思，很大程度上更接近马克思恩格斯所极力反对的“杜林折衷社会主义理念”，但还是得到了社会主义的兄弟苏联的支持。

社会主义必然破产，因为人有佛性与魔性，惰性是人的魔性，公有制大锅饭，不能多劳多得，造成分配不公，必然导致懒惰成风，大锅饭放大了人的魔性，干活是辛苦的，谁不想偷懒？从而使得效率低下，最后由于效率低下而破产。世界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因为经济崩溃而垮台，就是这个原因。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人应该是正义之人，由于公有制大锅饭放大了人的魔性，必然使得人的佛性受到压制，所以，它是反动的，就应该破产！这是公有制的魔性原罪！中共为什么到现在不失败？因为中国在经济上的优势是巨大的，是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公有制造成的劣势能掩盖过去，更是因为中共的改革开放就是部分取消公有制，实际是在经济上走蒋介石道路，所以，不容易在经济上失败。中共改革开放的第一步是“党企分家”，现在习近平又在搞“党企合一”、“党指挥企”，他在走马列主义反动的回头路！

社会主义并不可怕，像以色列犹太人那样，只要不影响他人，谁爱搞他自己搞去，旁人乐见其没有竞争力。社会主义并不可怕，可怕而且有剧毒的是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是寄居在社会主义里面的可怕且剧毒的病毒，通过传播社会主义来传播。虽然公有制很落后，但是，马列主义的剧毒并不是公有制，而是阶级斗争与对现存所有文明的摧残。可怜的中国人，国门刚一打开，香花毒草病毒一齐涌来，就如对病毒毫无抵抗力的人一样，香花的养分未能吸取，却中了毒草与病毒的剧毒。像梁启超、张东荪这样及时发现病毒并彻底抛弃的智者并不多，陈独秀是多年后才抛弃马列。对马列主义的批判，张东荪的语言最到位、最准确，至今很难有人超越。

张东荪是中国传播社会主义思潮最早的宣传者之一，因而受邀参与中共上海发起组。可当他发现自己信仰的社会主义并非归属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时，便又最早退出上海发起组。他如果留在共产党内，也和陈独秀一样是祖师爷级别的人物。他很快看清楚了社会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荒谬，对社会主义进行批判。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挑起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鼓吹新康德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

张东荪是浙江杭县人，家境殷实，父母思想开化。将长大后的他送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深造，在那里接触了一些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是基尔特社会主义，与马列主义的差别较大。辛亥革命暴发后，张东荪回到国内，被邀请到南京大总统府担任内务部秘书，后来又担任新报主笔，以及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借此机会，大力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张东荪成为中国宣传社会主义的风云人物。

1917年初，张东荪接任《时事新报》主笔，直至1924年春辞职。《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致力于宣传新思潮，当时与同样是宣传新思潮的陈独秀《新青年》齐名。1919年9月1日，张东荪又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旨在致力于“改造中国与世界”。至于怎样改造中国，他认为必须要“依第三种文明的原则来改造”。何谓“第三种文明”，那就是社会主义。这期间，《学灯》和《解放与改造》发表的颇有影响的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有：《劳动与资本》、《河上肇博士关于马克思之唯物史观的观察》、《社会主义之进化》、《马克思社会主义之理论的体系》、《社会党泰斗马克思之学说》、《社会主义两大派之研究》、《社会改良与社会主义》等。而张东荪所撰写的文章《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在当时最具典型意义。

在《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文章中说，社会主义“不单是马克思一人的学说”。马克思专注于物质生活的改造，要推翻“全地球的旧制度”。这种社会主义恰是张东荪所不能认同的。他所主张的社会主义“不是从物质方面破坏现在的制度入

手，乃是从精神方面传播一种新思想、新道德、新人生观、新生活法入手，也就是先从打破现在社会的资本主义的习惯入手”。即致力于文化运动，让社会主义制度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慢慢地过渡，而不是通过暴力革命，这才是社会主义“浑朴的趋向”，也是“唯一的趋向”。

社会主义在中国，就如打开的潘多拉魔盒，纷纷作怪。当时的中国，正如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中所说：“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 19 世纪 40 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至于张东荪所津津乐道的“浑朴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有着怎样的本质区别，人们并没有时间和实例去辨别，只知是社会主义，是对现行制度、体系挑战的异端。

在上海，社会主义思潮的宣传确激进，而开此风气之先的便是《新青年》和《学灯》、《觉悟》、《星期评论》三大副刊。就这样，张东荪成为了宣传社会主义的风云人物。1920 年 4 月，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等人来到中国，表示要帮助中国建立像苏俄那样的政党。维经斯基到上海找到陈独秀，要成立一个类似苏俄的政党。维经斯基就组党问题与陈独秀多次交谈，参加交谈的有张东荪、沈玄庐、戴季陶等。在讨论中，维经斯基正式提出中国已到了组党的时候，而张东荪却认为中国还不具备建党的条件。张东荪后来谈到此事时也说：“我和陈独秀先生来往甚多，彼时他们虽明知我是赞成社会主义，但在组织共产党的时候却不敢来约我，因为他们亦未尝不知我反对在这样工业未发达的中国鼓动阶级斗争的罢工与怠工。所以我始终是一个‘非党派者’。”

在维经斯基召集的组党人员中，张东荪最早退出了中共上海发起组。他虽退出发起组，但还是不遗余力地宣传和介绍社会主义，却又从不主张实际的社会主义运动。一句话，他的社会主义是“温和型”的，而不是主张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最多算是以色列基布兹（Kibbutz）型的，也是基尔特型的，只是人的组合，不涉及阶级斗争，基布兹虽然纷纷破产，也无关大雅，不造成社会冲击。张东荪对共产党的真知灼见，这就必然与陈独秀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分歧，一场思想冲突和笔墨官司也就难以避免了。

1920 年 10 月，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来华演讲，张东荪对此所表现出的热情以及对社会主义的批评，更使他的共党朋友们惊诧。他由罗素的演讲而重新审视自己所宣传的社会主义，认为“中国的惟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要改变中国的状况，惟有“开发实业”，“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并批评社会主义的宣传是“空谈主义”。

对此，李达最早发表批评文章，称张东荪是个“无主义无定见的人”。紧接着，陈望道、邵力子也发表文章表示反对张东荪。在受到朋友的批评后，张东荪又发表《大家须切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引述罗素在中国讲演时的话：“中国第一宜讲教育，使无知识的有知识，使有知识的更进一层。第二是开发实业救济物质生活。至于社会主义不妨迟点。”这些意见引起老友陈独秀的关注，他在致张东荪的信中提出了两个极为实际的问题：“（一）社会的工业有没有成立的可能性？（二）先生所谓在通商口岸与都会里得着‘人的生活’的，到底有多少人，这班人属何阶级，他们是否掠夺他人之劳力与（获）得比较好的生活？”

李达真是无知，有主义有定见就好吗？有好主义才是好！有定见那叫做顽固，叫做不可理喻，世界上最可怕、最恶毒的就是这种有定见的人，水火不通、油盐不进，像习近平那样“不忘初心”，哪怕“初心”是错的也要坚持，甚至把他的

“初心”强加给所有人，这是最大的害己害人，害己也就罢，偏偏还要害人。坚持错误定见的畜生就应该千刀万剐，中国人讲“从善如流”，这是最好的做人原则，一个不能“从善”的生命是无资格做人的。陈独秀却在阶级里面闹腾。看到中共的顶尖理论家李达与陈独秀，就觉得他们愚不可及，在空谈误国，为引进马列邪教罪大恶极，中共理论家们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书生误国团体，真的非常鼓励所有的共产党员特别是理论家们阅读金剑的书，治治他们的蠢病，像王沪宁这样的人更应该必读，看看金剑是如何揭批他所崇拜的辩证法与马列主义的。

针对张东荪提出的“开发实业非资本主义不可，集中资本非资本家不可”的言论，陈独秀反驳道，这正是他们之间“重要的争点”。他认为：中国可以用社会主义开放实业，无需非资本主义不可，“中国资本家都直接或间接是外国资本家底买办，只能够帮着外国资本家来掠夺中国人，只望他们发达起来能够抵制外国资本家，能够保全中国独立，再过一两个世纪也没有希望”。

张东荪并不接受陈独秀的观点，所作长文《现在与将来》便是他对“社会主义论战”的最终态度。文章把中国的现状概括为“四病”交加，即“无知病”，人民没有知识；“贫乏病”，人民多困于生计；“兵匪病”，兵连匪结，民不聊生；“外力病”，外国列强恃势欺凌中国。这些都是当时中国的实情。

张东荪认为要根治“四病”，只能对劳动者进行改良，只能“开发实业”，“增加富力”。这就要依靠渐起的“中产阶级”，即他称之为的“财阀”。张东荪说：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除“少数工厂有工人以外，简直是没有”，他们“人数又少，直不能有何势力”，“人民贫乏太甚，求食不得，不能久持”。在此背景条件下，如果高喊“劳农主义”，那必定是“伪劳农主义”。他老调重弹，中国目前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更不可能组织无产阶级政党。

在张东荪看来，中国若实现社会主义，是不能超越资本主义的阶段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只能“静待”，只能做这样一些工作：一是普通的文化事业，二是推行广义的教育事业，三是切实研究社会主义学说，四是协社的实行，也就是实行合作社的方法。这些才是将来实行社会主义的基础性准备工作。应该说这些思想是切近中国的现实，然而，他的主旨思想是取消建立共产党，不同意建立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当然是那一代共产党人所无法容许的。

中共“二大”后不久，陈独秀给张东荪去信，提出发展中国实业应该是“国家社会主义”的途径，实际上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张东荪看到陈独秀已经正视中国的现实，在回信中又再次劝告这位当时的中共领袖，不要将革命的矛头对准资产阶级，打倒军阀才是时下的当务之急，如果军阀不除，“劳动阶级即把资产阶级完全打败，也是不相干的，还是仍在十八层地狱里么？”

这时，张东荪还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又叫行会主义、工会主义，主张否定阶级斗争，鼓吹在工会基础上成立专门的生产联合会来改善资本主义，只承认改善工人出卖劳动的条件，却不消除根本制度，反对建无产阶级的政党）的人，集中到《时事新报》副刊《社会主义研究》的麾下，公开亮出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旗帜，以表明与陈独秀、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的不同，这就是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分野——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张东荪所追求的即是后一种社会主义，就是犹太人的基布兹。虽然社会主义最终会破产，但是毕竟没有暴力，对国家的伤害较低。

1932 年 8 月 20 日，张东荪发表《阶级问题》一文，集中批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他说，马克思对“阶级”的阐释本身“是一个极不清楚的概念”。社会学定义的“阶级是广义的，而马克思派的阶级是狭

义的”。按照马克思的“一部人类史乃是一部阶级斗争史”的说法，那岂不是说“**历史是人类相斫书**”，“**是打仗的记录而已**”。他不同意战争的阶级属性的说法，认为战争是人贪婪、掠夺和占有的天性所为，“国与国的战争，人种与人种间的虐杀，若都是以阶级斗争论，则阶级的意义便不明了”。

张东荪认为，中国既不是封建社会，又不是资本主义前期，如果非要套用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那“实在是一种拙笨到万分的事”。马克思的公式只“不过是欧洲各国的历史的共相，而决不能当作一个普遍的范畴，亦不完全适用于我们东方”。他承认阶级的存在，却不赞成将阶级明确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认为，马克思之所以这样划分，是出于“战略”的考虑，为了进行社会革命，即“**以一个阶级为基础来抢政权**”。

1932年8月，当中共的苏区一个个建立，土地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各地中共的力量也不断壮大时。这些在张东荪看来，属于暴力革命范畴。张东荪专门发文评论称：国与国的战争、人种与人种间的虐杀，若都是以阶级斗争论，则阶级的意义便不明了。

张东荪对阶级的划分有自己的见解：“中国的社会阶级都具有东方的色彩。”即阶级“是指社会上由某一种利益与某一种机能而归类的人们而言”。通俗地讲，中国的阶级是以所从事的行业而划分的，一种行业“而同时即是一个阶级”。中国有农、工、商三大类，自然也就形成三大类阶级。在这三大类阶级之外的，他将之定义为“余剩阶级”、“游离分子”。他对自己独创的这个“余剩阶级”，一直带有很深的成见，也对中共领导的工农革命不理解不赞同，以致产生很大的抵触。游离分子最容易变成革命分子，变成社会的不安定分子，也就是共产党最初口里的“流氓无产者”。

张东荪认为，中共领导的“红军”，其基础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只是“军阀的散股与土匪的化身”，因为**中国农民完全没有阶级意识**，而工人不能形成一股左右政治的力量，故，这个革命其实不算是“无产者革命”，“依然只是中国历史上的揭竿而起的老套子。”

就这样，中共的理论家们在与张东荪的论战中战败！

张东荪在1931年出版的《道德哲学》一书里，就说“**资本主义不会灭亡，共产主义不能实现。如实现则劳动者都就会饿死**”。又说“**把马克思主义列为学说，乃人类之奇耻，是思想史上的大污点**”。在1934年出版的《唯物辩证法论战》一书里，张东荪说“**马克思派的企图不但不会成功，其结果只弄成既非科学又非哲学的东西，终谓四不像而已**”。该书的题辞——“**如有人要我在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二者当中选择其一，我就会觉得这无异于选择枪毙与绞刑**”。1946年出版的《思想与社会》一书里，张东荪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民主的，结果必变成少数人的专制，而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除此以外，中共上台后，张东荪私下里讲“**解放三年来一直觉得不自由**”（注12）。

可以肯定地说，马列主义学说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正常论战中已经战败。现在看张东荪对马列主义的批判，真是真知灼见，那么多共产党人都没有他有智慧，几十年后的那么多共产党，都没有他有智慧。即使是现在，把他的文章拿出来在中共党员中传播，一定会造成中共理论的坍塌。

张东荪的爱国热情与反独裁思想一直被中共利用，从而也批判国民党。抗日时，张东荪被中共的假抗日所欺骗，帮助过中共。中共还利用他劝降傅作义，毛泽东曾经说过：“北京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在这期间张东荪曾经与费孝通、

雷洁琼到西北坡拜访过毛泽东。交谈中，张东荪对中共当时外交政策上一边倒的主张进行批评，认为中国想要迅速发展，就一定不能与美国翻脸，不能成为苏联与美国争霸的牺牲品。但毛泽东对张东荪的观点进行了反驳，称他们存在亲美恐苏的思想。因此交谈不欢而散。

1949年9月21日，中共全国政协召开，张东荪作为民盟代表参加了会议，被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汉奸文人鲁迅(即周树人)的弟弟周建人也参加了全国政协会议。

9月30日，选举中共国的主席，统计选票时，发现毛泽东少了一票，无法全票当选。工作人员复查，发现张东荪投了反对票。

中共夺政后，张的利用价值已经完结，又怕他传播他的思想，马上对他进行报复，何况他是唯一投票反对毛泽东的人，毛泽东如何能放过？毛泽东亲自给他定下“叛国罪”，把他一直关到87岁死亡为此，中共怕他怕到骨子里去了。他的几个高级知识分子儿女也被迫害，死伤惨重。

中共怕张东荪怕得要死，直到1957年反右派都不敢放出来。就算是1957年反右前，右派们的言论很难有张东荪30年前对共产主义与中共批判的深度、广度与激烈程度，特别一些年轻的右派们，看不清中共与共产主义的邪恶，是理论研究的底子不够深。

毛泽东共产党好毒啊，斗嘴失败就用暴力，什么马列真理都是假的，是谎言，是谬论，只有谬论才用暴力来维护。

张东荪正如列宁嘴里说的“有用的白痴”。连张东荪这个把马列主义看透的人还上中共的当，可见，中共比其它共产主义组织更加邪恶，也警醒我们这个民族，需要彻底看透共产主义，还要有与中共斗争的智慧与胸怀。

像梁启超张东荪这样最早了解马列主义的人，都走上了反马列主义的道路。共产党论战败了就拿出流氓手段，关押张东荪几十年直至死亡，如果梁启超不死，也难逃如此恶运。我说：“暴力是马列主义的最高真理”。然也！或者更应该改成“流氓是共产党的最高真理！”

共产党人对于什么叫做社会主义，什么叫做阶级与阶级斗争，什么叫做封建社会，什么是马列主义都不懂，就胡乱地崇拜，并把中国往社会主义道路上推，真是一群“书生误国”的典型。

注 12: [翦伯赞 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自杀之谜](#)——章诒和

八、沈定一血脉觉醒从建共先锋到灭共先锋

在中共的建党史上，还有一个特殊人物，他鼓吹社会主义与马列主义，他与陈独秀一起在上海创建中共上海小组，后来他加入国民党，从一个坚定的共党分子，变成一个最坚定、最勇敢的铲共分子。最后遭暗杀，至今中共不敢承认暗杀了他，他的死成为无头公案。他就是沈定一。

沈定一是清末秀才，清代[进士沈受谦](#)之子，号玄庐，瞿秋白妻子杨之华的公公，1883年出生，十八岁中秀才。光绪三十年（1904年）（21岁）起，先后任清朝云南省广通县知事、武定知州、云南省会巡警总办等职，身为“**四品大员**”，身份挺显赫、日子挺滋润、前途挺无限。1908年，他因帮助同盟会发动河口起

义被人告密，遂赴日本留学并加入同盟会。

沈定一于日本留学期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曾散尽家财，筹集两万两白银给孙中山。能拿出两万两白银，称得上巨富之家。[辛亥革命](#)爆发，他参加光复上海的武装起义，同时又招收革命青年 1300 余人，在沪创立“中华民国学生团”，自任团长，受到孙中山的嘉奖。1912 年 1 月，被选为浙江省首届议会议员。

袁世凯篡权后，沈定一在上海组织“公民急进党”倒袁，并在长江中下游各大城市发展组织。1913 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沈奋起响应，10 月倒袁失败后遭通缉，于次年避居日本。在日本参加留日学生总会，任总干事。后与[刘大白](#)等人往南洋新加坡、苏门答腊等地。1916 年 6 月回国，9 月当选为[第二届浙江省议会议长](#)。在主持省议会期间，沈定一召开过 1 次常年会、2 次临时会，总计开会 85 次，通过议案 113 项，其间，议决兴办省立第二、第三、第六、第八、第九师范学校，培养师资，普及教育。还力阻北洋军阀对浙江的控制。1917 年 1 月 4 日，他在杭州召集了 4000 余人的公民大会，提出“浙人治浙”，反对北洋系杨善德、齐耀珊到浙主政。会后又与蔡元培、章炳麟等人，作为公推代表分赴北京、南京请愿，虽未果，仍无所畏惧，直斥杨、齐谋乱附逆，敦促他们悔悟。遭二人密令缉捕，遂离杭避居沪上。

1917 年参加新文化运动，先后在上海、南京主编《星期评论》和《劳动与妇女》等刊物，宣传马列主义思潮，醉心于社会主义学说。1920 年沈定一与陈独秀、李达在沪组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加入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为早期中共党员。

五四运动前后，沈定一立足上海，提倡白话文和文学革命。1919 年 6 月，与[李汉俊](#)、[戴季陶](#)等共同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周刊，宣传新思想，研究和介绍社会主义和世界劳工运动，为世人瞩目。该刊共出 53 期，沈撰写诗文 124 篇。1920 年 4 月，沈定一与陈独秀、李汉俊等参与组织了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上海工人游艺会。1920 年 5 月，与陈独秀等在上海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相继在《劳动界》、《劳动与妇女》杂志上撰写文章，宣传革命思想。1920 年 8 月，上海组建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员包括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定一、施存统、俞秀松等 7 人**，戴季陶起草了党纲却没有加入，沈定一也参与起草《中国共产党党纲》。七人中浙江籍有四个，除了沈定一，其他三人陈望道、施存统、俞秀松都出自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而沈定一则是一师的精神导师兼物质食粮供给者，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力可见一斑。

1921 年初，沈玄庐（定一）随陈独秀南下广州，与[陈独秀](#)、[谭平山](#)创办《劳动与妇女》杂志，沈任主编。

沈定一是大地主，给孙中山革命捐过很多钱，拿出更多的钱支持中共。他躯干修伟，双目有神，声音洪亮，学问广博，能言善辩，演讲极富说服力和煽动性。而且沈定一酒量极好，喝酒如喝水，善于交际应酬，且平易近人，所以许多青年人都为之倾倒——江浙一带许多优秀的共产党人如宣中华、徐梅坤等，都是由他一手栽培的。

沈定一是衙前农民运动的发起者、组织者和领导人。他把共产党的农民革命思想灌输到农民中，并培养出“农民斗士”[李成虎](#)等一批农民先进分子，使得衙前农民革命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1921年4月沈定一回到家乡萧山衙前，开展教育农民、组织农民的农村革命斗争。他身穿普通农民衣服，操着家乡方言，用农民常见的事例作比喻，不仅使农民听得懂，也说到了农民的心坎上。**8月19日**，沈定一在龛山作了题为《谁是你们的朋友》的演讲，从“金钱的发生”揭露剥削的秘密，提出“世界上一切东西，都应该归劳动者所有。”**9月23日**，在船坞山北作了《农民自决》的演讲，进一步揭露了地主剥削的残酷，亮出了“废止私有财产”、实现“土地公有”的政治主张，使农民听了“如见天日”。他为了迅速建立农民组织，独资创办衙前农村小学，作为开展农民运动的基地，邀请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和浙江女子师范学校赤色师生[刘大白](#)、[宣中华](#)、[徐白民](#)、[唐公宪](#)、[杨之华](#)等来校任教。以学校为阵地帮助农民学文化，宣传革命道理，引导青年学生走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发动农民，筹建农民协会，主张“农民自决”。

在沈定一的努力下，培养了一批农民积极分子，如萧山的李成虎、绍兴的单夏兰等。沈定一支持李成虎等贫苦农民保卫自身利益的斗争。一次是打米店。这年**5月**，正值青黄不接之时，粮食米价涨高，中共暗中运作下，引起农民的气愤（农民不喜欢粮价高，真是天下奇闻）。在沈定一等的支持下，李成虎把围身布绑在竹竿上当大旗，带领农民捣毁龛山“周和记米店”及附近哄抬物价的米店，迫使粮商降价。周和记米店是沈定一原配夫人家所开，妻弟在经营，也就是**他带头砸了老丈人家的店，真是一“革命天才”**！一次是争得了被绍兴县官绅把持的西小江的养鱼权和捕鱼权。这让农民看到了自身团结的力量，提高了斗争的信心和勇气。**1921年9月**，沈发动了以萧山衙前为中心的萧绍农民运动，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有纲领、有章程的农运组织——衙前农民协会，开展抗租减租斗争。期间，沈多次到绍兴县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是最早在绍兴进行革命活动的中共党员。在他和徐梅坤等指导下，绍兴农民骨干先后在前梅、[钱清](#)等地组织**50**个乡村农民协会。沈定一首先自减田租并拿出钱财分与贫苦农民。**9月27日**在衙前东岳庙召开农民大会，成立衙前农民协会，并通过由他起草的《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会章程》，明确宣布“本会与田主、地主立于对抗地位”，并实行三折还租。同年，该《章程》与《宣言》刊登在党的机关刊物《新青年》上，引起社会关注。衙前农民协会的创立，其影响波及[萧绍平原](#)，时有**80**多个村相继仿行。**12月**，在绍兴《越铎日报》上发表《农民自决》一文，鼓励农民起来抗租。年底，农民协会遭军阀政府镇压而强迫解散。衙前农民运动，虽然时间不长，但影响很大，它揭开了中国现代农民革命斗争的序幕，显示了农民群众中蕴藏的巨大革命力量。

沈定一搞的农民运动，是中国最早的共产党农民运动，远比其他地方的农民运动早得多、大得多，称他为**中国农民运动之父**就对了。如果他继续呆在共产党内部，毛泽东不一定能坐上最高位置。他如果没有后来的屠共事迹，不知道中共

会怎么样吹捧他。

1922 年，沈定一仍居乡间，致力发展乡村教育，曾任萧山[东乡](#)教育会会长。1924 年沈定一与陈望斗、林风眠、潘天寿等先生一起创办了“浙江艺专”（现“中国美院”），该校 1927 年被军阀孙传芳部队毁掉，为中国培养了不少书画人材，为繁荣中华书画艺术作出巨大的贡献。

1923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作为浙江代表的沈玄庐拒绝参加中共三大，他想退党，被劝留在党内。

1923 年 8 月，孙逸仙（孙中山）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代表团由 4 人组成，蒋介石为首席代表，其他二人是共产党代表张太雷、沈定一。在苏联考察期间，由于苏联人赤裸裸地伤害中华民族利益，特别是外蒙古问题上，硬是要把蒙古拖出去。蒋介石对于苏联出尔反尔和在外蒙古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极度不满，称“俄党殊无诚信可言”。致使蒋介石与王登云从亲苏者变成反苏反共急先锋，四人使团分成两派，团长蒋介石与王登云代表国民党与中华民族的利益反对蒙古独立，张太雷与沈定一代表共产党与苏联的利益支持蒙古独立。两派之间有时会为某一问题发生口角，有一次还差点打起来。代表团各种计划、考察工作、对俄交涉以及一切意见和主张，都不能一致，使得考察访问无法继续下去，只好提前回国。当时，张太雷沈定一是坚定的马列主义者，为了中共与苏联的利益，不顾一切地与蒋介石争斗。

张太雷是中共的革命元老，1928 年，他领导广州暴动，被乱枪所杀。他又懂俄语，又与苏共高层走得近，正是苏共最依重的对象。如果不死，地位一定很高，相当于周恩来级别。

也许是在与蒋介石的辩论与争执中觉悟，也许是中共领袖瞿秋白抢走了他的儿媳杨之华受到刺激，也许是看清了中共的面目，或者是三者都有，沈定一“**血脉觉醒**”了，他最终走到了远比蒋介石更加极端的反共灭共道路上。他后来被暗杀，极可能是中共干的。可能是看到了沈定一、陈独秀这样觉醒之人的可怕，中共对于中共的叛徒才那么仇恨，必杀之而后快。

沈定一回国后 11 月加入中国国民党。1924 年 1 月，沈定一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候补执委。1924 年春沈退出共产党。3 月回浙江组建中国国民党浙江省临时党部，为执行委员。1925 年初再次退党。**第二次退党时，沈与中共的政治理念已经发生了根本分歧。**衙前农民运动失败后，他就大力主张教育救国，同时积极参加省议会活动，成为拥护浙江“制宪”的“省宪派”，逐渐地偏离了党的阶级斗争路线，与戴季陶的私人友谊还深深的影响着他。对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他一直抱有异议，认为苏俄想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则一直持有看法。

1925 年 1 月，沈定一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与会期间，他提出的移民到满洲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计划遭到了反对，又发表了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反对共产党在国民党组织中建立党团，他指责党的路线，反对国共合作，**反对阶级斗争**，并公开**否认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声言要中国共产党放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全面服从国民党。这些都毫无意外地受到了与会代表的围攻。5 月，沈赴广州出席国民党一届三中

全会，又与戴季陶一起反对国共合作，主张反共，反对无产阶级革命，附和戴季陶提出的所谓纯粹的三民主义。

7月5日，他召集了“临时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并邀戴季陶出席，以壮声势。在会上，他以主持人的身份，竭力鼓吹“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三民主义为最高原则”，鼓吹“单纯的国民党运动”等，要求共产党员必须退出国民党，遭到宣中华(共产党员、国民党临时省党部执委)等的反对。

11月，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沈以最高票当选三常委之一，是会议宣言和决议的主要起草人，会上，他旗帜鲜明地发表反共言论，高呼：要解除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的领导职务，“誓与共产党不两立”，会议宣布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解除苏联顾问鲍罗廷的职务，并通过了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等宣言，形成反共的“西山会议派”。沈因为不久后生病返乡，而未能成为西山会议派的实际领袖（西山会议派领袖有人长期担任中华民国主席）。

1926年1月，左派控制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弹劾“西山会议派”，书面警告沈定一积极参与者，要求限期悔过。但沈定一仍我行我素，并于3月29日参加在上海法租界建国学校召开的所谓“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与左派国民党中央公开分庭抗礼，并代表西山会议派作《政治报告》及《关于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的由来》的报告，重弹西山会议上的反革命论调。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执委，中执委常委。

这时的沈定一，从表皮到内心到灵魂深处无不反共，为了打击共产党，为了消除他自己鼓动起来的共产主义运动，真是拼了老命了。反共如此拼命，在国民党反共人士中也实属少见。

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清党后，沈定一在浙江拉拢各方势力，为蒋介石摇旗呐喊。蒋汪“合流”后，蒋介石于1927年8月下野，“西山会议派”掌握了国民党中央大权。反共急先锋沈定一再受重用，沈历任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改组委员兼秘书长、省党部特派员、省清党委员会常务委员、省反省院院长等职。并以国民党中央党部浙江特派员的身份回到浙江，担任浙江省清党委员会主任委员。亲自到各地收缴枪支，查封革命团体，大肆搜捕共产党员，为了感化共产党人，他拨出款项，网罗反共人士，建立起专门关押共产党人的浙江反省院，并亲任院长，诱使共产党人变节，风云一时。这时，沈定一这个曾经为中国共产党及其农民运动创建立下汗马功劳的元老已彻底变为反共急先锋。

在沈定一等人的刀下，共产党组织秘密转入地下。但是，由于沈定一曾在中共党内担任职务，并发起浙江共党组织，他对中共浙江党内的情况和中共党员的分布情况比较了解，因此在他指挥国民党特务的大肆搜捕中，中共浙江党组织的秘密机关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人遭到捕杀。据有关资料，沈定一担任国民党“清党”委员会主任委员期间，浙江省1800多位革命者被捕，932位中共党员被枪毙，马列主义群魔乱舞、一片腥风血雨之中的江南大地恢复了勃勃生气，从此，江浙一带成为中华民国法治的模范区。

在全中国，杀害中共分子最多的应该就是这位中共的创始人。看了中共在大革命时期的所作所为，有良心的人都会反共，无良心者、极端自私自利的阴谋家才会留在中共内部。沈定一只是一个良心者。就凭他大地主加大官僚出身，共产党也不会信任他。

1928 年春蒋介石东山再起，重掌国民党大权。沈定一在戴季陶、[张静江](#)等人的支持下，一面撰写《防共方案》，陈述自己反共立场，一面在衙前成立自治筹委会，建立[东乡](#)自治会，集结旧友亲信，分任要职，准备再次彻底清共，用尽他全身的力量，破除他所创建的共产党组织。

1928 年 8 月，沈定一在会晤戴季陶的返途中突遭暗杀。



（良心者沈定一）

中共诬陷：“蒋介石通过[何应钦](#)派刺客在衙前刺杀了沈定一”。沈定一是蒋介石的战友，是蒋介石的最得力战将，他做了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不敢做的事情，蒋介石只会保护他怎么可能杀他？！很明显，是中共暗杀了他，他的名声大而不敢公开，反诬陷蒋介石，一石二鸟。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徐梅坤](#)的《九旬忆旧》诬陷蒋介石，徐才是最可疑之人。对于沈定一的谋杀令，肯定出自于中共，甚至可能来自莫斯科。

当时他的名声绝对比毛泽东、彭湃等人名气大，直逼陈独秀。难怪共产党把

他暗杀掉却不敢公开。他对国共两党的影响，绝对大于他的名气。

就是这样一个一心一意投身共党的志士、名满天下的共产党组织创建人，后来发现上了共产党的当，就与中共彻底决裂，并拿起巨大的屠刀大杀共产党。不知道瞿秋白勾引走他的儿媳妇杨之华，与他向共产党宣战是不是有关系呢？瞿秋白可能后悔死了。作为沈家的家长，他极力反对杨之华与瞿秋白的师生恋，并因此迁怒于杨、瞿二人，他阻挠杨之华回萧山家里看自己的独生女儿沈晓光，向陈独秀投诉瞿秋白是“拆白党”。

梁启超、张东荪、沈定一、戴季陶这批最早宣传社会主义与马列主义的人，都走向了最反共的立场，他们的先知先觉远比蒋介石来得早，多数甚至比西山会议派还早。陈独秀随后也加入了他们的反共行列。没有日寇把中国打残、没有苏联的极力援助、没有美国的不作为，共产党不可能在中国抢得政权。中共政权不是中国人弄出来的，而是上面五大责任者搞出来的，是他们的责任，而不是中国人的责任。

在中共瞎闹腾之时，日寇侵略的步伐步步接近，中共的阶级革命为日本侵略者提供了天赐良机，中共与日寇互为恩人，都是毁灭中华民族这个人间正义力量的罪人。没有中共的胡闹，日本人还不敢侵略中国。

九、陈独秀的血脉觉醒令中共恐惧

中国共产主义最高理论家、最重要的传播者，就是中共的首任及后五任总书记陈独秀，他后来成为最反共产国际分子，他后期的著作就是批判马列主义与斯大林主义。陈独秀的觉醒让中共感到恐惧。

陈独秀是中共第一个党魁。从 1921 年中共一大到 1927 年中共五大，陈独秀都被选为中共党魁。至 1927 年，作为共产国际的远东支部，中共领导的“大革命”以大失败而告终。中共党魁陈独秀一下子成为众矢之的。1927 年至 1930 年，共产国际五次要求陈独秀去莫斯科，**陈独秀拒绝**。估计到莫斯科之后性命就难保了。对 1930 年 2 月共产国际要求他去莫斯科讨论开除他党籍的问题，他在《答国际的信》中说：“你们却把托洛斯基放逐到苏联以外……其他和你们政治意见不同的大批同志都被监禁和流放，现在又要从中国调我到莫斯科，说是专门解决我的问题，我实不知你们又打算干什么。”斯大林与苏共的奸诈，陈独秀看得很透。共产党是奸党，不是奸人，哪能呆得住？

实际上中共被苏共所操控。上世纪 90 年代苏联解体后解密的苏共档案显示：1923 年至 1927 年，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 112 次，作出了 738 个决定。连蒋介石执掌国民党大权以后，什么时候派什么人去找蒋介石谈话，谈话要注意什么等细节，都有明确指示。因为中共是在共产国际操控下建立起来的，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当时，“指导”中共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全部来自莫斯科，并由莫斯科派驻中国的代表、顾问执行，只有一小部分是在莫斯科代表的严密监督下，由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执行。

中共早期的所有经费全是苏联提供，所有的革命理论全是苏联提供，苏共并指导中共如何开展暴动，汪精卫宣读的《五月指示》就是苏联的暴动指示，“八一南昌暴动”、“秋收暴动”等等一系列暴动全是在苏共的《五月指示》指示下实施的。由于屡次失败，并受到苏共内部的托洛斯基派的指责，斯大林急眼了。

中国共产党是地地道道的外国代理人，是中国的“敌对势力”——俄罗斯共

产党，为了颠覆中国的合法政权，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卫苏联的利益，而建立起来的党。如果将俄共（后来的苏共）比喻为“老子党”，中共就是“儿子党”。“儿子”必须听“老子”的，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就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连中共的五届总书记陈独秀也被苏共以非法的形式搞下台。

苏共指挥了中共搞的“八一南昌暴动”、“秋收暴动”等直到“广州暴动”。1927年12月，斯大林指挥中共搞广州暴动，斯大林甚至动用了在华的苏联共产党、朝鲜共产党、越南共产党等国际共产党组织，以致大批朝鲜及越南共产党死亡，大大地打击了这两国家的共产党组织。而广州暴动的指挥部直接就设在苏联领事馆内，苏联外交人员直接参与了暴动的指挥，也有苏联人直接参与武力战斗。这是苏联非常严重的外交不当行为，是在“无产阶级无祖国”的思维指导下才能干得出来。国民政府镇压暴动后，直接把参与暴动的一些苏联外交人员枪毙。苏联外交官乌科洛夫、伊万诺夫等人被枪毙，枪毙前每个人的身上都被绑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俄国共产党分子，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处治他。”……一路上市民尽向他们投掷东西，打他们，用小刀刺他们，往他们身上吐唾沫。他们后来被枪杀，很长时间都没有人收尸。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副领事哈西斯也被枪毙。枪毙他国外交官、外国领事，这在世界外交史上是极其罕见的，国民政府以此为由断绝了与苏联的外交关系，苏联政府吭都不敢吭声。

1929年7月，中华民国政府鉴于苏联有煽动中国人民破坏中国国家社会、反对中国政府之各种有组织之宣传及工作，决定强行收回中东铁路的路权，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但是，苏联派兵打入东北，打败了东北军，不仅保有苏联在中东铁路的权益，还趁机出兵占领了中国的黑瞎子岛。

中东铁路是沙俄为侵略中国、控制远东在中国领土上修建的一条铁路。俄国“十月革命”后，苏俄一再声明：废除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归还中东路主权。但仅停留在口头上。

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共产国际立即作出强烈反应，指示各国共产党要发动一个“保卫苏联”的运动。中共中央积极响应，频频发表宣言、决议和文章，甚至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



（中共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

陈独秀极端反对中共提出“武装保卫苏联”。1929年7月28日，陈独秀致

信中共中央，批评中共“武装保卫苏联”的宣传“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不顾及民族利益”。一个星期后，他又致信中共中央，批评中共执行的左倾盲动路线。共产国际认为，陈独秀反共产国际、反党、叛变等。1929年11月15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在陈未参会并且参会人数未达合法人数的情况下，中共政治局作出非法决议，开除陈独秀的党籍。

此后，陈独秀与中共越走越远。后来思想开始转变，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陈独秀最终抛弃了共产主义。

陈独秀很早就写过一篇题为《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的文章，文中说：“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原来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所以，“若有人问：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我们便大声答道：……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国家的功能，如陈独秀所说，一是抵抗异族压迫，一是调和国内纷争，前者对外，后者对内。调和国内纷争是就消极方面来说的，积极方面国家还需履行一定的公共职责，如救灾、赈济等。

马克思讲：“国家是阶级压迫阶级的机器”、“法律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与意志的总和”。陈独秀对国家的认知正如金剑所定义的：“国家是调和的机构”、“法律代表全体公民的利益与意志的总和”那样，这才是最准确的国家与法律的定义。**陈独秀对国家的认知就是对马克思的否定与背叛，是他最后走出共产党泥淖的精神与理论基础**，他如果没有这些认识，可能不那么容易走出共产党的认知陷阱。

陈独秀不但反对中共“武装保卫苏联”，后来他最反对苏联。他被共产党开除，也被共产党的托洛斯基派开除。

陈独秀把民主作为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或反动的惟一标杆。基于民主立场，陈独秀对苏联的非民主经验有深刻的认识，甚至比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认识更为根本和透彻。陈说：“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陈独秀对斯大林问题的认识，已经触及政治制度层面。“是独裁制度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陈独秀著作选》，卷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555页）一直受斯大林打压、命运坎坷的陈独秀说：“不能一切归罪于史大林。”留俄的国民党员白瑜感慨地说：“陈先生宽恕斯大林，**胡适**之先生谓其心存厚道，正如太炎先生吊袁世凯‘败不出走，于今犹杰’，均书生本色。”

1936年莫斯科大审判后，陈独秀即对苏联的国家性质发生疑问：“这样不民主，还算什么工人国家？”1939年德苏协定后，陈独秀公开否定托洛茨基派的立场，以为没有高于资产阶级制度的民主，根本不能算是工人国家。如果工人阶级国家不比资产阶级国家更加民主，工人阶级奋死斗争又为了什么呢？

那么，资产阶级的民主是什么呢？为让大家明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真实价值”，陈独秀列了一张表，比较英美与俄德意的政治制度：

陈独秀把英美制度与俄德意的法西斯制度比较

（甲）英、美及战败前法国的民主制	（乙）俄、德、意的法西斯（苏联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师，故可为一类）
（一）议会选举由各党（政府反对党也	（一）苏维埃或国会选举均由政府党指

在内)垄断其选举区,而各党仍须发布竞选的政纲及演说,以迎合选民要求,因选民毕竟最后还有投票权。开会时有相当的讨论争辩。	定。开会时只有举手,没有争辩。
(二) 无法院命令不能任意捕人杀人。	(二) 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杀人。
(三) 政府的反对党派甚至共产党公开存在。	(三) 一国一党不容许别党存在。
(四) 思想、言论、出版相当自由。	(四) 思想、言论、出版绝对不自由。
(五) 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	(五) 绝对不允许罢工,罢工即是犯罪。

陈独秀说:“每个康米尼斯特(即共产党员——引者注)看了这张表,还有脸咒骂资产阶级的民主吗?宗教式的迷信时代应当早点过去,大家醒醒罢!”(《陈独秀著作选》,卷三,第558页)通过比较,陈独秀认为苏俄的专政是退步和反动的,“俄国的苏维埃制,比起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

胡适认为陈独秀这张列表十分重要,整段引入他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一书所撰写的序言里。胡适说,这本书足以代表陈独秀的最后思想,也是陈独秀对于民主政治深思熟虑的最后结论。晚年承认“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一种动力”的陈独秀,与一生鼓吹民主、自由的胡适,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在陶希圣看来,陈独秀认为将来中国还是要走民主政治的道路,只是这“‘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民主与社会主义是一致的,抛弃民主就是抛弃社会主义。不实现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必然蜕变。



(陈独秀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看法)

中共的开山鼻祖陈独秀后来幡然醒悟,《陈独秀晚年的最后见解(论文和书信)》一书中看到这一点。陈独秀的主要观点是:只有大众政权才能实现大众民主,如果不能实现大众民主,所谓“无产阶级独裁”必然流为斯大林式的少数人

的专制；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进步的，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无产阶级民主应与资产阶级民主一样，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民主的内容固然包含议会制度，而议会制度并不等于民主之全部内容，借排斥议会制度同时便排斥民主，这正是苏俄堕落的最大原因。

陈独秀对“独裁”还有着清晰的认识，并将苏维埃独裁与法西斯独裁等同起来，“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种东西，他只是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没有事实使我们相信，在人类自由之命运上斯大林党徒好过希特勒党徒。”“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斯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是独裁制度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产生独裁。”

对于英美民主制，陈独秀认为与俄德意法西斯制有着根本上的区别，他主张各党派联合抗战并认为：“此次若是德俄胜利了，人类将更加黑暗至少半个世纪，若胜利属于英法美，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注24）。非常可惜的是，虽然德日失败，可是苏联也是胜利方，苏联并由此帮助中共获得胜利，由陈独秀种下的祸根结出恶果。他在理论上如此反共，并掌握了共产党大量机密，迟早会从理论反共变成行动反共——铲除中共，向国民政府提供中共的秘密，比如国民党高官中的中共党员。也许中共看到了这种必然趋势，下手做掉了他。中共阴得很，至今还在狂叫“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这是最重要的实践，毛泽东周恩来这种阴人做得出来！陈最终抛弃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者也抛弃了他。

陈独秀对苏联制度的精辟剖析和对斯大林的批判，及对世界共产主义的预见，颇有先见之明。1945年二战结束，苏俄是胜利的一方，直到1990年代才迎来苏联解体、东欧共产主义崩溃，人类走了近五十年的黑暗，至今未能彻底清除马列流毒。西方领袖们如果有陈独秀的智慧，也不会让共产主义如此泛滥。

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公开后，如同瞿秋白临死前留下的《多余的话》一样，引起许多争论，甚至“遭当世骂”。《解放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批评陈独秀旨在“否认苏联社会主义，否认中国三民主义，否认全世界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否认反法西斯阵线的存在和力量，否认战后世界的任何光明前途”，指责陈文体现了“托洛茨基陈独秀派的汉奸本质”。

1938年3月17日，给《新华日报的信》中说：“你们向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事实是非，只要让你们牵着鼻子走的便是战士，反对你们的便是汉奸。做人的道德应该如此吗？”1940年11月28日，陈独秀在《最后政治意见》一文中写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是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抗日期间，周恩来多次找到陈独秀，要他写悔过书，共产党好帮助他，他拒绝了。陈独秀很想去延安，毛泽东极端反对，导致陈未能成行。毛泽东怕陈独秀到延安，就给他污名化，指示康生之流不断在延安《解放》周刊施放暗箭，造谣中伤陈独秀是日本人的走狗，每月从日本人那里拿300元津贴。毛泽东反对陈独秀去延安的理由是：“他的那套东西，能骗了不少人”。“能骗不少人”，正面说，就是能让许多人相信。真理越辩越明，只有谬论才怕辩论、才用暴力来维持。既然，陈独秀的理论能让不少人信服，可能是理论，那就辩论呗，中共怕，毛泽东更怕。说明，陈独秀的理论可能是真理，中共与毛泽东才不敢让他去延安，否则，陈独秀一旦在延安传播起他的理论，将使中共垮台。中共怕极了，毛泽东用暴力

来清除这种真理与谬论的辩论，保护了马克思谬论。

当然，陈独秀对共产党的看法，未能看到共产党的邪教本质，未能看到阶级斗争的祸国殃民性，还是只在民主与独裁之间打转，或者他来不及彻底看清共产党的邪教本质及反抗就（被弄？）走了。他的看法虽然远不如梁启超高明，但是，已经远远超越托洛斯基之辈及世界许多领袖人物。

共产党的问题不是民主与独裁的问题，共产党是邪教，无论是民主之时、还是专制之时，都是邪恶的。只在民主与独裁上看不透共产党的邪性。马列主义邪性最发滥的时候，是它最邪的时候！大革命时期与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中共最民主时期，是最邪恶时期。陈独秀经历了共产党大民主的大革命时期，仍未能彻底看清共产党的邪性，是有所遗憾！

毛说：“他的那套东西，能骗了不少人”。怕陈独秀到处传播他的“那套东西”，中共对接触者隔离。曾经多次接济过陈独秀的杨鹏升先生，后曾任重庆卫戍总司令参议，1949年曾随邓锡侯、王缙绪等国民党将领起义，解放后供职重庆西南美专，任国画、雕刻教授。然而，1954年，杨鹏升先生以“残余历史反革命”罪名被捕，被判有期徒刑20年，1968年病逝狱中。又一位接近陈独秀的人，没有好的下场。中共再一次实践“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

上了共产党的贼船还想下船的人，中共绝不放过，找不到他就找儿女。共产党对陈独秀的儿女也不放过。50年代，陈独秀的小女儿陈子美一家搬到了广州，陈子美就在居委会当扫盲老师，很快，大运动来了，陈子美的经历被人知道后，家被抄了，在看守所关了14个月，她忍受不了被游街的遭遇，就悄悄做起了偷渡香港的准备，她和两个儿子一起学习游泳，1970年9月的一个夜晚，她把5个装食油的铁皮桶绑在身上，在朋友的帮助下，依然跳进了波涛汹涌的大鹏湾，经过9个小时的漂流，终于平安登陆香港，香港警察都看呆了，她是60岁高龄偷渡到香港的第一人，纷纷和她握手致敬。后来香港盛传要遣返偷渡客，陈子美和儿子逃去了加拿大。香港人口密集，看看香港警察、政府、民间还如此收容偷渡者，中共为什么不收容朝鲜的逃难者？

注 24：《二十世纪俄国史》

《炎黄春秋》——李玉贞：一部颠覆性著作：《二十世纪俄国史》

http://bbs.tiexue.net/post2_4551830_1.html

[转帖]诺贝尔得主说：“列宁是一个带有梅毒大脑的疯子”

<http://club.kdnet.net/disppbbs.asp?boardid=1&id=10580234>

普京：列宁镇压沙皇令人发指

<http://news.sina.com.cn/w/zg/2016-01-26/doc-ifyxnuvxc2009382.shtml>

列宁一直在玩弄欺骗掠夺中国

http://finance.qingdaonews.com/content/2012-03/10/content_9145572.htm

十、看清共党就反共党

一批批中国普通人，甚至是中华民族的精英，都倒在中共的屠刀下。为什么中共如此狠毒？因为中共怕人们看清它与马列主义，在人们看清之前或者之后，中共就下手，这就是中共经常鼓吹的“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还因为中共想用杀戮恐吓住中国人民。

当年投靠中共的人，有的慢慢看清中共的面目，于是中共先下手为强，把可能背叛中共的都干掉，有很多很早跟随中共的人被中共干掉。

邓小平鼓动的百色暴动，参与者许多都被中共屠杀，连带头的李明瑞将军也被中共干掉，其部下更难有活路。1931年12月14日，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1.7万余人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等带领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宁都暴动。过后，中共对这支部队进行了清洗，暴动的领导人季振同、黄中岳被杀，一些主要领导人在战斗中莫名死掉，活到中共上台，最高官衔者仅是一个旅级副官而已——第26路军74旅旅部副官李达。贺龙红军肃反，把30000多人的红军杀得只剩下3000多人。“中央苏区肃反累计杀了10万红军，毛死后的1983年，江西有238844名（23万多人）肃反被杀的人被官方追认为烈士……有的老同志回忆说，在当时政治保卫局所在地附近河滩上，尸横遍地，河上腥红……”。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夕，周恩来亲自下令屠杀在关押的被中共审查的中共内部分子，大约一万人，基本是用石头、刀杀害。

中共的内部倾轧是如此残酷，何况对于外人、对于收编队伍？！一般人无法想像得到中共有多邪！中共为什么要杀害这些中共的追随者？怕他们背叛！为什么会背叛？看清中共了嘛！

中共从夺权时期开始，一路来就是这么杀害中国人和它自己人过来的。甚至在夺权时期比“解放后”，杀人杀的更加恐怖与残忍。

中共对为它出生入死的地下党，也没有放过，不少死于中共之手。中共上台前就对地下党制定下了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句句带刀，字字见血，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中共从上台直到文化大革命，都在大批迫害杀害中共地下党。为什么会如此？因为中华民国是正常社会，地下党人与中华民国深度接触，自然无法接受共产党的那一套邪乎乎的东西，于是就成为中共的眼中钉，受到逐步淘汰的命运。中共只信任经过延安整风后邪乎乎、猥乎乎的干部。中共的最好打手是马列老太太，那些只背了马列主义口号的易冲动之人，是中共的最爱。

与中华民国深度接触，虽然可能不小心误入中共之歧途，在深度了解中共之后，还是可能脱离中共并且反戈一击。

廖宗泽是中共早期党员，曾经多次领导中共暴动出生入死，黄埔军校四期毕业，1926年毕业后，入川开展革命工作，先后参与领导了中共的泸州、顺庆起义，遂宁、蓬溪起义，以及广汉起义，广汉起义胜利后成立了红26军，廖宗泽任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军第一师政委、第一路纵队政治委员、川西特委兵委书记等职，为中共做了大量工作。自从看清中共之后，一刀两断，1931年主动**投降国民党**，从此廖宗泽一生坚决反共，杀过很多共产党，直到中共国成立之后，还在与中共不懈作战，1951年被俘，1971年病死于抚顺战犯管理所。结束了他那从坚定共党到坚定反共的一生。中共把四川所有的失败委过于左倾，其实，左倾才是马列的原教旨。

廖宗泽的一大堆共党部下与同事都背叛了中共并成了中共的死对头。川军第28军江防军第7混成旅，是中共在四川兵运工作的重点。该部共产党的组织建立较早，1926年，共产党员旷继勋任该旅第2团团团长。中共川西特委为加强党在该旅的工作，先后派去一些党员，组成党的领导核心旅委会，团、营、连中也相继建立了党的组织，连队的政治指导员多由共产党担任。1929年夏初，由旷继勋代理旅长，6月举行暴动，打出四川红军第1路的旗帜。全旅3000余人，编为两个师，一个先遣队。红1师师长傅介藩，党代表刘曼；红2师师长马之

驥，黨代表廖宗澤。

1946年夏，在國民黨就職的原二十八軍第七混成旅的同事在南京“介壽堂”有過一次聚會，他們是：傅介藩，原紅一師師長，時任國民黨兵役署總務局少將局長；陳國儒，原紅一師黨代表，時任國民黨海軍總部政工處少將處長；馬之驥，原紅二師師長，後另改名字，時為國軍少將；廖宗澤，原紅二師黨代表，時任國民黨兵工署警衛處少將處長；黃孔鄉，原中共黨員，時為國軍少將；徐昭俊，原紅軍營長，時為軍統中將；曹仲英，曾繼任紅一師黨代表，時任南京《新民報》總編輯。後任國民黨國防部政工局中將副局長的李道庸，很是調侃地訛笑道：“繼勛現在怎樣啊？”他們談天說地，躊躇滿志。是時，他們的共黨上級賈繼勛已經被中共清除長眠於地下十三載。“繼勛現在怎樣啊？”有點調侃，調侃當年跟隨共產黨及繼勛一起暴亂；有點悲涼，悲涼自己的老領導繼勛的早歿；有點憤怒，憤怒他們的老領導被中共無辜殺戮；有點庆幸，庆幸他们没有继续当共产党跟随老领导继勛跑。那么多中共四川最先暴动的主要干部都跑到了国民党那里反过来对抗中共，是因为他们看清了中共。上面领导暴动的人都是如此，那么底下参加暴动的人更是全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了。毛泽东在中央根据地和其它根据地对中共的屠杀，比中共在四川的屠杀更多更广泛，难道是中共在四川杀的共产党杀少了，那里的共产党才有机会跑到国民党那里去的？中共把一切罪过都说是王明路线，其实，王明路线才是马列主义原教旨，马列主义是所有的原罪。王明路线杀人不多，毛泽东路线杀人才多，中央根据地杀人最多。

现在，日本、美国、印度还有不少人被共产党迷惑，美国的黑命贵运动中看到共产党的重重魔影，日本共产党曾经上台执政，印度共产党在地方上长期执政。

印度的共產黨黨員已經達到 200 萬了，其下属群众组织的总人数接近 4000 万。该党宣称：“在承认资本主义秩序在 21 世纪全球占上风的同时，指出资本主义的剥削性质，认为资本主义方式不能克服经济危机，只是从一场危机到另一场危机，全球化的结果是不平等，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人类解放和解脱的灵验药方。该党的目标是改变世界现状，找到一种取代资本主义的政治模式。”这像不像大陆大学里政治课教育？看到了吧，印度落入共产党的魔掌并非不可能！印度共产党甚至叫嚣：“将在 2050 之前通过武装夺取政权”。如此毫无掩饰的狂妄和血腥的口号都敢公开发表，可见印度之危。

现在美国的大学里，教社会学的、教历史的，左派教授与右派教授的比例是十三比一，这个比例可能比现在大陆都高，只是大陆许多教授不敢表露真实意图而已。美国左派教授灌输给学生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美国掉入社会主义的泥淖并非不可能。美国大学里教经济学中，左派教授占百分之七八十；在教技术方面，右派教授也不占主导地位，看看美国的左派与共产主义者多么猖狂。可见，白人的文化与马列文化有天生的相亲性。打败马列主义，还得靠我们中国人与中国文化。将来，最反马列主义的是中国人，因为中国文化与马列文化正好相反。

马列主义喊出的口号高大上，实际上阴险无比、血腥无比、邪恶无比。马列主义的幽灵依然在世界上游荡，世界依然危机重重，没有受过马列主义苦的人，依然可能受到马列主义的蛊惑。而在以前东欧共产党国家里，共产党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有的国家甚至共产党被禁止。亲身经历过马列主义荼毒的民众才能最深刻地了解马列主义的邪恶，普京经常喊出：“列宁建立的苏联是人间地狱”。亲身经历、亲身受过毒害就有免疫力。

觉醒的中共党人：沈定一、陈独秀、龚楚、王明、张国焘……

看清共产党的人，就是最反共产党的人。在国民党的特务系统中，共产党的叛徒占了很大的比例，他们专门对付共产党。国民党政府有智慧。在中共 1949 年的金门战役中，有**超过 86%的战俘选择留在台湾**。在中共高度宣传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有**超过 70%的战俘坚决不回中共国**，他们经受了中共的各种欺骗与威胁，坚决不回中共国，为世间留下了一段伟大的故事，增强了世界抗击共产党恶党的决心与经验。**只要了解共党，就会唾弃共党！**

蒋经国是经过共产党培养的反共人士，一生反共，永不妥协。蒋介石当年也崇拜马列主义，他金睛火眼，经过一次考察苏联，就看清了共产党的邪恶，从此走上反共之路，永不妥协！

希望我们普通的中国民众，虽然没有金睛火眼，经过共产党几十年祸害，也看清共产党的邪恶，具有了免疫力，从此永远反共，永不妥协。希望我们中国人把自己的亲身感受告诉世界民众，让世人也有免疫力，永远不受共产党荼毒，在人间彻底铲除马列主义。

十一、1946 年全国人民反苏反共运动

苏军在 1945 年 8 月 9 日攻入中国东北。由于日寇侵占东北，东北人民受尽欺负与杀戮，当苏军进攻东北时，东北人民把苏军当成解放者而欢迎他们，却不知道，欢迎的是另一个强盗。



（东北人民一开始欢迎苏军）

1945 年 11 月 16 日晚，在哈尔滨，看到几个苏军正在抢劫，一位身着便装的中共将领出面制止，但惨遭苏军枪杀。他就是参加过南昌暴动、时任松江军区副司令的卢冬生，这位共产党高官，倒在了共产党的枪下，倒在了最正宗的共产党军队——苏联红军的枪下。

这个卢冬生大有来头，他曾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三五八旅旅长，1939 年，

卢冬生被派到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2 年到驻苏联远东地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工作（几乎等同于东北抗联的最高领导）。1945 年 9 月回国，卢冬生先后任哈尔滨卫戍司令员、松江军区司令员等职。他既曾当八路军的旅长，还到苏联最高军校伏龙芝学习，同为八路军旅长的陈赓、徐海东后来当大将，地位更低的粟裕、谭政、黄克诚、萧劲光、王树声、许光达也佩大将军衔，他还任十分重要的哈尔滨卫戍司令员、松江军区司令员，他若不死，大将是坐实的，还可能摸到元帅的边，却被苏军的小兵一枪给毙了，死在阴沟里。中共那个气啊，到现在都气鼓鼓的。

苏军在 1945 年 8 月 9 日攻入东北后，军纪败坏，抢劫强奸，无恶不作。苏联红军把东北的工业设备全部拆掉，运回苏联。苏军所为，让东北民众深恶痛绝的称为“跑毛子”、“老毛子”、“老子”。东北人从一开始对苏军的欢迎，变成对苏军的厌恶，甚至想方设法暗杀他们，当第二年大雪化开时，有几千具苏军尸体在雪中被找到。

日本投降前的中国东北，由于担心日本国土遭到美军的轰炸，日本人甚至想把日本天皇迁到东北继续抵抗。为此，日本人用建设家乡的热情打造的伪满洲国，伪满洲国是当时亚洲第一大经济体，早已超过了日本本土在全球仅次于美、苏、英，位居世界第四。

从 1945 年 9 月到 1946 年 5 月，苏军把东北的工厂、矿山、电站等物资绝大多数拆运回苏联。甚至连长春市政府的办公家具都不放过。仅拆运鞍钢就用了 40 天，发运火车 60 列。1945 年 11 月 15 日前，仅从沈阳每天就有 200 辆货车开往苏联，到 1946 年初，沈阳 90%以上的工厂都成了空壳。

苏联从 1945 年 8 月 9 日攻入东北，到 1946 年 5 月 3 日撤出东北。9 个月里，苏军从仗义出手相助的盟军，最终成为了落荒而逃的打劫者，其中一个重要的事件是，爆发于 1946 年 2 月的全国性反苏反共运动，甚至波及到了全球各地，而导火索是一个地质学家的死。

在中共的叙述中、在我们的印象中，好像中华民国时代的学生运动都是反对中华民国政府的。其实，当时的学生运动，最大规模是反苏反共的，反苏一定是反共的，因为苏联就代表共产党。反共学生运动比五四运动规模还大，五四学生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也没反中华民国。

1946 年 1 月 7 日，中国著名地质学家张莘夫受国民政府委派接收抚顺煤矿，然而他一下车，就被苏军控制并监禁，到了 1 月 16 日晚 8 时，张莘夫一行人被苏联军官告知，煤矿不能被接收，随即被要求返回。然而就在返回途中，他遭到不明身份的人暗杀。不久后，重庆举行了大规模游行，人们强烈要求政府出兵赶走盘踞东北的苏军。重庆爆发的反苏示威游行，迅速波及全国，紧接着北平、上海、南京、杭州、贵阳等省会城市，先后爆发了大规模游行，人们纷纷在政府门前请愿。

至 2 月 20 日，东北兴安省主席吴焕章接收受阻，被迫折返北平。消息传来后，民众激愤不已，重庆大学等 14 所大学的学生代表纷纷罢课。这使得反苏运动蔓延全国各地，在上海成立了各界维护东北主权委员会，举行十万群众示威游行之后，北平武汉太原南昌贵阳等地，都举行了程度不等的游行示威，甚至连台湾也举行了“抗议苏联破坏中苏友好同盟的示威游行”。



（中国各地抗议苏联耍流氓）

与此同时，中国民众运动，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美国各报刊纷纷报道东方各隅游行示威，赞中国全国学生运动，并认为东北即刻归还中国，苏军拆除东北机器的行为也加大报道，英国的媒体也跟着抨击。在舆论的压力下，美国政府态度逐渐转趋强硬。美国政府开始公开表态，任何国家未得另一国家同意，都无权派军队进驻该国领土，如有违反，美国不会、也不能置身事外。英国的丘吉尔则发表了针对苏联的铁幕演说。

苏联拆运东北机械设备的行为令人愤慨，国民政府外交部开始向苏联驻华大使馆递交要求苏军即行撤退的强烈照会。来自各方面的政治压力，苏联极不情愿的公布了苏军从东北各地撤军的具体日期。1946年5月，苏军撤出东北。

中国人民在世界人民的帮助下终于把霸占东北的苏军赶走。

全人类都知道，中共与苏联是一体的。那么，反苏就是反共，反共就是反中共。在这之后，东北人民出于对苏联红军的深恶痛绝，也对中共深恶痛绝。

中共经常造谣说，东北农民如何欢迎中共、支持中共拿下中国。事实并非如此，事实是东北民众强力抵抗中共、极度欢迎国军。

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当时由于苏军在东北抢劫强奸，东北人恨透“老毛子”（苏军），也带着恨共军，甘心情愿主动参加共军的很少。

东北光复后，1946年4月，当新1军、新6军进驻沈阳时，沈阳全城沸腾，民众涌上街头夹道欢迎国军入城。国军解放长春时，市民也夹道欢迎。



（东北人民欢迎国军）

而林彪率领大军初到东北时，部队在东北没有丝毫群众基础，更谈不上获得民众支持。刚从日寇铁蹄下获得解放的东北民众，只把国军视为国家正统！其实这也怨不得当时东北的老百姓，早在 1928 年张学良东北易帜，整个东三省的大街小巷到处粘贴的标语就是——“遵从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



（1946 年沈阳人民欢迎国军）

在沈阳人民欢迎国军的标语中，有“**民族至上**”一词，这明显是讽刺与反驳高举“**阶级至上**”的一切共产党组织，这也是东北人民以致中华民族的真心表达。

刚被日本残酷民族迫害的中华民族，怎么可能相信“阶级至上”呢？

本来在日本人的统治下，东北表面上平静，当共军进入东北时，东北沸腾了，各地拉起了“杆子”（拿枪），这就是中共在东北所谓的剿匪，其实他们不是匪，而是反共的民众。如果是国军先到东北，绝对就没有这些“匪”。受尽了日本人欺压的民众，知道和平的珍贵与知道中华民国的伟大，更知道和平来之不易，哪里会反抗国军并且把自己变成扰乱中华民国的“匪”呢？他们多数不是伪满洲国的伪军与警察，而是当年抗击日本人的起义人士与普通民众。他们袭扰共军后方、断共军交通、抢共军补给、杀共军伤员，他们多达百万之众，他们抗击共军的热情比当年抗击日本人的热情还高。可恶的是，中共到现在还把他们称为匪。所以，中共不灭亡，中国没有真正的现代史。



（抗击共军的普通民众——中共诬称为“匪”，哪里像匪？）

东北冬天天寒地冻，根本不适合搞游击战，这是日本人能占领东北的根本原因。普通民众要抗击共军，也是十分艰难的，不是出于对中华民国的热爱与对中共的怨恨，就不至于如此抗共。

而共军（号称东北民主联军）内部也是问题多多，共军从各个根据地抽调来的两万名军政干部刚刚分批到达，就马上分配到同样也是由关内抽调拼凑而来的共军部队之中……兵不识将、将不知兵，使得出关初期的共军在组织上、指挥上都大受影响，进而使得战斗力大打折扣！

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必然导致共军根据地的发展受限；四方反共人士的袭扰，更使得各个战区交通受阻，后勤补给接续困难。这一时期的共军处境极为困难，差点就死掉了！

中共为了使得重庆谈判桌上多一张底牌，并且想在苏联的帮助下霸占东北，为夺取江山创造条件，1946年4月的四平，就是在如此窘迫的境况下，共军不得不硬着头皮去与杜聿明死拼，结局当然早就注定……所以尽管明知不敌，共军也只得坚决的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说打就打了……但一看打不赢、拼不过，那就只好机断专行了，司令员林彪被迫一声命令：撤！共军十余万部队便被杜聿明一路狂追，极为被动的北退松花江……林彪四平这一撤，不但救了东北的共军，也救了整个中国共产党。

共军在 1946 年至 1947 年间的屡战屡败。从 1945 年山海关失守、1946 年二战四平完败，再到 1947 年德惠攻坚、三战四平的两仗全输，两年间，共军从号称“东北人民自治军”一直输到号称“东北民主联军”！如果没有苏联人的帮助与苏联 34 亿美金武器援助中共，没有 20 万日本战俘的加入共军，没有美国 1946 年开始对中华民国的武器禁运，那么，中共根本不可能获得中国人的江山，苏联、日本、美国这三者，是中共夺取中国人江山的三大助力器。

当林彪的部队在四平战败溃退时，路上百姓卖给他们的水是一块大洋一碗，估计这是世界上最贵的水了（《最后一战》），可以上世界记录。村民们还有这样问战士的：“大侄子，听说你们那枪呀炮的都是用大姑娘和老毛子换的，这是真的吗？”东北中共军队司令部的《阵中日记》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记载：“顽区群众条件极坏，我军通过时沿村抗击”。一位老战士回忆：“又饥又渴赶到吉林市，满指望能吃点喝点，大街空荡荡的没一个人影，像座空城。”离城过了桥，炸了桥，隔江看着国民党脚跟脚进了城，“老百姓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涌到大街上，挥动各色小旗，呼喊口号”。



（东北人民欢迎国军）

战士们把气发在林彪司令头上。一天，林彪的吉普车堵塞在北退的队伍中，警卫员请战士让道：“后面是首长的车，首长有急事。”四下里七嘴八舌起了叱骂声：“什么手掌脚掌的，这时候了还摆臭架子要威风！”“问问你们那个首长，是不是要撤到老毛子那边去？”（《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27》）。

当时共军在东北正像黄克诚所说的七无：“无党、无群众、无政府、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帽……到处吃一处，吃空烧尽，犹如蝗虫。”共产党真是无耻与邪恶，“吃空”也罢，竟然还要“烧尽”。

当然共军投降也很利害，在东北，曾经一个星期就有几万人投降，他们说“国民党是革命，共产党也是革命，国民党还是政府，我们为什么打他们？”（《最后一战》和注 1）”。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底到一九四六年初，十天左右，“先后叛变共约四万余人”（《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27）。

不但东北是如此，其它地方也是如此。

大家都知道，中共一篇宣传文章叫做“南京路上好八连”，用来证明共军纪律好。我们再仔细想一想，正是这篇文章证明：“上海人不欢迎共军”。南京路上

好八连，民众是围观而不是欢迎。共军在上海入城没人欢迎，连中共的地下党也不敢出来欢迎，就用一篇含糊其词的文章，用共军的纪律来代替没人欢迎的入城来糊弄人民。如果有人欢迎共军，那么中共早就大书特书了，一定会拍许多民众欢迎共军入城的照片甚至是电影，用来证明中国人都是欢迎中共的。

共军开进广州时，也没人出来欢迎，连中共的地下党也不敢出来欢迎。与国军进入吉林市时中国人民载歌载舞的情形天差地别，甚至连苏联人民欢迎德国大兵的程度都不如。由于苏共对人民进行残酷迫害，人民极度困苦，二战初期，苏联人民曾经异常热烈地欢迎德军，**苏联人民对德国纳粹的欢迎程度远远超过中国人民对共军的欢迎。**



（二战初期苏联人民欢迎德军）



（二战初期苏联人欢迎德军）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30）有如下记载：

{

即使这样，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也只是少数。一九四九年初共产党胜利在望时，在上海工人中——据毛告诉斯大林的使者米高扬(Anastas Mikoyan)——国民党远比中共号召力大。中共开进广州时，**苏联领事留心到那里“几乎一个共产党地下党员也没有”，“没有人出来欢迎”**。在华中，**林彪一九五〇年一月对苏联情报人员说：“群众对改朝换代没有太大的兴趣。”**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一百二十万中共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横渡长江，二十三日夺取蒋介石的首都南京。国民党二十二年的统治崩溃了。这天蒋介石飞回老家溪口，心里明白这是最后一次回老家了。蒋含着泪长时间地在母亲墓前徘徊跪拜，依依不舍，不忍离去。接着，一艘军舰载着他驶向上海，以后又辗转到了台湾。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受到毛泽东的保护。

毛请求斯大林派飞机、潜水艇助他进攻台湾，时间在一九五〇年，“或更早一点”。他告诉斯大林有好些红色代理人跟随蒋“逃”去了台湾，位居要职，可以里应外合。但斯大林不肯冒跟美国对抗的风险，毛只好把计划束之高阁。（斯大林帮毛镇压了西北沙漠地区强烈反共的穆斯林部队。斯大林对毛说：“可以很容易地由大炮对付。我们可以给你四十架飞机，一下子就能把那支骑兵部队一扫而光。”一位苏联高级外交官嘴里“嗒嗒嗒”的，手比划着机关枪扫射的样子，对我们描述苏联空军是怎样在戈壁滩消灭穆斯林骑兵的。）

}

对比吉林市民对国民党的欢迎，中共真不得人心。

大家知道“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号称 20 万大军进大别山（实际 12 万人），出山时只有 5 万人，战斗与**非战斗减员 7 万接近 60%**，就是战死病死饿死逃兵，战死病死饿死的很少，剩下的就是大量逃兵和投诚起义的。中野共军很难组织起有效的战斗，除了高山铺等几个仅有的胜仗外，在与桂系部队的交手中几乎是十战九负，面对胡璉的 18 军更是能避则避。共军大量逃兵是减员的最重要原因，其实对当兵来说，哪个政党上台，与他们有什么关系？用不上为政党去卖命，只有被共党洗坏了脑的才不明白这一点。

进入大别山后，当时大别山人口不多、人民生活艰难，人民对中共很反感，很难也根本不想养活这么多的共军。

用共军自己的话说：“严酷的现实让一些指战员产生了想法，觉得大别山根本就不像个老根据地，老乡不帮忙不说，还经常给部队出难题。强烈的思乡想家情绪和对现实的失望情绪出现了，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很多指战员的普遍感受。这对部队的影响很大，个别部队出现了战斗意志衰退，一些能打的仗不打了、不该放跑的敌人却放跑了等等。这些还是次要的，最严重的是，一些部队连人民军队的宗旨也置之脑后，**出现了打老乡、抓向导、拉水牛、拖猪捉鸡、抢东西等现象，甚至还出现了调戏妇女的现象。**”（爱历史：红军挺进大别山的历史原因，<https://lishi.vshare.tech/hd/c2ec2de380c5478b4eb359923693b094.html>）。这时的共军就是一支流氓部队，与被打垮的军队没什么不同。

刘伯承、邓小平对这段经历觉得非常不光彩，多年后还念念不忘。许多共军对于这段历史记忆犹新，对毛泽东的指挥能力极为不满。

没有日本鬼子的加盟，共军在东北很快死掉，哪里还有机会抢江山。请看《注释 21：数数林彪打的败仗》，看看共军的所谓军事天才林彪是如何无能的。里面有许多林彪惨败的战例，其中一例：**共军八个团，被国军一个团加一个营打得“望**

风而逃”，死伤人数超过国军的参战人数。

中共的江山不是得民心得来的，是枪杆子夺来的。

日本人是中共的帮凶，是中共的救命恩人。

当国民党打败中共，中共不得不缩于几个根据地等待覆灭时，日本人发动九一八，让中共躲过灭顶之灾！九一八之时，蒋介石正在前线指挥对共军的作战，日军的进攻让中共得以在国难当头向国民政府背后捅刀——发展阶级斗争的根据地，日军与共军互为呼应、互为帮助。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汪精卫、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等人出于事变期间红军发动赣州战役干扰正面战场抗战等原因，正式确立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来源作者：奉天老胡子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2138887/>）。“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被中共逼出来的。正当蒋介石对红军进行第四次围剿时，日军发起向长城进攻，中华民国不得以进行长城抗战，红军再次躲过灭顶之灾。

当中国政府围追中共至贫穷的西北，中共已经山穷水尽，当时中共的根据地才 60 万人口，根本养不活几万红军，靠宋庆玲的支助才暂时勉强存活。这时，日军发动了七七事变，引发中日全面战争，给中共得以喘气机会。当中国人为抗击日本侵略，浴血奋战、血流成河、心身疲乏之时，中共却在日军后方（敌后）发展壮大，共军还与日军合作攻击国军（把柄落在日本人手里）。当日本战败之时，中共却突然发难，抢夺日军武器，许多日军把武器轻易给了共军。当中国人心生厌占之时，中共却拿枪，想实现它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梦想；当中共在东北被国军打得狼奔豕突、几近崩溃之时，已经放下武器的日本关东军被迫加入林彪部队，用他们的本领提升了共军的战斗力，为中共夺取江山立下汗马功劳。

苏联还把美国援助苏联的剩余武器，价值大约 34 亿（也有 40 亿之说）美金转给共军，甚至苏联用军舰送到山东给共军。日本人是中共的帮凶，没有日本人的帮助，再加上中共祖宗——苏联的明暗相助，就没有中共上台的任何可能。共军为什么要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款？一是出于感恩，二是被要挟（把柄落在日本人手里）。

十二、反右前中国知识界对马列主义再次群殴

在中国，中共当政之后，继续不相信阶级斗争的人很多，梁漱溟也是一个。他说：“中国没有阶级”、“中国的问题是一个文化失调的问题”、“无色透明政府”、“中国革命只有外来原因没有内在原因”、“共产党不如工商联可靠”、“（我）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共产党丢了农民”、“有人说，如今工人生活在九天，农民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等等。

1953 年 9 月 11 日，梁漱溟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言说，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有人说如今工人生活在“九天”，农民生活在“九地”，工农有“九天九地”之差！梁漱溟的发言呈报毛泽东后，气得毛泽东哇哇叫，毛泽东斥梁漱溟坚持地主阶级立场，非难共产党的农村政策，列举了他十五条罪状。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期间，用流氓手段对梁漱溟批判。梁漱溟觉得毛泽东曲解了他发言的实质，要求澄清并解除对他的误会。可是，毛泽东对梁漱溟的定性逐步升级。17 日将他说成是野心家，伪君子。1953 年 9 月，毛泽东在《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中说：“如果你是一个有‘骨气’的人，那就把你的历史，过去怎样反共反人民，

怎样用笔杆子杀人，跟韩复榘、张东荪、陈立夫、张群究竟是什么关系，向大家交代交代嘛！我就怀疑，你这个人是哪一党哪一派！”这时，比五七年反右还早四年呢！

林彪死后，政协组织“批林批孔”，在同仇敌忾中，梁漱溟却“不批孔，只批林”。因此，他又遭到批判。在中共的统治下，梁基本没受到整肃，他只是万千个知识分子中唯一幸运的一个，其他人就惨了。

1957年初，毛泽东为了彻底整肃[知识分子](#)，采取“引蛇出洞”的方法，让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知识分子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虽然经历过“思想改造”等一系列运动，但一部分知识分子依旧没有认识到中共的欺骗性，于是在中共“不秋后算账”的保证下，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或者有些人明知中共会秋后算账、会迫害，也要趁机对中共攻击，说出自己心中长久被压抑的心里话。于是，在中共“诚恳”地“引蛇出洞”下，右派们为人世间留下一篇篇壮丽的篇章。不过，中共很贼。在这之前就把张东荪关了起来，否则，张把他以前的言论说一说，中共就摇摇晃晃。

中共上台不及十年，就积累了巨大的怨气，这是知识分子们对中共的一次集体围殴，精彩极了。

1957年，学者们借着中共的大鸣大放，大肆攻击马列主义与公有制，甚至一些上世纪三、四十代不屑于对马列主义批判的学者，也趁机开口批判，其批判之深刻、言辞之激烈，现在读来都令人振奋。

许多人认为，是知识分子们被中共所骗，我更愿意相信，许多人是想借着这个中共历史上唯一言论自由时机，发出自己压抑已久的声音。有这个机会，那是天赐良机，轻易放弃实属可惜。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想尽办法把我的书出版，或者在媒体刊登主要部分，那样，就算中共与毛泽东有天大的本事，也是死悄悄的。我这些书都是共产党的死穴：《人世间最大的谎言——辩证法》、《马克思谬论》、《两岸统一该用什么国号》、《通共媚日的二二八 可怜的外省同胞》、《中共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来发动内战》、《中共抗日之XX计》……马列主义的基础是辩证法，其实辩证法从头到尾全是错的，仅把批判辩证法这本书出版并大面积传播，中共也是死定了。

曾经看清中共面目的储安平积极行动起来了，他不仅派出大批记者到一些大城市采访，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鼓动他们向共产党提意见，并亲自安排版面发表了多篇措辞激烈的文章；而且他自己还在6月1日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作了发言。

储安平说：“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这个问题上。”他认为，“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些？”

他由此得出结论：“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

更让与会者震惊的是，储安平还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并且甚为不恭地称之为“老和尚”。“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

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他想向毛、周请教的问题是：“为什么现在的国家高级领导人中没有一个党外人士？”

储安平批评中共：党天下，党国合一、党军合一、党文合一、党民合一、“普天之下莫非党土”。

储安平的“党天下”言论和对毛、周的批评，不仅当时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而且随后为其引来了滔天大祸。6月6日，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党天下”的提法被批为是“严重的错误”。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执笔的《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反右”开始。此后，对储安平铺天盖地的揭发、批判与控诉接踵而至。妻子与其离婚，子女与其划清界限，同事纷纷“检举揭发”，储安平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6月底，储安平“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据他在检讨时的自述，在全国上下一片讨伐声中，他“胆战心惊、坐卧不宁，惶惶不可终日”。邮递员给他送来了信件，他不敢去门口拿，怕人家要同他当面辩论；到医院看病不敢说姓储，因为姓储的人实在太少了，怕被人认出他就是储安平；他更不敢去《光明日报》社上班，怕被群众围住批判。他提出了辞职，但这并未阻止对他的继续批判。7月，他不得不发表了《向人民投降》的发言。

最后，储安平失踪，不知死所，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估计是被中共谋杀，周恩来甚至放出要找到储安平、“生要见人死要见尸”的命令，可能是想掩盖谋杀痕迹。贼喊捉贼是中共的惯用手法，不但是用来对付国民党，也是用来对付中国人民的。

其实，像储安平这种人，就凭他能看清楚中共的面目，和在中共上台前对中共的负面言论，无论这次他是否开口，或者他对中共歌功颂德，甚至当中共的打手，中共也不会放过他，中共绝对不会放过一个看清楚它的人。邪教只有在别人的迷惑中生存，看清它就是对它生存的最大威胁。对于储安平来说“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何不勇敢一点、说多一点、说尽一点？

右派陈奉孝在《档案》这篇文章中说：

一九五七年七月，北大的反右运动已进入高潮。学生中的“大右派”如谭天荣、张元勋、龙英华、刘奇弟和我等人的名字“有幸”都上了几家报纸。其中《中国青年报》介绍我的情况中这样写道：“陈奉孝出身反动的资产阶级家庭，从小思想极端反动，他就认为地主养活农民”。我看后简直气坏了！我什么时候讲过“地主养活农民”？这简直是污蔑！我气冲冲地跑到党委办公室，质问党委秘书：“你们也太卑鄙了，我什么时候说过地主养活农民？！”那位党委秘书冷笑一声说：“你不承认？”说完立即将我的档案拿出来，翻开其中的一页指给我看，上面清清楚楚写着：陈奉孝在一九四八年X月X日在政治学习讨论会上说，地主养活农民。我看后一下子就懵了，半天说不出话来。这时那位党委秘书又冷笑着说：“怎么样？这是你的档案里记载下来的，可不是我们污蔑你呀！”

我象霜打了的茄子一样，耷拉着脑袋走向宿舍，一边走，一边想，可怎么也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我说过这句话。一夜没睡着，最后终于想起来了。一九四八年潍坊解放，那时潍坊叫潍坊特别市，因为是首个被解放的较大城市，首任书记是革命元老曾山，市长是姚仲明。十一岁的我上了初中。教导主任刘邕对学生进行阶级教育，在一次学习讨论会上要大家发言，讨论究竟是农民养活地主还是地主养活农民。解放前作为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连“阶级”这个词都没听说过。“地主”是个什么东西，我也只能从字面上去理解。我又是一个外向型的孩子，平时遇事就爱和别人争论，跟小朋友在一起玩耍还总喜欢打个抱不平。我发言说：地主就是土地的主人，地主的地也不是抢来的，也是自己争钱买来的。地主有钱，他不把地租给农民，

照样能活下去，农民如果租不到地主的土地种便没法活，因此应该说是地主养活农民。我发言后教导主任刘邕首先表扬我敢大胆暴露自己的思想，然后又讲解为什么说地主养活农民是不对的。因为受了表扬，我心里还美滋滋的，过后什么都忘了，谁成想这句话竟写进了我的档案！

...
老师一边赞扬他一边把他的反动言论写进档案，害他一生，好奸险啊！共产党党员就是这样的祸害自己的学生。

中共秋后算账的本事是它的本能，肯定要做的，就是在反右运动时储安平不说话，就凭他以前的“民主有没有”的言论，储安平也在劫难逃。

罗隆基说：我们原来是资产阶级政党，现在已经被你们改造成无产阶级政党了，那么**我们都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能不能轮流执政？**资本主义国家还搞多党制呢。

这些右派勇士们，扛着红旗反红旗，抬着马列打马列。

右派他们是对历史不了解，如果了解了中共的抗战历史，了解了中共的大革命历史，了解马列理论，她一定能得出马列主义是邪教这一论断，从而不再迷茫，从而更有智慧、更有力地斗争。其实，被打倒的右派、黑五类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就以阶级身份这一条与中共纠缠也会精彩。

我认为非常可惜，1957年的大鸣大放运动、中共搞反右派的引蛇出洞把戏，是中共有史以来最让人民讲话的一次，也是打败中共、为中国走向光明的一次机会。那些经过中共斗争、看透中共奸险的知识分子们小心翼翼，为了明哲保身不敢说出最关键的话，这是对中华民族不负责任，对人类历史不负责任，八九民运未能搞倒中共，以致中国至今还在中共的黑暗统治之下，就是反右时期的知识分子未能揭露马列主义的结果，中华民族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如果借着大鸣大放之机，在储安平所控制的《光明日报》上刊登几篇对马列主义与辩证法批判的文章，刊登本书的某些章节缩写，譬如“错误的马列唯心主义真理观”、“错误的阶级与阶级感情”、“马克思对国家与法律的错误定义”，更应该刊登《金剑：人世间最大的谎言——辩证法》中的某些章节缩写，如“质量互变规律是眼神错乱”、“对立统一规律是逻辑陷阱”、“阶级斗争是民族毁灭的力量”、“有理才能造反革命未必无罪”、“革命之罪与复辟之功”，在报纸上一登，当时就可以炸垮共产党的气焰，马列主义有可能慢慢坍塌。.....可惜了，当时的右派不知道好好利用，真的可惜了，**何年何月才再有大鸣大放？**中国在中共的统治之下，中华民族的良心群体——知识分子，在关键时刻未能抓住最关键东西，给中华民族的未来平添了无数艰难。如果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也像朝鲜战争中志愿军反共战俘那样坚决反共、毫不妥协、永不退缩、义无反顾，那么，到毛泽东死后，或者到八九民运时，中共就垮台了。为了未来，有的人还是应该吃点苦的。

当时右派只在民主与独裁的问题上与共产党纠缠，而不对马列主义理论进行辩论与批判，真的太可惜了，或者是右派们没看清楚共产党的邪教面目。就如唯一没被中共平反的学生右派林希翎，在反右时批评中共不民主，自由后，访问台湾时也批评台湾不民主，她的理论水平实在太低了，看不清正邪，看不清中共的邪教本质。共产党无论是民主还是独裁，都是坏的，民主的时候可能危害更大，文化大革命就是共产党大民主的表演，是千万个被魔教洗脑后的青年沿着中共指引的方向勇于去做坏事，祸害最大，真是罪恶滔天、天怒人怨，共产党甚至是比魔教更加恶毒的邪教。共产党的最大祸根在理论上，不从理论上扳倒共产党，共产党就不会退出中国及人类有历史舞台，不会放下对人类的屠刀。再说，如果马

列主义没有错，凭什么共产党要垮台？凭什么共产党和你讲民主分权？

没能看清中共与马列主义的邪教面目是人类最大的失败。如北大最勇敢的右派谭天荣，依然用辩证法与马列主义这两种邪论和共产党争辩，怎么能争得赢呢？连这两种邪论都不知道它们是邪的，真是可悲、真的可惜。

许多在中共上台之后才正式接受教育的年青人，也走上了反共之路，他（她）们比老一辈的知识分子更加勇敢，留下了一篇篇的杰作，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金光闪闪地照耀着。可惜，这些青年人没有看到张东荪对马列主义与辩证法的批判，否则，就会更加向推翻中共的方向发展。

中共耍流氓，说不过就用暴力。许多敢于向中共提意见的人都被迫害。中共断绝了民族的未来！智者在中共的统治之下，是很难生存的。

有个朋友说：“一个民族最大的遗憾并不是无知而是封闭通往真知的大门。前些年，有一位大学教授在微博上发了一条自己的言论，大意是：如果这个党是光明磊落的，为什么入党宣誓的誓词里还规定要保守党的秘密？如果这个党是一个自由的党，为什么还要求入党者永不叛党？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党，就可以想加入就加入，想退出就退出。这个大学教授发表这篇言论后不久就被大学开除了。”

中共当政后，杀害的反革命不计其数，他们都是民族英雄，都是无罪之人。



中共的镇压反革命——屠杀人民

被直接划成右派的约 56 万人，有人估计，实际迫害人数达到 200 多万人。他们受了 20 多年冤枉，许多人没能活出中共的迫害。多少右派分子死于夹边沟，那是中华英雄埋骨地，倒下的是我们民族的精英，是我们民族的英雄。

林昭、遇罗克、蔡铁根、陆洪恩、李香芝……一长串的名字。

中华民族英雄们纷纷倒在中共的屠刀之下。

《谭天荣：我的右派经历》记载：

但是，“经历最坎坷的人”的称号我还是受之有愧，我亲眼看到许多难友离开了人世，说一千道一万，我毕竟还是幸存者，当然就算不上经历最坎坷的人。

其实，对于那些经历更坎坷的人来说，大多数也是平静而又安详地告别人世的。我手

头有几位难友的回忆录，他们对这种生与死的和平过渡作了极为平实的冷峻的描写，有一位难友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死亡的乌云笼罩着整个于家岭。周围的人在一个个地死去，无声无息。严寒的冬天正伴随着死神，张开大嘴吞噬着这里的芸芸众生。最早死去的往往是那些原本体强力健的壮劳动力，因为他们旺盛的基础代谢最难适应突如其来的饥荒。随后，更多的是那些失去免疫力的病毒感染者，和由于耗尽体内积蓄而渐渐凋敝的老人。人们已经习惯了看到死亡，对死亡也已经不再恐惧。我们这些人自己也正在死去，也许我们已经死去，只是还没有得到承认。”

另一位难友在回忆录中写道：

“凡是 1960 年在兴凯湖农场劳改过的犯人都知道，这一年是最难熬的一年。尤其是春播，在整个春播的四十多天里，大雨小雨总下个不停，没有几个好天气。为了抢播，每个犯人发了一块大约一平方米左右的塑料布披在身上，顶着雨水平地、播种。又冷又饿，早上三点多钟到地里，晚上八点多钟才回来。在收工的路上，有些体弱的犯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带工的干部命令几个身体好点的犯人轮换着连拖带背的把倒下去的犯人弄回去，不久就死了，有的甚至就死在路上。其实这些人并没有什么大病，只不过是像一盏油灯一样，油都熬干了。有些犯人夜里就死在监舍的土炕上，有个罪名是‘历反’的犯人，还不到四十岁，个子很高，瘦得像高粱秆似的，有一天晚上收工回来他饿得昏倒在路上，带工队长叫几个体力好一点的犯人连架带拖将他弄回了监舍去。他正好挨着我睡觉，半夜我起来解手，发现他死了，告诉值夜班的犯人，值夜班的犯人又报告了值班队长，值班队长说：‘死了就死了呗！半夜三更往哪里弄？等天亮再说。’吓得我和另外挨他睡觉的犯人后半夜根本没有睡着觉。天一亮，叫两个犯人抬出去挖个坑埋了拉倒。开始我还有点害怕，这种事情发生的多了，习惯了，也就不怕了。”

第三位难友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 1960 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寒流又一次经过这里，第二天清晨，我隔壁的房里没有人出来打早饭，到中午时才发现，房里的十五位难友安安静静地睡在各自的床上，再也没有醒来。面对此情此景，杰克·伦敦能不能激发出灵感再构思一个人与自然殊死搏斗的故事呢？乔治·奥威尔能不能在他那漫画式的小说中添增新的一页呢？不！让文学家们见鬼去吧！这里不需要激情与伤感！也不需要分析与综合！事情是最最平常、最简单的：日历又翻过了一页，又有十五个人民的敌人悄悄地越过了比纸还薄的生与死的分界面，被动地进入了‘自绝于人民’的队伍。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还有一位当医生的难友在回忆录中写道：

“……垂危的往医院送……绝大部分是从劳改、劳教农场送来的劳改、劳教犯人。他们一点活动能力也没有了，由送来的人把他们抬到病床上。这些人来了以后，当天或第二天就死去，有的拖了几天，最终还是结束了生命。”

在那些日子里，我对周围的人一个个死去也经历了一个大同小异的“适应”过程，我自己也长时间徘徊在生与死的分界面上，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侥幸活过来了。

……

更惨烈的死亡在夹边沟，多少民族英雄惨烈在夹边沟。在里实在不忍心摘录。

附录：揭穿右派分子雷海宗“研究学术”的外衣

《人民日报》讯：在 8 月 13 日到 17 日举行的天津“科联”分会委员会和各专门学会理事会联席扩大会议上，许多人揭露和批判了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九三学社天津分社副主任委员、右派分子雷海宗的反动言行。

雷海宗一贯地披着“学术研究”的外衣，肆意向马列主义进攻。据南开大学历史系讲师魏宏运揭露说：雷海宗在今年4月间公开发表“马克思主义停留在1895年”的谬论以前半年，就说过“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死时（1883年）就停止发展了。”又说过“马克思主义在1877年（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出版那年）就停止了发展”。雷海宗还曾经对学生说：“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在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就陈旧了，没有参考价值了”。魏宏运说，雷海宗的目的是要从根本上否定马列主义。由于现在马列主义已经传遍了全世界，在我们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成了指导思想，他不敢公开否定，便换一种手法，说马克思主义哪一年哪一年“停止发展”，这样来全盘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

天津史学会副理事长、南开大学教授吴廷璆列举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著作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的贡献，驳斥了雷海宗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没有发展的谬论。吴廷璆指出，苏联、中国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中一般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发展，也是不胜枚举的，而雷海宗不顾事实，硬说马克思主义在1895年以后没有发展，目的在于否认1895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否认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否认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雷海宗连续放出的反动谬论，是企图在“学术研究”的外衣下，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诬蔑马克思主义为教条主义，诬蔑社会主义阵营的科学“薄弱”、“贫乏”，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同时吹嘘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发展和“丰富”，企图使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在新中国复辟，最后取消马克思主义。而取消马克思主义，自然就取消了社会主义。这就是雷海宗的反动言论为什么得到其他右派分子的鼓掌欢呼，并且用来作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

中国哲学会天津分会名誉理事长、南开大学教授冯文潜说，雷海宗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分成两个方面：一是总结工人运动和社会革命运动的经验；一是总结人类全部历史过程中的经验。难道工人运动和社会革命运动就不是人类全部历史过程中的经验的一部分？就不能写在社会科学的帐内？如果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象雷海宗说的那样，根本不是科学的话，我们还有什么可说呢？那我们所建设的社会主义都是盲目的冲动、都是瞎胡闹了。这也许就是雷海宗提出他的荒谬理论的真实企图吧！

雷海宗还采取含沙射影、明枪暗箭的手法，恶毒地诬蔑新中国的成就，诬蔑党和国家的若干政策，挑拨知识分子和农民同党和国家的关系。据南开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杨生茂揭露，雷海宗曾对学生说：“解放后的书没有学术价值，读了使脑筋僵化；就业务观点看，应多读解放前的书”。雷海宗还说：“目前，我们的教育方针太笼统太概念化，不从实际出发，因此不能培养教育出完满健全的学生。解放后，虽然禁止了对学生的体罚，但今天对儿童、青年在精神上的虐待却很严重。”杨生茂问道：我们党和人民政府，什么时候规定过要对儿童和青年实行“精神虐待”的方针政策呢？雷海宗还说，解放以后的知识分子“一般地是一言不发的，或者是只发希望他们发的一套假言”。杨生茂指出，这是恶意地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河北天津师范学院副院长朱星发言说，雷海宗在今年6月2日所发表的“学术讲演”中曾说：“无论在什么时代，农民都是最善于消极抵抗的；统治阶级只要叫他感到不满，他就会怠工、破坏、故意减产，除了自家糊口外一粒无余。”这简直是对新社会的农民的污辱，而且是对我国农民同工人阶级、同人民政府的关系的恶毒挑拨。魏宏远在发言中也揭露说，在私营工商业实行全行

业公私合营时，雷海宗听说某些商场毁了一些无用的旧书，就说：“这是中国的第二次浩劫，是第二次焚书坑儒”。魏宏运说，雷海宗进行这样恶毒的诬蔑，说明雷海宗对新社会的刻骨仇恨。

雷海宗的一系列的反动言行并不是偶然的，是和他长期以来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历史分不开的。魏宏运揭露说，雷海宗曾经说过：“我（雷海宗）在解放前替蒋介石着想，比蒋介石自己还要周到。”朱星在发言中也指出：雷海宗在解放前曾投靠反动头目朱家骅，一直为“战国策”“当代评论”“每周评论”“中央日报”等反动报刊撰写文章，他先后曾发表过一百多篇文章，鼓吹法西斯主义，叫嚣反共反苏。天津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南开大学教授滕维藻发言说：雷海宗在抗日战争直到全国解放前夕这一段时期中，除了主编反动刊物、发表反动文章和演说而外，在昆明时还发动西南联大的一批教授联合发表反苏宣言，参加反苏游行，并且上书蒋介石，推荐胡适作行政院长以期“收拾人心，争取美援。”他还给蒋介石献策说，中国只有法西斯化才能“强大”，才能“统一”。雷海宗曾在反动刊物上发表文章诬蔑共产党说：“共产党若剥去外来的名词和口号，不过是一个半秘密半公开的，带有宗教性的，以饿民为基础的割据势力。它的唯一真正特点，就是依附外力与否认国家民族……”。滕维藻说，雷海宗在反共反苏方面，是有理论，有政治纲领，有实际行动，二十年如一日的老牌专家。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8月22日，原标题为“天津科联一场胜利的论战，揭穿右派分子雷海宗‘研究学术’的外衣，看透他从根本上破坏社会主义的阴谋”（注218）。

……

还有多少像雷海宗这样的反共反苏知识分子，敢于在中共当政之时依然言语反共，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愿我们有彻底查清的那一天，估计只有在中共垮台之后。

注218：揭穿右派分子雷海宗“研究学术”的外衣——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8月22日

<https://banned-historical-archives.github.io/articles/ded28854eb/>

十三、英雄林昭

林昭是个受马列主义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年轻女知识分子，出身于革命家庭，受到母亲革命思想的影响，解放前曾经当过几天中共的地下党。她天资聪慧，对文学有特殊的颖悟力，很小就投稿，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曾有类似“神童”的称号。

考上北大后，1957年反右期间，参与出版刊物《广场》，后被打成右派，因病回上海，继续与朋友们组织“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林昭在上海认识了兰州大学的研究生顾雁、徐诚，当时兰大的张春元等人，正在筹办针砭时弊的《星火》杂志，随后林昭的长诗《海鸥之歌》和《普鲁米修斯受难之日》在《星火》第一期上发表。1960年10月，林昭被逮捕入狱。她的父亲当时已被打为历史反革命，靠糊火柴盒为生。得知心爱的女儿入狱后，自杀身亡。林昭逮捕后绝不认罪，被判20年徒刑，其他二人则各为7年和13年。事实上她根本不是主犯，只是参与者，刑期比主犯还高得多。

1962年，林昭因病保外就醫，再次参加青年非暴力活动，再度入狱。

狱中8年，被剥夺了笔和纸的林昭，用竹签、发卡等物，千百次地戳破皮肉，在墙壁、衬衫和床单上，用鲜血写了20余万字的文章和诗歌，反对奴役人的状况，控诉不自由的生活，批判让人流血的制度。

林昭拒绝违心地服从，被狱卒视为表现恶劣，遭受较严重的虐待，林昭在血书中写到：“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玩出了不知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等等不一。臂肘之上至今创痕犹在不消说了，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不论在我绝食之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情况--月经期间，不仅从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未有所减轻！--比如在两副镣铐中暂且除去一副”。

张元勋以未婚夫身份去见她，在会见现场，狱方共有三名制服警察，数位便衣女郎（张认为是翻译录音等技术人员）和二十多位佩枪军人。在狱中，一个弱不禁风的多病女囚会见未婚夫，居然搞得如此排场，其中的阵仗这般夸张，着实令人疑惑不解。

张元勋回忆道：

我答：“都好！都希望你好好改造，平安出狱！”

她打断了我的话，高声说：“出狱？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他们早就告诉我：要枪毙我！这已是早晚的事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们可以唆使一群女流氓、娼妓一齐来打我，故意地把我调到‘大号’里去与这些社会渣滓同室而居，每天每晚都要在他们（以手指周围）的主使下开会对我斗争，开始这群泼妇也瞎三话四地讲一些无知而下流的语言，可笑的是她们竟连我是什么犯都一点不知道，骂我‘不要脸’！真是可笑！她们这帮东西！她们是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她们竟然还知道‘要脸’！她们理屈词穷，气急败坏，于是对我一齐动手，群起而攻之！”

她说：“我怎么能抵挡得了这一群泼妇的又撕、又打、又掐、又踢，甚至又咬、又挖、又抓的疯狂摧残呢？每天几乎都要有一次这样的摧残，每次起码要两个小时以上，每次我都口鼻出血、脸被抓破、满身疼痛，衣服、裤子都被撕破了，钮扣撕掉，有时甚至唆使这些泼妇扒掉我的衣服，叫做‘脱胎换骨’！那些家伙（她指着周围）在一旁看热闹！可见他们是多么无耻，内心是多么肮脏！头发也被一绺一绺地揪了下来！”

说到这里，林昭举手取下头上的“冤”字顶巾，用手指把长发分理给我看：在那半是白发的根部，她所指之处，乃见大者如枣，小者如蚕豆般的头发揪掉后的光秃头皮。

她又说：“因为知道你要来接见，怕打伤了我无法出来见人，故这几天斗争会没有开，我也被调到一个‘单号’里单独关押，其实就是让我养伤，以掩盖狱内无法无天的暴行！看，头发揪掉了，伤痕犹在！衣服也是他们撕的，你看！”她披着的衣服里面是一件极旧的衬衣，已经没有扣子，仔细看去，才发现是针线缝死了，无法脱下。她又说：“这是一帮禽兽”。指着周围：“他们想强奸我！所以我只能把衣服缝起来”。我发现：她的衣服与裤子都是缝在一起的。她说：“大小便则撕开，完了再缝！无非妹妹每月都给我送线来”。她边说边咳嗽，不时地撕下一块一块的卫生纸，把带血的唾液吐在纸上，团作纸团扔在脚边。“但他们还不解恨，还要给我带上手铐，有时还是背铐”。稍停问我：“你知道什么叫背铐吧？”我点了点头。一直还极力故作“静而不怒”的那些管教干部此时也无法再故作下去了，向我说：“她胡说！她神经不正常，你不要相信她的这些话。”“神

经不正常？”——林昭抢白说，“世界上哪个国家对神经不正常的人的疯话法律上予以定罪？你们定我反革命罪的时候怎么不说我是神经不正常呢？”

我沉默着不敢发言，便插嘴说：“不要说这些了，说些别的。”“不要紧。”林昭又抢白说，“顶多也就是死！他们杀机已定，哀求之与痛斥之，其结果完全相同！我盼着你来，就是想告诉你前面的这些话，我随时都会被杀，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难告诉给未来的人们！并希望你把我的文稿、信件蒐集整理成三个专集：诗歌集题名《自由颂》、散文集题名《过去的生活》，书信集题名《情书一束》。”稍停：“妈妈年迈无能，妹妹弟弟皆不能独立，还望多多关怀、体恤与扶掖。”语未毕而泪如雨下，痛哭失声，悲哽不止，以致无法再说下去。

.....

这个美丽的世间奇女子、一个手无寸铁之人，竟然被中共秘密杀害，可见，中共与毛泽东对她怕到骨子里去。1968年4月27日，上海曾将7名包括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在内的所谓“反革命”在万人大会上公开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因而轰动一时。而林昭则是在仅仅两天后的29日另行被判处死刑，且秘密行刑，当局并向他的家人索取5分钱子弹费。余不洁先生认为毛泽东见过林昭，《余不洁：毛泽东是否见过狱中的林昭？》

中共敢于纪念张志新，却不敢纪念林昭，甚至不让人们纪念林昭，因为林昭才是看清中共之人。



（人民自发纪念林昭）

中华民族的抗共英雄不只是林昭，有一大批一大批的青年英雄、年长英雄一样英勇地、飞蛾扑火般地抗击中共，只是林昭最有才华，留下的文字最多最美，以致留下长久的名声，更多年青的、年长的英雄，无声无息地牺牲在抗共的战斗中、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

中共不灭，中国人没有近代史！

附 1：林昭十四万言书——《给人民日报部的一封信》摘录

要知道，那怕是封建时代最最恶劣至于肆无忌惮的暴君，也还不能不畧为顾念到其王朝的根本统治利益而在某许多地方稍惜声名稍存体面稍稍受一点纲常伦理道德法纪的约束。然则我们今日不谈法律，不谈人权，不谈公义，不谈道德，甚至于不谈“盗德”，就说作为堂堂一家俨乎其然的所谓政党，你们到底还有一点最起码的原则性吗？假若面对着两封那样惨厉的血书，你们竟然还能够袖手坐视恬不为怪、而继续放任纵容你们的独裁党魁、你们的秘密特务如此公然肆恶胡作非为，则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道德究竟堕落到如何地步了呢？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生活究竟黑暗到何等程度了呢？中国共产党的党纲党纪究竟败坏成什么样子了呢？一切保有着中国共产党党籍的先生们女士们除了到人民公共厕所里去检些破草纸糊起脸壳来又将以何面目颯然向人呢？而假如说你们并未收到——并未看到我那两封血书，则又十分确实至于无可怀疑更加无可争辩地证明了另外一些事情。首先证明你们的党内生活极端专制而且极其黑暗，甚至连封建君臣之间进谏纳谏的那么一点“民主”程度都不可能有！——都不被容许！

证明秘密特务实际上是你们党内杀人不眨眼的太上皇！你们的党已经“干净、彻底、全部”地特务化了！由此更证明中国大陆在你们这家魔鬼政党的妖氛笼罩之下已经沦为如何可怕的不见天日的地狱，因为你们使用着彻头彻尾的特务恐怖统治！——首先以秘密特务系统监视、控制从而统治全党。然后更进一步“以党治国”，而将这特务化了的党来监视、控制从而统治全国！说什么警察国家！世界各国古往今来不论那一代专制王朝都不可能建立起这样闻所未闻酷虐惊人的恐怖制度血腥统治！而不论世界各国古往今来的哪一名大独裁者都不可能像你们之阴险毒辣十恶不赦的独夫党魁这样坏事做绝，而且坏到入骨！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无论属于那一种情况，我都不能不痛切地指责你们！——你们应该受到指责！假若作为堂堂的中央党报你们竟然收不到一个青年反抗者在桎梏之下指名写给你们的血书，则说明你们的报纸对你们的秘密特务系统说来不值一张草纸！假若你们收到了那样惨厉的血书而竟然噤若寒蝉莫置一是以致坐视造成人命关天的流血事件，而且犹恐不止造成一桩，则同样说明你们的报纸对你们的秘密特务系统说来不值一张草纸！不管属于哪一种情况，你们的报纸总不值一张草纸。不是吗？明摆在眼前的事实难道不就是这样吗？当作所谓的中央党报你们的名字——你们的招牌甚至都不能获得你们党内秘密特务之下情上达的那么一点最起码的尊重，还怎么能指望获得广大国人民众的尊重呢？更还怎么可能获得像我这样的反抗者的尊重呢？如果说先生们的贵报不止值一张草纸，那我倒很想知道它究竟还值些什么？我所以要论断你们即便当作御用的“情况中心”都殊不值一哂其道理就在这里，有许多情况连你们都未必真能尽知……我不禁想请问：先生们！除了天天浪费油墨纸张以向国人散发那些空虚、伪善、廉价而更无聊的“万岁”呼号和愚民叫嚣，并不时把些某些某街某巷五岁小孩在墙上画大乌龟而题名“毛泽东死了”之类的重要情况军国机密编入内部资料以供捉影捕风等等而外，即使对于这个极权制度——对于这个特务统治，你们的报纸到底又有多少存在价值？真的，假若先生们的贵报值得一张草纸，那我倒很想知道它究竟值得一张什么样的草纸！

作为反抗者林昭有一点是自谓可告俯仰无愧的，“凌霜劲节千钧义”！迷惑，

挫折至于力不能支那是另回事，至少至少战友决不能背离，犹如战斗决不能背弃。假若不是因为执着于这一点，则我是也大可坐在一边省些力气，甚至根本无需乎走入反抗者的行列。诚如人们所言——我也承认：即使自从反右以来，对于林昭，为人的门尽管关闭，为狗的门却一直是敞开着。然而我不能！青少年时代思想左倾，那毕竟还是一个认识问题；既然从那臭名远扬的所谓反右运动以来，我已经日益深化地看清了伪善画皮底下之狰狞的罗刹鬼脸，则我断然不能容许自己堕落到甘为暴政奴才的地步！政治思想的坚定一面也就是根源于此：是非观念。一九六三年初到第一看守所不久，我就向审讯者说过：利害可以商榷，是非断难模糊！记得他当时倒居然还——虽然也许不过一种欲擒故纵的方式方法——对我这话表示首肯而承认我“说得也有一些道理”哩！

这个青年反抗者就已经在桎梏下以自己的鲜血对今日现实作出了沉痛激愤的抗议与指责：“今之视昔、后之视今；人世何世？公义何存？不，远远不止是那样！倒是每况愈下后来居上！”

哀哀皇天后土，光从这一点上就已经充分表现、充分证明了今日的中国大陆在贵家魔鬼政党的极权恐怖统治下，成了如何一个黑氛迷天，血腥遍地，荒谬绝伦的而惨厉无比的地狱！人间何世？人间何世？人间何世？！

反右——那腥风血雨惨厉倍常的一九五七年在许多人也在这个青年人的生命史上深深地刻下了一道烙印，划出了一道鸿沟！而这回事当然是共产党错的！不仅错，而且大错特错！凛鉴于匈牙利事变的惨痛教训想缓和一下国内舆情使可能产生的问题消弭于无形，原意或亦可算为力争主动未足厚非。但为什么对客观事态的严重程度估计十分不足呢？又为什么不先从主观上准备着比较良好的政治风度呢？当然这两者也互相关联着，而其根本原因便是：只有方式而毫无诚意，故闹到临了便也成了那么一回叶公好龙的可悲的笑话，弄得无以自圆其说了，更只好恬不知耻地强颜解嘲曰：完全正确，这正是一个圈套，目的为诱敌深入等等。顺便说一句：我于此等地方也每每恨得牙痒不已！做错事情任何人都在所难免，最最不可原谅的倒是这种曲为诡词以文过而饰非的做法！这比之单纯的做错事或害怕认错更要恶劣到不知多少倍哩！几时共产党能把这一点改掉，则也许就可以比较出息了！……

……真的，无论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之下，我攻击反右那回臭名远扬的丑剧都从不强调什么个人的委屈之类。个人纵有天大地大无大不大的委屈，总不过是中国大陆知识界与青年群那冤恨滔天的血泪汪洋之中一滴水罢！这场丑剧并不是专对林昭个人的，在我说来倒更习惯于把自己这一滴水放在那个滔天的汪洋以内！不管怎么地吧，事态的发展总是已经到了逼得人们不能不在根本的政治态度上有所抉择之地步。那么……话要说起来呢也不费多少辞藻，而且以往对着人们也不是没有说过：既然我不能容许自己堕落到甘为暴政奴才之地步而跟着共产党去反右，则只好做定了所谓的右派而来反共了！问题就是这么地尖锐而更严峻得丝毫不容回避，因为已经丝毫不存在回避的余地！而在这个问题上的是非所属原也十分清楚！假如先生们能够跳出你们那个自欺欺人的所谓阶级观念也者的圈子而发为那怕一句通达平允之论，则这原是个不成其为问题的。假如先生们为愁骨灰盒子装不满而非得要抱住了那个楼梯上打架的“阶级观念”以当随身殉葬之具的，那么即待来日一听天下人公论公断！

而比较起来，我们这苦难的青春代是更有理由要向共产党来索讨血债！怎么不是血呢？！阴险地利用着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着我们善良单纯的心地与热烈激昂的气质，予以煽惑，加以驱使。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了一些开始警觉

到现实的荒谬残酷开始要求着我们应有的民主权利时，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惨毒无己的迫害、折磨与镇压！**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为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个污秽、罪恶而更伪善的极权制度恐怖统治之下！**怎么不是血呢？！**这个玷污了祖国历史与人类文明的罪恶政权可谓完全是以鲜血所建立、所巩固、所维持下来的，而滋养着、灌溉着、培植着它的这一片中国人的血海里我辈青年所流的血，更是无量无际汪洋巨涯！不，管得先生们跳不跳得出你们靠以吃饭抱以殉葬的那个楼梯上打架之观念也罢，无情的客观事实，不管用上多少伪善的说教或虚伪的粉饰，也决计不能遮掩更不必说歪曲！犹如这个青年反抗者三年之前就在给与你们那伪法院的书面答辩中所指明了的那样：历史早已宣判了、生活完全证明了：我们是无罪的！**罪人是你们这些可耻的极权统治者，而不是我们！——不是我们，不是我们！根本不是我们！而且绝对不是我们！**

账算到此地——到反右为止，林昭还只是将自己置于稠人之中而作为我辈群体间的一分子在说话，而在这以后却需要更多地从个人这方面——需要从个人的角度上来算算了！……这封古怪的读者来信拖得太长了！而且，上帝知道，我写得有多么累呵！如同过去对人们所说那样：这颗一次次在剧痛中麻木却又一次次苏醒于剧痛的悲愤的心是如此疲倦以致它每每情不自禁地渴望着休息！……惨厉的沉痛使我麻木；然而为着战斗我又断然不能任自己陷于麻木，为要脱出麻木我只有力持清醒而强使自己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现实！——忍受更加惨烈的剧痛！能够痛哭或者流泪亦可谓是一种幸福呢！最最痛苦倒是那样多眼眶干燥得淌泪全无的时刻：那些灼人的热泪无声地返流而一滴一滴滴在心上！每一滴都胜如利刃的一刺或钢鞭的一击，令这颗年青而热烈的多感的心痛得痉挛欲裂！……但是，罢了，这些话本不该写在此地因为它们已经忒含着人性气息而颇越出了楼梯上打架的的范畴，但或许也不妨写上以为后人他年研究林昭提供某些旁证，因为这一份该死的“人性”正就是造成林昭本身之悲剧的根本原因！

先生们看到此地可能也会如第一看守所的人们那样强为之辞道：错都是人家的，你就没有错了？——那也未必。除了上帝十全十美，天下没有不犯过失的人，而在咱们这一番争斗里，林昭除了战略策略或战术动作上的未尽善处间亦构成为错误而外，越到后来我越对自己产生出一种可怕的怀疑！犹如一九六二年假释期间一位师长看到了《思想日记》之后愤然斥责我的那样：“**你还在盼望他们改好？你简直该死！**”——这也许就是我在政治思想上，在对待中国共产党人之政治态度上的根本错误罢。假如先生们作为供职于堂堂中央党报里的政治家能代表那数以千万计的保有着中国共产党党籍的人们总说一句：**你瞎了眼！怎么竟就没看出来我们统统都只是一些该杀该宰该当灭绝的罪无可逭十恶不赦死有余辜一无救药的人！**——那么是了，我可能是犯着根本性的严重错误了！

老实警告先生们：从个人所历这些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我对于当前政治现实的认识是愈来愈深入本质而接触核心。随着认识的深化每使我从心底深处愕然震惊，但觉寒冷彻骨沉痛欲绝而悲愤无己！这样多的罪恶！——这样污秽！——这样暴虐！——这样酷厉！——这样残忍！——这样恶毒！——这样惨无人道！呵哟！先生们，供职于堂堂中央党报里的可敬的先生们哪！**你们可也曾想过没有？对于已经作下的一切！你们到底准备怎样收场哪？……**

“当复仇的大地血海潮起，
逐食的鸦群呵何枝可栖？！
……想到一个问题我每打冷噤：

天哪！谁知道你们将来怎么死？……”（引自《牢狱之花》）

“同样并无任何值得加以指责的错误！而且又得说了：谁个能够，谁个配来指责我们呢？陈腐无能至不能维持民国法统于不隳的国民党人吗？**极权暴虐只知以血与仇恨来维持统治权力的共产党人吗？**低首下心奴颜婢膝唯求分得半杯残羹一口冷饭的**“民主人士”**吗？怅吟“式微”潜歌“黍离”但望神兵一朝自天而降的**“社会贤达”**吗？平时处士横议恣谈忠孝一到考验临来面前便噤若寒蝉肃如金人惟愿苟全性命的**“学界先彦”**吗？上焉洁身自好求其独善，下焉寄人篱下求食高门而根本态度同为管自己在云端里看厮杀却全不意识到作为一个中国人之民族责任的**“海外名流”**吗？彼苍昊天！始祖轩辕！哀哀我中华民族寂寞在**极权暴政高压统治之下的正气**，如今是只不过维持在这一辈于惨重苦难滔天血泪中以无比凌厉的杀身成仁的勇略毅力为还我人权自由奋作殊死决斗的青春代身上了呀！”

总而言之，你们的独夫——贵第一看守所所长兼**贵中央委员会主席**具有着一个极其可怕的冷酷而刻毒的灵魂！在这个灵魂中除了羨“江山如此多娇”的野心家的贪婪，“欲与天公试比高”的不自量的狂妄，“虎踞龙蟠今胜昔”的自鸣得意，“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自我吹嘘以至**屁股入文苍蝇入诗的轻浮**，死掉世界人口一半的残忍等等而外，我怀疑它还会有任何人情与人性的存在。

这马列主义牌儿的所谓法律也者实在仍不过是配合钓饵造成声势以促令反抗者低首就范的一种、一种……一种什么混帐！

我不知道“伟大、正确、英明”的中国共产党或至少使着“伟大、正确、英明”的中国共产党之名义所作下的丢脸失体之可耻勾当是否以此为最？但反正这也就满够上了登峰造极！不仅前无古人，敢谓后无来者！

头可断，血可沥，肝胆铮铮如石铁。山嶽夷，江海竭，此身为糜不隳节。贞骨千年永凝碧，一女矢志归清烈！

（不成话说，可敬的先生们，不成话说！不管你们自口道中关起门来去给贵楼梯上之这一层踏步披上了多少件政治外衣——多少块政治破布也罢，那怕就让谁个把马克思棺材中那块朽不了的裹尸布也挖掘出来给它披上，这一层楼梯踏步还只是闻所未闻地不成话说！）林昭在处兹事待斯人的全过程中包括陈诉于柯氏之举，其无可非议的程度自谓竟能经得起一切魔教狂信者包括共产党人们的吹求更莫说是推敲！

老实说，你们蹲在那么个彻头彻尾地**特务化了的魔鬼政党**之内，那是**作恶有路而向善无方**，故只要是保有共产党党籍者，谁都跑不了在所谓的“民主集中制”之下**为虎作伥**地造些恶孽而沾些腥血！越爬到了上层去那恶孽就造得愈足而腥血也沾得愈多。根据着这一点，林昭自己虽然还未下着血洗共产党人的决心，我倒觉得那些立誓“有共无我”而务以杀灭共产党为志者也不见得很可责备，至少不见得比他们所欲灭绝之而后已的对象——共产党人们更可责备！这首先就因为造够了恶孽的先生们**从独夫起堪谓几无一人**不具有可杀之道甚至一个头都不够杀地死有馀辜。亦因是故我才在此信之开卷明义的第一部分“引子”里就愤然声言：假若独夫杀尽了贵编辑部或贵中央委员会，那他倒至少或者是为爱国卫生作了一件**好事**。那些心地较为善良单纯的人们他日见到此语也许不免会吃惊于一个基督徒怎么竟说得如此之冷酷而毫无怜悯惻隐之心的话？嗯，当他们还不曾深刻地了解着这句话的基础是如何一种冰冷的憎恨之前，他们可能会惊诧的。

（关于那个1965年3月12日关于越南问题的政府声明），但年青人又得讽着独夫缺乏哲学头脑因为他竟忘记了可以决定事态的客观因素，首先是时间、地点、条件、问题、对象、力量、背景等种种都已经大不相同！今日之下再来要

这套狗熊式的一万赌一，其后果除了使中国人以至有关的他国人（还不止是越南人）多受许多苦楚，多付许多牺牲以外，无任何一丝一毫侥幸之可能！……那一天就是这样，年青人在早晨以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激动的心情之中怔怔地盯着那个所谓的政府声明而悲痛地想道：**权力真是一种多么危险的东西，妄人又是一种何其可怕的人物！妄人窃掌权力这更是一种如何糟糕的事态并将造成如何痛心的悲剧！**我默然地又刺破手指而把血点弹在了那个色厉内荏大言不惭地所谓声明之上好像它就是独夫的脸皮！……当作一种严峻的抗议！……

《疯话》就在那个下午起稿，到底那是三月十三日还是三月十四日么只好异日到那些血的原稿上去查找罢。写它的动机么亦可谓很明显，谁若看到它都不难理解：首先就还只是在竭力想向独夫作些不拘形式不着痕迹——不落陈套的规谏而促要他凡事取之正途！那不开宗明义的第一节就是责备他不听好话而犹在玩火，第二节则是责问他：“我的东西（注：指手稿等——昭）你为什么不给？你安着什么心眼儿？……你为什么把我的东西串在钩子上？我又不是是一条鱼？”等等。随后的几节虽不免略略有所发挥，诸如：“**你不是人，我也不是人！你是个鬼，我也是个鬼！——你是自个儿高兴要做鬼的，我是活生生挨你逼成鬼的！……**”“其实你就只有那么一点力量，你的办法说来说去也就是那几手。你的基础：**‘土穷巧极’**；你的表象：**‘比学赶帮’**；你的实质：**‘偷抢扒拿’**；你的目的：**‘多快好省’**！……”“夜真长！……这无声的夜——我累了！……但你在干什么！跳舞，**还是吃人？——人好吃么？什么味道？为什么要吃那么多的人？你饿了么？——你消化得动么？……**像这么多所留难地一味挟制，岂不正反映出独夫的邪念未去邪心未死？而既然照年青人分析起来这里面除了轻薄连些情欲成分都未必有的，则这一份纠缠不已的令人恨得牙痒的邪心归根结底其实质又不过是政治交易所——政治市场上偶或会被人们使用出来的杀价手段之一罢了。这与那一万赌一地土穷巧极多快好省的内心世界倒也颇称符合，而正是为这一点才致使年青人在深思中情绪愈来愈激动愤恨愈来愈强烈至于一发而不可收！……来到此间后我也对着人们说来：在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以后林昭是真已可谓百事看破而万念皆空。**看啊！连人类文明生活中一些至为神圣、高贵、恒久而光辉的概念与原则诸如自由、正直、仁心、道德、风范、刚骨等等，到一旦进入了政治领域以后竟然就……**在某种意义上几乎都只贬低得成为了旨在增加商品价值的**装璜纸盒**！这就是我们人类社会之该死的政治。人们什么时候懂得了这一点，就称为懂得了政治，什么时候学会着随心所欲小大由之牵强附会而毫不脸红地耍弄这些装璜纸盒以欺世盗名哗众取宠了，这样的人就得被称为政治家！林昭经过这几年来的“增长见识”吗（也是第一看守所并大概跑不了也是先生们之贵所长给我的话）对这一点总算比较地懂得了，但还只是学不会并且也许永远学不会耍弄它们，故虽然好歹地懂了些政治，毕竟还不能够——还够不上作个什么“政治家”。

我亦尝坦率地敬告与人们道：说暗示不能当为解决问题的根据，除了易启误会以外，还更因为跟共产党人们打交道是**连明示都不足为据**的！自昔至今不待入狱更不限于本身之事，我所知的实例也不知多少。**说得牙白口清铁板钉钉的事儿照样说变就变说赖就赖**。先生们之语言乃至诺言又能值得几钱？所以我极钦佩而服膺杜勤斯先生对于这一问题的论断，他不是说吗：**共产党人们根本不懂得何为信用，要使他们遵守信用的唯一办法只是：让他们懂得不守信用将会获致什么样的有害的后果！**亦因是故反右当年闻得人们传言说**章伯钧**（？）初知消息时曾失声道：**哎哟，我又上了共产党的当了！**彼时这个年青人不免失

笑，但笑过以后便自警要深以为戒！而在这几年来扭成一团的苦战之中林昭是更对共产党人们的内心世界精神状态等种种一切有了颇称深切的了解。当然，倘若客观形势明摆着是说话算数比不算数好，则可能也是会得算数的。但这绝对不是本心，论着本心那是，铁板钉了钉都还不忘瞅个空子见缝插针！所以林昭也不止一次地向人们直认不讳过了！**我要是无论对哪一名共产党人放松了警戒与堤备，那我就是犯了莫大的错误。故莫说暗示不算，明示都不能算的。**多咱解决了一个问题，那才是解决了一个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才算是解决到什么程度。即使解决，犹不可以高枕无忧而要处处留神。因为有些问题虽无反复之可能，有些却是有的。即不能反复，犹能破坏或至少阴损，等等。持这种态度是基于对先生们——共产党人之本质的深切的了解！而也只有持这种态度才能使自己与先生们的对局中不失主动或少占被动。也因此在那当时，林昭就无法迷信那一杯米汤而无条件地放心释虑，特别又因为米汤已经给得那么艰难而其他一切事情无大无小还统统不见有一点儿合理解决的可能趋向哩！……

多少次在悄寂的黑夜或昼晦的白天，也如像在以往那些艰难地战斗着的日日夜夜里一样：我倚在囚室寒冷的墙上深深地吐出一口气而叹息地对自己说——仅仅是对自己说——道：“我多么累啊”……假如上帝容许，那末这封万言书所剩下的篇页可能已经不是太多了。虽然林昭作为一名自由战士，我的笔——我的剑是永远也不会闲得下来的！……

人那愤激的情绪是愈益趋向白热。《疯话》中之最刺眼的两节即“**这个肮脏衙门**散发臭鱼、烂虾、死狗、瘟猪……毒疮的气息……”

我说应该学会涵养克服急躁等等的时候我就自行深思过，而得出的结论是：这在林昭身上也许是很难避免的，首先就还因为林昭是个书生且是一个年青的书生，却压根儿不是政客更其不是老练的政客。政客可以冷冷静静毫不动心地坐下来谈生意经，一面察看市面而等候成交。然而这个书生，这个年青的书生就不成了，根本坐不住。……真的，每当我沉痛莫名悲愤满怀地想到：这些自称为镇压机关或镇压工具的东西正在怎样的作恶，而人们特别是我的同时代人，中国的青春代正在这条该叫专政的大毒蛇般的锁练之下怎样地受难。想到这种荒谬情况的延续是如何斲丧着民族的正气而增长着人类的不安，更如何玷辱了祖国的名字而加剧了时代的动荡……啊呀，在那些时候这个年青人真是，如像《思想日记》书后之某一首诗里所说的：“**腔血如喷何惜洒，化场风雨洗神州！**”我还能不躁急吗？

那么我对着人们也说（写）过了：若有半分素常标榜的所谓“人（狗！）**道主义**”也者的气味，则看着绝食者处在女性的生活特殊状况之中，莫说借，那葡萄糖给还当要给呢！

从这片血里我一下**看清了最最狰狞可怖的罗刹鬼脸之上的每一根毛发！看清了迄今为止总是被小心掩盖起来乃至竭力美化着的极权政治那黝黑黝黑的骨髓！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之最为“深刻”的核心，却也是其最为真实的本质！**天哪！林昭，林昭，你多么幸运哪！不是谁都有机会如此清晰得毫不含糊地看穿了——认识到魔鬼的骨髓之颜色的！只可惜你付出的代价太重大、太悲惨了。天哪！天哪！我的脚下是大地吗？！**我的头上是苍天吗？！**血泪浸润的大地上还有没有一棵青色的小草？！**黑氛弥漫的天空里还有没有一线公义的阳光？！**

假如我是山，我就要立刻倒下来把万恶的凶手埋葬——把他们的骨头都砸成

粉浆！假如我是海，我就要立刻咆哮着发出控诉的巨响而掀起拍天的波浪！假如我是火，我就要轰然如爆炸般地延烧开来，使他们淹没在烈焰的汪洋！假如我是铁，我就要把自己化为一柄人世间最最森冷、最最锋利的刀剑而向那杀不可恕的恶徒送去他分所应得的当作惩罚的死亡！但我只是一个披着镣铐且在绝食之中的负病而衰弱的囚人，那么我所能做的也只是用我的眼睛、用我的眼光逼视着那个站在我面前传来这句话的家伙，也许我这些心情已经全部从我的眼睛里流露出来了吧？也许我的眼光比山更峭峻，比海更深沉，比火更炽烈而比铁更森冷吧！我看不见自己的眼睛，但无论如何它们是不会好看的。由于那一句话的刺激使它们张得非常大，文言地形容起来可能是：目睛怒睁而目眦欲裂！那一句话，那短短的六个字使我一览无余地看穿了魔宫的密幕更洞察了魔君的心腑！大约我彼时的眼光是挺炯厉可怖……

天哪！这竟是“很自然的！”……皓皓高邈地覆我的苍天！冥冥沉漠地载我的后土！英华焕烈的照我的日月！明智宏德的胤我的始祖！天哪天哪！上帝的真理，世间的公义，众民的道德，人类的良知啊！

为了跟姓“共”的先生们呕气我倒是喊过蒋介石万岁，并也曾喊过肯尼迪和铁托的万岁！政治问题当时之所以万难谈得下去，其最根本的原因，只在于你们的独夫熄不掉个人意气又收不起非礼邪心而一味要作狗熊式的不甘被动，致使惊弓之鸟伤曲木的年青人弄得据有了一种和先生们差不太多的疑虑重重而百不敢信的精神状态。此外别无其它。

独夫毛泽东之该死的刚愎自用轻躁任性——无原则无理性固然也可以当为一种性格特征来解释，但他之所以能够如此肆无忌惮地一意孤行甚至竟然弄到如此无法无天地胡作非为的程度，应该确认为是先生们之贵党特别是贵中央什么玩儿长期以来对这个暴君一味迁就、姑容、放纵的结果！长期以来，当然是为了更有利于维持你们的极权统治与愚民政策，但也是出于严重封建唯心思想与盲目偶像崇拜双重影响下之深刻的奴性。你们把独夫当作披着洋袍的“真命天子”，竭尽一切努力在党内外将他加以神化，运用了一切美好辞藻的总汇与正确概念的集合把他装扮为仿佛是独一无二的偶像，把一切比较实在的或暧昧可疑的所谓功劳、成绩、好事等统统只归到他的名下以提倡、鼓励、扶植人们对于他的个人迷信与偶像崇拜！对于那些失败而丢脸的乌搞诸如从捉打麻雀到“人民公社好！”等等一切则尽量设法掩盖，涂抹、缩小直至无影无形地改头换面化整为零以遮饰他的错误！——对的也是对的，错的也是对的！“六亿神州尽舜尧”，日月都是有了毛泽东才明的！草木都是有了毛泽东才生的！中国无男无女无老无少都是有了毛泽东才做人的！毛泽东永远是“正确、伟大、英明”的！只要有了毛泽东就是无往不利一见大吉的！等等。真正说也牙碜而岂有此理到了极点！正是你们这样一些可耻的努力加上一班以耳代目的愚陋俗子的揄扬和盲从权力的逐臭之夫的吹嘘，使得这种典型中世纪式的荒谬可笑的偶像崇拜的狂热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几已达到了令人作三日呕的地步！而这种人为的偶像崇拜之风就更大纵容了独夫性格中那不足为训的刚愎轻躁的一面，使他变得空前地自大狂而习惯于一意孤行。处在他的地位上他已经再也不必考虑周详慎重地如实地去认识客观世界以及万事万物的内在规律了！因为他已经再不需要对自己的一切行为以及后果担负责任了！反正一切功绩都只能写在他的名下，而一切失败自有你们去给他抹掉以至诱过于他人！这么地他就在二十世纪时代条件与中国大陆社会条件所能容他达到的限度以内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暴君！而其大成问题的的精神状态足使他不仅不能如实地去认识复杂的客观世界乃至不能严肃地去认识一个幼稚的“黄毛丫

头”！一切事情之所以弄出如是之不堪收拾的局面来者由此！他会如此无法无天地胡作非为**绝非出自偶然**！那么对于他之行为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包括柯氏等人的冤案，当然不止于此——独夫本人固然应负主要责任，但你们这些每天每日、每时每刻都在那里无原则地吹捧他，宣扬他，渲染他，粉饰他，神化他，**把他的名字高唱入云而靠着收拾他下巴涎来过日子的先生呢？**！你们贵党首先是你们那贵中央什么玩儿怎么能躲得过在相当程度上分担其种种行为的后果、责任一直到耻辱呢？！难道不正是你们竭尽全力将他神化以便更好地在他的名字之下推行愚民政策的吗？！难道不是由于你们的曲意放任才使独夫习惯于不对自己行为负责，甚至不去考虑行为之后果的吗？！而独夫之所以从大计决策直到对于“黄毛丫头”几无一事不表现得那么僵硬、愚蠢、狂妄、荒谬、刚愎自用而顽固不化，**难道不又正是你们贵党特别是贵中央正气不张盲从纵恶的结果吗？**当然，光是这样地来认识也还是不够的，因为贵党在一家毛风之下正气不张习于盲从，除了已经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的奴性的习惯势力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受着党内太上皇——秘密特务之无微不至无孔不入的恐怖监视之故。**这才是你们那个独夫民贼统治全党的物质基础**，或者说组织基础！也因此我才不止一次评论他除了会办军队就是会办特务。认识这一点对于深刻认识今日中国大陆的政治现实之本质具有颇为重要的意义！受着如此一个彻头彻尾特务化于一层伪善外衣之下的所谓政党的统治，我们还能向何处去寻找一点民主气息呢？！谁都不能供给人们以自己没有的东西，而先生们的贵党之内除了集中、集中、集中，而且是恐怖的集中！根本就早已没有了任何民主可言！

一九五八年之“人民公社好！”以及在所谓“大跃进”之旗号下的诸般乌搞：——与赫鲁晓夫进行的肮脏交易，炮击金、马那以失败终的军事冒险，社会生活在粗暴干预下的严重紊乱失调，经济的衰退与民生的凋敝，特别是农业的破坏，农村的行政劫掠与农民的彻底贫困化，等等。那都是显而易见是在独夫出自赌鬼本性的荒谬乖舛的冒险决策之下所召致！那末他又是首先应该对那些称得上“左”倾冒险主义的做法以及由此造成之百业混乱祸国殃民，哀鸿遍野饿殍满壑的悲惨局面担负责任的了。再到一九五九年贵中央的庐山会议，对于当代“海瑞”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以及那以后在所谓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之幌子下于贵党内部全面进行了清扫运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相当有效地肃清了贵党党内微幸尚能留存到那个时候的比较正直良善比较开明通达比较能以民瘼为念的一部分人士，并使贵党高度统一于毛风——**高度统一于黑暗、残忍、阴险、恶劣、卑污、苟且地拜倒于权力更加不择手段地追逐权力的邪气之下**，多少也曾有过几页英勇斗争历史的中国共产党就这样地几乎完全丧失了正义性更丧失了生命力而在你们的伪善暴君、独夫毛泽东及其秘密特务的绝对统治下堕落成为一个只知慑服权力（“组织”），只知争取权力，**只知把持权力的极其庸俗、险恶、专制、败坏、官风僚气、腐朽至于糜烂的赤裸裸的特务集团**！而伪善的教条外壳（并且是硬壳）又使之更加公式地僵化并且虚伪得可憎，以致大大增加了这种情况的致命的严重程度！那末他还是首先应该对贵党一贯以来至于今日那种种旨在排除异己的倾轧斗争，及由此产生的致命后果包括在党内外所造成的深远的恶劣影响歪风邪气担负责任的了！在这样子“三面红旗”之下，作为一个反抗者对于独夫的观感是不难想见的了。那么既已算是一个多少带上了些政治性的理性动物，一切问题包括个人感情自都不可能不受到其政治感情的决定，这也是十分自然更且可以理解的罢！可一扯上政治，就自然会联到所谓利益的呢，那末对不起又没好话：在运用谭惕吾的性别去解放内蒙等等的先生们看来这也

许是十分符合“利益”的。但像林昭这样一个自许以“涅而不缁”的反抗者、我的任何利益包括政治利益都不需要以至全然排斥通过如此的途径去取得。若再试从人性论的角度探索，那么直到被捕以后许久那怕就在第一看守所里，只要是在还不曾把自己所受的种种遭遇与独夫的可耻邪心联系起来之前，林昭对于独夫其人的观感还只限于比较地职业性的。

然而，假如终于有那么一些先生感到不理解的话（可能有的，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林昭对于人们的不理解本身倒也感到一种不理解。想来想去，除了慨叹彼此在精神状态上的差距太大，真又找不到其它解释。先生们只因为长期以来把独夫捧成了个不知什么东西，所以大约也忘记了、或看不清、或不敢正视他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不必等到盖棺论定，只要能够实事求是地作些客观而公正的、恰如其分的评价，完全可以对独夫有个重新认识。贵党执政以来不必说，大约到抗美援朝以后，独夫于内外诸般重大问题上的决策已可谓举措乖张进退失当得一无是处！那末即从削弱贵党的实际政治影响来说，站在先生们的贵楼梯上于独夫的功过本来够了一目了然。先生们叫是一直跳不出那个现成圈子，故不管独夫倒行逆施到如何程度，先生们所能作的最好的事情——**唯一的事情也就只是为他收破烂，为他补窟窿，为他垫本钱**，等等。没出息不成器之处厥在于此！若谓反抗者这话是因风点火当面煽动！——林昭向来倒是有了话都不怕说，只是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怕听。怕听，也得说。我从不因人们怕听而不说，犹如不因人们爱听而多说，我只管那话当说不当说。事实就是这样！即使站在先生们的贵楼梯踏步上论着所谓历史功绩，毛泽东思想也没什么了不起！中国自古以来为王为寇者无不深晓这一条封建中世纪的政治规律：**天下靠打而民无二主**！如此而已。独夫差胜前人之处不过他是适逢其会而去把这一条中世纪政治规律披加上了那该死而又该死的所谓马列主义的外衣！但假如没有那许多爱国心热正义感强拯民愿切的热血**青年慨然献身以为先导**（这些人里面就有着林昭母系的长亲），又假如没有那许多嫉恨邪恶热爱土地单纯质朴的**善良农民糜首尽命以作牺牲**，先生们的一代江山岂能单凭独夫纸上谈兵唾手而得？先生们成天价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高调唱个不停，自己党内封建专制恐怖独裁到如是地步却只一味惜生怕死贪恋着不义的权位以图分取独夫乘兴儿**赏与的半杯残羹瓢数冷饭，狗苟蝇附同声“万岁”之余**，曾未闻几人敢步“海瑞”之后尘而直要到今日之下让这个青年反抗者激于义愤不顾死活地来直揭而痛陈你们之独夫的可耻罪恶！挨青年人现成出口骂上一句死完了先生们能有什么价还？先生们总算也起事辛勤创业不易，幸而留得此身至今不死，难道就只是为了坐视独夫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地一意孤行胡作非为从而把你们群体所取得的某些成就彻底败坏吗？！难道你们除了把一切比较实在或比较可疑的功劳成绩统统归到独夫名下以便更加有效地鼓励他的刚愎自用任性胡行以外，已经再也做不出其它有些意义有些价值的事情了吗？难道作为一个政治整体先生们数十年“革命”“斗争”的唯一成果，就只不过是用力把独夫装扮成一个神化的伪善的偶像而使他得以成为古往今来独一无二的可耻暴君吗？试问且置你们那**千百万牺牲者大义凛然丹心煜烈**的无价鲜血于何地？！又置你们百十万先行者**披荆斩棘开疆辟土**的汗马辛勤于何地？更置过去年代里为数甚多的中国社会公众——一切同情者、同路人们**不避艰险不问成败**的正直支持热情帮助于何地？先生们，先生们哪！你们若还有**三分未泯的初心未灭**的人性，你们当汗流浹背地痛**感愧对先烈的热血，愧负国人的期望，以至愧欠自己的初志**！只要这样一种局面一天继续下去，柯氏之冤遭不白姑且就算他年命不到犯着晦气，年青人倒敢断言你们的贵党唯一的前途只可能是一败涂地至于再也收拾不起！**毫不夸张地说：先**

生们，你们要毁灭了，——要毁灭了！暴君独夫以及其秘密特务的恐怖统治几乎已经断丧了你们党内的任何一点活力更室杀了你们党内的任何一线生机！作为一个政治整体你们已经丧失生命力而临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上了！先生们，可敬的先生们，假如再也无以自拔，那么你们是决定地要毁灭了！

所说这些似乎颇有干涉内政之嫌，不过年青人也真正叫是没有了其它办法！先生们，你们，你们的那个中央什么玩儿直到你们贵党全体——管是一千七百万还是二千一百万呢！——你们愿意承受以至愿意忍受独夫毛泽东的暴君统治并分担他的一切过失错误罪恶以及耻辱，那也许是你们自己的事情——算是你们的内政罢，但你们好歹总算是在执政或更正确地说是在一党专政呀！你们的党内问题党风党气在这样一片基础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上特别又在倚着所谓的枪杆子也者关门为王的情况下，是必然会对当代中国政治现实以至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产生着极其重大的影响的呀！那么这就不仅仅是个贵党的内政问题了！无论如何，先生们没有权利迫使广大的中国同胞特别没有权利强使如林昭这样的反抗者都来像你们一样忍受这个暴君的统治而分担他之一切恶劣行为的耻辱，作为堂堂神明华胄的黄帝子孙的我辈完全拒绝承担如此一份放弃人权没身为奴的亵渎文明始祖、辱没清白父母的荒谬的“义务”！非但绝不承担而已，还要坚决反抗、彻底揭露以作大义所在一往无前的斗争！也只是这一点构成为林昭毅然写作这一封信——这份冤状的内在逻辑与根本原因。假如先生们责年青人以写这封信客观上符合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或其它等等之什么主义的利益，那么也叫适逢其会正好挨别人派上了用场。至少林昭主观上全不是为了要符合无论谁的利益才来写这封信的！先生们，作为一个有理性、有良知、有血气、有肝胆的“人”咱们除了孜孜为“利”以外，到底心里也还应该要怀有一个“义”字的！是所以这满怀冤痛已至忍无可忍的青年反抗者不能不毅然振笔，慨然陈辞，奋然上书而请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先生们代为你们贵党那个荒凉寂寞死气沉沉的什么“中央……”招魂！——作为一个政治整体的核心部分，想来它总不至于像柯氏那样没下梢地已经给独夫祸害成了一把灰罢！

先生们，正义的自由战士决不容许自己忍受像这样一个齷齪可耻得无比下流的非法不义的所谓“判决”之侮辱！正是这个齷齪判决使我们获得了更充分，更有力的进行上诉之权利！

所说这两点构成作为一个反抗者的林昭今日考虑一切问题处理一切事情的基本立场，而其全部根据只是一条天人共许的铁则，被残踏的公义必需得到伸张！这也就是我常爱提说的生活之价值规律的根本内容之一部。

从某种意义上说来这个青年反抗者腆颜苟活以迄于今的原由也仅在于此……在经过了这么些事情以后我的心已经变得惊人的苍老，而我对于生活的感情更变得惊人的冷漠！你们那荒谬绝伦而血腥惨厉的恐怖专政特务统治完全毒化了原该是那么明朗美好的生活。从而也致命地重创了以至戕杀了林昭对于生活的真挚的感情。即使多多少少被那些未了的事务未尽的义务拽着，个人的精神状态还只能是一如往常——一仍其旧的既不爱生更不惜死，即如我自己所形容的双足分跨在生死门槛的两侧，反右以来我一直就只是这么地对待着生活！但也正是这种基本态度使作为一名战士的我能在严酷的考验中多少占据到主动！

本着如此的精神状态我能容许自己向先生们要求什么？而我那两件只要一息尚存非得进行不可的心事又能够指望先生们些什么？这也许比之与虎谋皮还更要充满着万难哩！但既然这已经成了我的生活目的，那末只要一天活着，我必定要向我的目的进军！那怕走出一步也好，那怕跨出一足也好，那怕把足跟向前

移动一寸也好！个人的力量诚然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公义——那庄严神圣巍峨浩大、永存不灭而更不可摧毁的必胜的公义呢！

公义就是我的上帝，公义也是我的力量，只要我始终谨守、坚守而且恪守着义理而行，我就拥有无穷尽的力量，在基本立场上我于先生们既无所求更无所望！

顺便说一句：对于中央党报编辑部里之先生们的“本能”，这年青人虽然还不敢佩服，却也每会赞叹。先生们的鼻子颇足以和老鼠媲美，嗅着那怕是一点点味道不甚中意的东西就要去啣掉的！

附 2：秋声辞并序——林昭

秋声辞并序

在狱三秋，侘傺长恨；秋心秋绪，郁作秋声。即用鉴湖女侠断句为韵，并作轱辘体以敷陈其意。有愿补石，不避续貂，回环往复，声气尚应。后生其再来人欤？抑前贤馥烈之荫也！哀时明志，未辨今昔，成仁取义，誓继踵武。

一九六三年十月林昭自志

秋风秋雨愁煞人，凭对遥天吊荆榛。狐鼠纵横山岳老，脂膏滴沥稻粱贫。
为悲寂寞求同气，敢避艰难惜一身。夜夜肠回寒蛩泣，丹心未忍逐青磷！
劫里芳华不成春，秋风秋雨愁煞人！青衫泪浥朱颜悴，碧血花催白发新。
决死精卫战浩荡，伤心子规哭沉沦。齐家报国犹虚说，愧负望殷父老亲。
哀江南赋墨溶尘，抱恨楚囚志未伸。霾露霾霜瘦生菊，秋风秋雨愁煞人！
宁随兆庶盟朝日，岂戴独夫蹶佞臣。唱彻招魂金铁寂，肝肠百沸湿罗巾！
忧乐苍生夙愿真，壮怀激烈照天陈。吞毡谁复思侯汉，蹈海我终不帝秦！
赤水赤原病体国，秋风秋雨愁煞人！此身定化干城剑，贯日横空泣鬼神。
浩歌慷慨夺江津，最是知音第五伦。翰墨请缨彰素志，榛苓补石证前因。
凌霜劲节千钧义，挥刃英谋一念仁。莫笑猖狂乔作态，秋风秋雨愁煞人。

附 3、狱中短诗几首——林昭

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大约 1962 年）

向你们，我的检察官阁下，
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
这是最礼貌的抗议，无声无息，温和而文雅。
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

无题（时间不详）

啊，大地
祖国的大地，你的苦难，可有尽期？
在无声的夜里，我听见你沉重的叹息。
你为什么这样衰弱，为什么这样缺乏生机？
为什么你血泪成河？为什么你常遭乱离？
难道说一个真实美好的黎明

竟永远不能在你的上面升起？

家祭（1964）

四月十二日一沉埋在灰尘中的日期，
三十七年前的血谁复记忆？
死者已矣，后人的家祭，但此一腔血泪。
舅舅啊一甥女在红色的牢狱中哭您！
我知道您一在国际歌的旋律里，
教我的是妈，教妈的是您！
假如您知道，您为之牺牲的亿万同胞
而今却只是不自由的罪人和饥饿的奴隶！

无题（时间不详）

将这一滴注入祖国的血液里，
将这一滴向挚爱的自由献祭。
揩吧！擦吧！洗吧！
这是血呢！
殉难者的血迹，谁能抹得去？

血诗题衣（节选，写作时间不详）

双龙鏖战玄间黄，怨恨兆元付大江。
滔海鲁连今仍昔，横槊阿瞒慨当慷。
只应社稷公黎庶，那许山河私帝王。
汗惭神州赤子血，枉言正道是沧桑。

自由颂四首（题目为后人流传所加）

生命我所重，爱情弥足珍；但为自由故，敢惜而牺牲。
生命似嘉树，爱情若丽花；自由昭临处，欣欣迎日华。
生命巍然在，爱情永无休；愿殉自由死，终不甘为囚。
生命蕴华彩，爱情熠奇光；献作自由祭，地久并天长。

无题（生前最后一首诗，赠张元勋，大约 1967 年）

提篮井台共笑之 天涯幽阻最忧思
旧游飘零音情断 感君凛然忘生死
犹记海淀冬夜别 吞声九载逝如斯
朝日不终风和雨 轮回再觅剪烛时

（赵思运按：林昭的诗歌多为狱中血书，在流传过程中，多有错讹。本辑林昭短诗均据赵锐《祭坛上的圣女——林昭》整理，谨致谢！）

附 4：自诔——林昭

自诔——林昭

（一九六四年二月血书）

眼枯见骨，心死成灰，抱病郁痛，天乎冤哉！
家国多难，予生也哀，素丝欺墨，歧途方回！
失足自怜，回头百年，初心似水，指证苍天！
永昼频迫，夙夜忧煎，意存碧落，恨穷黄泉！
作贼奈何，百身莫赎，坐令兆众，遭此楚毒！
风尘寂寞，天涯沦落，黍离歌残，铜驼没绿！
故剑茫茫，故园就荒，举世无道，我适何邦？
穷途猖狂，载哭兴亡，九畹芜秽，五内摧伤！
百虑重忧，谓我何求，恻念来日，血泪交流！
已歌燕市，无惭楚囚，子期不见，江波悠游！
愁不能辍，愤不忍说，节不允改，志不可夺。
书愤沥血，明志绝粒，此身似絮，此心似铁。
自由无价，年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
山川桴鼓，河岳鸣笳，魂化雷电，肠断桑麻。
风雨长宵，平旦匪遥，捐生取义，岂俟来朝。
志节皓皓，行状皎皎，正气凛冽，清名孔昭。

十四、逃港大反抗

中共沦陷大陆，有背景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华民国高官、国民党高官，他们有机会逃到台湾，而普通民众，就只能落入中共的虎口，勇敢一点的就逃往香港，这是第一波的大陆难民潮。从此，断断续续地从大陆逃来了一波又一波的难民。

中国人坚忍不拔，为投奔自由平等，虽经磨难，永不言弃！香港这个弹丸之地，几十年间竟然成为东方最大的难民收容地，一直以来收留着从大陆、越南甚至东南亚因共产主义的灾难而汇集来的难民，香港的政府、香港的平民以极大的善心，对待难民，使他们在这个陌生的地方能安身立命。

中共国大饥荒时期，又一波巨大的难民潮涌向香港，文革时期，再一波巨大的难民潮涌入香港。

我曾看过一篇回意文章，广州一位黑五类子弟关阿威，为了逃到香港，四次游泳都差点死掉。阿威的爷爷和他的兄弟们在广州和香港经营着“越华”印刷厂，也就是广州大型国企“东方红印刷厂”的前身。结果共产党一来，财产被夺，狗崽子的他作为知青下放海南岛，根本看不到任何前途。他从广州四次偷渡香港，每一次都九死一生，第四次才成功。把他的故事拍成电视《奔向自由》，该拿奥斯卡奖。他也是幸运者，多数逃港者被中共的军队射杀在深圳河边，还有丧生鲨鱼之口，香港周边的水域，吞噬了多少他这样的好青年！在多少狗崽子惨死的年代里，他算是幸运的狗崽子。中共恶政无比恶毒！



（香港人往大陆难民车上投饼干面包）

香港人民对于这些偷渡而来者热情帮助，香港人民的善心感天动地！

中共夺取政权前后，一大波大陆难民潮涌入香港，香港人真情地接纳他们，使得他们能在香港安身立命。从此，香港人不断接收大陆难民，打右派时又是一波大难民潮。大饥荒时，更一大波大陆难民潮涌入香港，香港人照样真情地接纳他们，没有嫌弃他们来抢走工作、搞脏香港。

由於逃港人數太多，1962年5月14日，香港政府決定放棄「安置難民」，開始「即捕即遣」湧入之難民。約三萬逃港者集結在香港上水華山，疲憊飢餓，在山中喘息，等候從市區聞訊趕來之親人接下山。

華山救親：5月15日，金庸旗下《明報》發表了首篇社評：「最寶貴的是人的生命！最大的仁政，是救人的生命！」明報報館一度成為救援物資中心。5月16日，胡仙旗下《星島日報》刊登了《百名難民寄語香港親友》一文。宗教團體、鄉親組織、新聞媒體發起了「援助有困難的人民」行動，前後共有十幾萬人次，送衣、送食、送水到華山。市民用各種方法保護華山上之親友，包括接走、匿藏家中或市區。

在「不行動者作抗命論」下，警察將一批批越境者強行拖上卡車，送到石湖墟收容營地。當時香港政府決定，偷渡者在送入收容營後，免費給予兩餐豐盛之自助餐，等第二日派車由羅湖橋送返大陸。當夜有市民守在營外，據報載：「滯留（在營外）的市民不下三四千眾。」「他們當晚就在露天臥睡。」市內不少歌舞廳等娛樂場所都熄燈閉門，以示同情。

翌日，**上萬市民手持餅乾、麵包、糧袋，當卡車長龍駛出營門，公路兩旁糧袋齊飛、淚雨傾盆。**突然，成百人衝出馬路，躺在地上，以身阻截車隊，許多难民紛紛跳車逃跑。



（華山救親——中國大陸飢民逃難圖第一輯 30.jpg）

華山救親：（一名不願遣返中國而從卡車上跳下的逃港者，攝於 1962 年。）

據事後估計，前後共有約過半華山越境者（难民），**在市民幫助及警察「抓捕不力」下**，最後得以進入市區。

香港人为帮助逃港的大陆兄弟，不惜与香港政府斗争。香港人后来也帮助越南的难民兄弟——船民，香港曾经是东南亚最大的难民接收地，难民的人数超过香港原住民的二倍，香港人义薄云天。香港人民的善举，记录在人类历史长河之中，**满天神佛皆为之感动！**

中国人基本是善良的，只有在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的谬论指导下，大陆人才变得暴力，就如台湾人在日本文化的教育下，才会残暴。

香港人才是继承中华文化的真正中国人，许多大陆人是被共党文化所毒害的非正常中国人，台湾皇民化狼孩也是被日本文化毒害的变异中国人，是香蕉人，皮是黄色的，里面是黑色的，是黑香蕉人。



（中共打击逃港与鼓励逃港的人）

“东德百姓为什么逃向西德？朝鲜百姓为什么逃向韩国？中国大陆百姓为什么逃奔香港？古巴百姓为什么逃奔自由世界？为什么不是反过来？为什么民主国家的百姓不逃奔社会主义呢？”现在朝鲜如果放开边境，百姓也会一逃而光，连金正恩的左右手都会逃走。社会主义国家都是靠圈住百姓才能存活。所以，香港人叫大陆人为“大圈仔”。为什么？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靠圈着百姓才能活命，这是多么无耻的政权！

中共不是中国，中共不是中国人、不是大陆人，而是大陆人的死敌，也是人类的死敌。共产党是人类的灾星，也是人类的克星，只有消灭共产党，台湾才安全，人类才安全。凡是把中共与中国人捆绑在一起的，都可能是中共的同路人。反中保台与抗中保台都是悖论、是谎言，台湾人本是中国人，怎么能反自己和抗自己呢？反共才能保台，灭共才能救国。

工商业改造时期，上海多少资本家跳楼，陈毅还誉为“空降兵”，他每天问今天有多少空降兵？资本家还不能投江，否则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会被说成是逃往香港，亲人会受到更大的惩罚。看看文革，多少知识分子投水、上吊，为抗拒红朝暴政，他们演绎了人类历史中最壮丽最悲惨的一页，历史永远不会忘记这些比奴隶更悲惨的人们。对于敢于收听外国电台，抓到就是收听敌台罪。敢于逃往外国，就以叛国罪处罚。当时大陆有大批人逃往香港，香港人民无私地接纳他们，并躺在香港政府的难民遣返车前面，让难民趁机跳车逃跑。

香港有三分之二的人或者祖辈被共产党迫害过、是逃港的难民。共产党却要修改香港的教科书，告诉香港人民，中共是如何伟光正的、是如何三个代表的。做人不能无耻到共产党这个地步。

为什么中共夺政时那么多的大陆人投奔香港？大饥荒与文化大革命时又有那么多的人投奔香港？中共的手段太恶劣甚至是太恐怖了，人民不喜欢它。如果台湾足够大又不是在海中，那么更多人将会投奔台湾。中国不是中共，中国人不是中共党徒，是中共的迫害对象，逃港就是对中共的大反抗。

十五、八九民运是世界共产主义坍塌的开始

中国感冒，世界打喷嚏，人类同命运共患难。马列主义是邪教，如果在中国很昌盛，肯定也会传染世界。

当中共国的文化大革命闹得正凶之时，世界上也是红色浪潮汹涌澎湃。在上个世纪，中共国的文化大革命传染了世界，成功地向欧美日亚非拉输出了马列主义的革命文化，掀起了许多轰轰烈烈的红色风暴。

1968年，中共国的文化大革命正酣之时，巴黎暴发了红五月，当时，大字报贴的巴黎街头到处都是，大家举行各种各样的集会，全国大学生一起串联到巴黎搞声援，胡志明、切格瓦拉、托洛茨基、列宁、鲁迅、毛泽东已经成为众人偶像。一时间，巴黎变成了红色的海洋。（只有斯大林死对头托洛斯基的头像，没有斯大林的头像，这并不奇怪，因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早已传遍世界，斯大林在人们的心目中早就是罪犯，而全面揭露列宁的罪行还得等到普京上台多年，也就是四十一年后）。

对于学生运动，法国总统戴高乐一开始嗤之以鼻。但是一个月后，他就仓皇逃到德国。可见当时巴黎学生有多猖狂。



（1968年巴黎工人集会——巴黎红五月）

1974年，法国上映了一部喜剧讽刺电影《解放军占领巴黎》。红色成了整部电影最大的象征。这部电影里，若不是有金发碧眼的外国人，还真以为拍摄的是中国。

中共发动文化大革命，红色浪潮冲击中国，香港、日本、法国及欧洲、拉丁美洲、东南亚，等等地方，红色浪潮席卷全世界。

在世界红色浪潮的冲击下，美国也不能幸免。美国人成立了黑豹党，想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法则猎取政权。他们购买枪支武装自己，到处袭击白人警察，绑架白人法官，冲击美国监狱，有的甚至模仿爱尔兰共和军，和美国军警玩起了「城市游击战」。

除了欧美，日本在上个世纪也受到中国革命文化的感染。最令人惊讶的是，日本大学生还学会了共军的战术战法，并且将其用于「实践」中与警察斗争。日本的红色浪潮最为疯狂与持久，最后无可避免地产生了让世人闻之丧胆的“赤军”。没有美国人的强力压迫，日本可能变成红色江山。当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和好，不少日本青年因无法理解“毛泽东与美帝国主义的头子握手”的事实而自杀。这是最真挚的无产阶级感情。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的学生运动——暴力性极强）

同样，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触动下，秘鲁也产生了令人恐惧的恐怖组织毛泽东派共产党——光辉道路。不得不说，共产党是个取名党，总能取一个非常正能量的名字。1970年，“光辉道路”从秘鲁共产党中分离出来，“光辉道路”也是秘鲁共产党“红旗”的支派。1980年，秘鲁军政府开始举行选举，在这12年间，“光辉道路”拒绝参选，经常以暴力的游击方式袭击投票站。根据秘鲁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调查，该国20年内战死亡的6万余人中，有54%的人是被光辉道路杀害的。让你参选你都不干，偏偏要用暴力方式推翻政府，可见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多么无耻。至今，光辉道路依然存在，2023年2月11日，秘鲁库斯科大区拉孔本西翁省纳蒂维达镇发生袭击事件，造成7名警察身亡。足见毛泽东的流毒至深。

香港也暴发了红色浪潮，却被中共中央直接压了下来。中共把香港的地下党及红派头头们接到北京，周恩来亲自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香港资本家和英国殖民主义的剥削与统治。有的红派头头由此对中共怀疑，加上后来中共的六四大屠杀，让他们彻底看清了中共的面目，不少红派头头变成最坚定、最持久的反共人士，至今仍活跃在香港各界，使得香港成为反共基地。这是当年毛泽东与周恩来想不到的，甚至是连邓小平都想不到的。中共最害怕的是中共的叛徒，因为中共的叛徒最看清共产党的面目，对共产主义有免疫力，不再上共产党的当。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儿童拿着红宝书戴毛贼像）

中共的文化大革命，也引发了东南亚的红色浪潮。由于中共支持印尼共产党想暴动夺取政权，遭到军队的镇压，而印尼共产党中有许多华人，引起了印尼的排华浪潮，几十万华人倒在了中共输出革命的罪孽之下。

马列主义千说万说，就是“有钱就有罪”嘛！这么愚蠢的理论竟然有那么多的人相信，真的奇怪了！

我实在不明白，中共与毛泽东那么愚蠢，竟然向东南亚输出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在东南亚，最富有的就是聪明且勤劳的华人，他们本来就被当地人妒忌，一旦在那些地方搞起无产阶级的革命，那么斗争、抢、迫害与杀戮的对象必然是富有的华人。更加可悲的是，也有很多华人相信并追随中共搞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不是革自己的命吗？于是，革命成功的地方就屠杀华人，革命不成功的地方也屠杀华人。革命成功的越南马上排华，彻底废除中文，并驱赶 150 万华人入大海，入海前还得交纳 12 两黄金，**约有近 50%至 70%的华人难民葬身海底**。革命成功的柬埔寨红色高棉几乎把华人杀光。革命不成功的印尼大排华，也杀了几十万华人，我的老师就是当时归国的印尼华人；直到 1998 年印尼再次排华，又对华人大屠杀，当时当政的江泽民吭都不敢吭，没有作为，只有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与美军派军舰接人。毛泽东与中共输出无产阶级革命，直接把华人出卖。中共真是中国人的祸星。中共不灭，中国人的灾难不灭。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只要中共输出无产阶级革命，当地华人的人头就纷纷落地。这就是中国的五毛、小粉红、大粉红们至今沾沾自喜、津津有味的红色浪潮。有一个叫做张宏文的人无不骄傲地说：“中国文革一声炮响，全世界爆发了群众运动，美国黑人运

动放火烧了数十座城市，法国红卫兵大学生沿街构筑军事堡垒，意大利红卫兵大学生干脆把国家总理拉出去一枪给毙了”。把祸害当功绩，真够无耻的。

如今，红色浪潮再度兴起，世界各地的红色旅游热潮经久不衰；格瓦拉从魔鬼被人涂抹成圣人、从懦夫被篡改成英雄，其被处决之处成为红色旅游的地标；列宁托洛斯基的马列原教旨派还有市场；毛泽东的修正主义派更是大行其道；邓小平的挂羊头卖狗肉派也被人崇尚；世界还处于共产党魔鬼教的屠刀威胁之下，其根本原因是中共国的生存给予了邪恶以力量。

中共自诞生时起，就是世界共产主义集体的一员。中共上台以后，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大金主，为世界共产主义提供理论支持与资金支持，甚至技术支持。苏联垮台以后，中共变成世界共产主义的最大金主，为世界各地共产主义大输血，使得世界马列邪教的毒花不凋谢、邪毒不枯竭。

我就是想说，中国人如果搞不好，不只是自己的事，还是世界的事，中国人做不好，会危害世界的，反过来害了自己。

人类是一个整体，人类是正邪教量之地，而主战场在中国。当然，对于中国人来说，主战场最好不在中国，那样中国人可以轻松一些，可惜，这里是天选之地，我们就得承担最重要的责任，这是天命所归，无可奈何。美国是世界警察——世界秩序保持者，中国才是王者。

人类与共产主义战争的主战场在中华大地，中华大地上马列的覆灭，就是人类的最大胜利。中共是政教合一的邪教政权，又邪又恶，人类与共产主义之战，不只是民主与独裁之战，那只是表象，真正的战争是仁政与暴政之战，是正义与邪恶之战，最终的战争将在文化上决战，不在文化上打败马列主义，它就不会退出历史舞台。中华文化是马列文化的克星，儒佛道的善良文化是马列的谎言仇恨暴力文化的天敌，当中华文化在中华大地苏复之始，就是全世界共产主义灭亡之始。看看直到2020年，美国受到共产主义文化的极度污染，ANTIFA与黑命贵就是共产主义的特殊版本，在民主社会，竟然出现这种情况，实在令人担心，也足见西方文化存在不少缺点。一旦美国落入左派共产主义者之手，共产主义将可能沦陷全世界。破灭共产主义的希望在中国。

看看台湾与香港，在共产主义的侵蚀下屹立不倒，就知道，中华文化才是马列文化的真正克星，苏复中华文化是人类的核心使命。毛贼东也看到这一点，才发动文化大革命，他想消灭中华文化。共产主义是左白甜懒们的白日梦，不是中华文化的结晶。

蒋公中正看到了，我们善良的民族不喜欢残暴，我们这个无阶级不仇恨的民族，不可能使得残暴的阶级革命自然产生并获得成功。但是，他却无法阻止日本侵略与苏俄对中共的倾囊相助。可以说，日本苏俄因素，是中共得以夺权的最根本原因。论原罪，苏联与日本原罪更大。

没有日本和苏联的因素，中国人能独自打败中共，并打败马列主义。

苏联人无耻地违背了中苏两国条约。国共内战，不是国民政府与中共打，而是国民政府与中共加苏联打，苏联暗中巨大帮助中共，苏联把80万日本关东军的武器、日军在朝鲜的武器，和日本在东北的武器库里的武器（大大超过80万关东军武器），还把美国援助给苏联的几十亿美金的武器，都给了中共。三大战役都是斯大林在莫斯科拟定的、苏联军人开着坦克参加中国的内战，傅作义说过：共军坦克里，不是苏联人，就是日本人。苏联把20万日本关东军战俘编入了林彪部队、四野一般一个连编有一个日军步兵班，苏联人打造了林彪部队的强大实力。国民政府同时对付一明一暗的敌人，同时美国还断了对国民政府的援助和弹

药购买，当时东北出现奇特景观——国军拿起三八步枪对抗拿着美式武器、开着美式卡车的共军；苏联还大肆伪造中华民国的纸币给中共发动金融战——一些城市地下党的任务是分钱与花钱；国民政府孤立无援，中华民国的战败几乎不可避免。不要相信小米加步枪打败 800 万国军的谎言，是坦克大炮加苏联打败的。

说明外部的援助很重要，中共没有苏共外援连活动经费都没有，更没有后来的壮大并夺取天下。不要相信中共的“不干涉他国内政”的谎言，最干涉他国内政的是共产主义者。苏联共党不干涉中国内政，中共会被饿死，更没有能力推翻国民政府。中共到处输出革命，就是在干涉他国内政，印尼屠杀华人，就是中共干涉印尼内政导致的。共产党的国际主义就是干涉他国内政的理论。

共产主义者是抱团的，他们亲如兄弟，小弟理直气壮地向大哥要钱要援助，而大哥也疼爱有加、慷慨解囊、尽力相助。中共的活动经费一直由苏共无偿地按月超额拨发。

世界共产主义是一体的，世界民主社会也应该成为一体。

但是，看看民主国家如何呢？英国在中国抗日最艰难时刻，封锁滇缅公路，胜利后为了接收香港，与中国当时的非法政权——中共签订秘约，而后快速承认中共国并阻挠中华民国参加旧金山会议。抗战后期，国民政府为了向美国借贷 10 亿美金，几近乞求，又因汇率谈判耽误，致使中华民国的经济崩溃，使得中共有机会夺权。财大气粗的美国人就不能慷慨点？后来美国在国共内战中，断了援助，国民政府元气大伤，再也无法痊愈。

看看中共沦陷大陆的五大责任者，民主力量一体了吗？

英国人的自私、美国人的自闭、苏联人的无耻、日本人的狂妄，是中华大地沦陷的最重要原因。那些谩骂中华民国的人，你们掂量一下，如果当时是你们当政，能战胜中共和苏共邪教集团吗？

这不仅是大陆人与国民党的失败，同时也是人类正义事业的失败。不是大陆人与国民党太无能，是共党太邪恶，同时世人太无知且自利——只想收获不想付出，我们独力对抗了中共与苏联及世界共产主义者。不能由于大陆人和国民党对付共产主义的失败，而作壁上观丧失援助道义的人有资格指责。要说原罪，作壁上观者原罪不小，我们还反抗了邪恶，他们却无动于衷，就如旁观罪犯强奸妇女的人也是罪犯一样的道理。民主社会的不团结，相互笑话甚至拆台，使邪恶有机会各个击破，这样的事情继续下去，历史会重演。邪恶早已聚结，正义力量不能分散。

人类最需要的是正义，民主社会的不团结，是缺乏正义所致。

抗战时，多少华人回国参战、捐命沙场、暴尸荒野、尸骨付与蝼蚁分食、孤魂不得归家。在国外的华人也摇旗呐喊、慷慨解囊，新加坡的华人坚决抗拒日本侵略，他们也遭遇了日军大屠杀。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戴立的队伍。连佛门弟子、道家弟子都纷纷放下木鱼拿起戒刀，五台山藏传佛教僧人还直接组织了“僧人连”，投身到打击日寇的战斗中。他们为什么不静心修炼，而身惹红尘？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正义的种子。他们为什么不自扫门前雪、过自己的美好日子？

还是我们华人有正义感，如果是我们侵略别人，就没那么多人支持了！我们是有正义感的民族，不是“读空气”的日本人能比。现在的中共比日寇更邪恶，对人类危害更大，人类不应该团结对敌吗？民族不应该团结对敌吗？台湾人最少也是华人，学习当年的华人与僧人吧！

中共上台之时，大陆的共产主义泛滥程度绝对没有现在的美国泛滥。中共用“枪杆子出政权”夺走江山，却不断告诉人民是“得民心”得的天下，真无耻。

“枪杆子出政权”与“得民心”是对立的，既然“得民心”，还用得着“枪杆子出政权”吗？既然要用“枪杆子出政权”，根本就与“得民心”毫无关系。大陆是被共产主义的“枪杆子出政权”夺走的，不是当时多数中国人自己的选择，不是中国人用选票选上台的，而纳粹是德国人选上台的。中共统治几十年后的今天，都不敢让中国人自己用选票选择，怎么能说是大陆人民选择了中共呢？这一说法是中共对世界的欺骗！是中共绑架大陆人的借口，不要上当。一个不让人民说话的政权自称人民共和国，你也信？

如果中共敢放开互联网、放开言论、实施中共自己制定的《行政诉讼法》，不用三年，大陆人民就把共产党推翻，这才是大陆人民的真正选择。就像香港，人民走上街头反抗中共，这才是人民的选择，这才是正常人的选择。你也不能责怪九七年香港人不反对回归。

美国人有能力撕开中国的互联网，在浏览器中加入翻墙功能，并在操作系统中禁止不能翻墙的浏览器、禁止拦截访问外国网站的软件。他们却没有这样做，想作壁上观？

共产党在中国人的社会里，不会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获得政权，因为中国人的文化对马列主义的斗争理论排斥。而在白人的社会里，除了过去的苏联，我们现在看到，美国正在一步步走在共产党理论所指导的道路上。

看看中国人的台湾与香港，对共产党的坚决抵制，就知道，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共产党不可能在中国人的社会里获取政权。中国人的文化高明。

有的人埋怨大陆人民没有反抗中共，真的无知。从马列主义进入中国开始，就受到中国人的抵制与围殴，上面说到知识界对马列主义的围殴，普通民众也在围殴中共。大陆人民一直在反抗中共，只是中共太邪恶，不容易打败它。

魔鬼在人间布下四大恶卒：纳粹、共产主义、ISIS、八纮一字，他们是一伙的。消灭任何一个都得全人类的共同努力。

看到朝鲜人民现在在电视上说朝鲜人民如何幸福、如何爱戴金三，你是否也信了？灭金三时连朝鲜人民一起灭？或者责怪朝鲜人有原罪而不帮助他们？金家三代杀了那么多朝鲜人，不就是反抗的结果嘛。

大陆人不是没有反抗，没有外援的反抗、缺乏团体性的反抗，虽有冲击，很难灭了中共，反而会被中共一个个地灭掉。因为，共产主义是世界性毒瘤，是魔鬼在人世间的卒子，利害得很。

中国人是反共的。四.一二清党就是反共，五次围剿就是反共，四年内战（1945年—1949年）就是反共，文人们围殴马列主义就是反共。1949年前后，有100万大陆人逃到香港，大饥荒与文革时，又有100万大陆人逃到香港，这就是反共。后来还组成了海外第三势力「自由中国抵抗运动」，并空降游击队进入大陆多省，这就是反共。蒋介石一直坚持找时机反攻大陆，这就是反共。八九.六四就是反共。现在的上访潮，就是反共。甚至在中共的眼里，翻墙（以前叫做收听敌台）都是反共。

第一次国共内战时，中共要实行“**焦土战略**”，“焚烧城乡以分散国军的目标，焚烧湘粤大道（四百里长）两侧15公里内的民房”、片瓦不留。招致了当地农民的坚决反对，中共郴县县委在城隍庙召开烧房群众动员大会时，愤怒的群众当场杀了300多名干部、1000多名共产党追随者。朱德派一营兵力打回郴州，就把群众镇压住了（《曾志回忆录》）。散漫无组织且为生活奔波的群众，又缺少武器，这种反抗效果很差，根本不是中共这个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对手。

大陆人不是没有反抗。反抗不一定是旗帜鲜明式的正面冲突，悄然无声式的、

潜移默化式的看不见的反抗也是有效的反抗。中共当政的和平年代，在大陆杀戮超过 8000 千万人，超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总和，这就是反抗与可能反抗的结局。只要有反共的潜质，中共就坚决消灭，连不参与政治的教徒都被迫害，中共贼眼昭昭，谁能逃得过？

难能可贵的是，中共杀了那么多的大陆人，大陆人没有形成大面积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进行了那么久的洗脑教育效果也不如中共所想，中国人坐在一起就骂共党，包括高官也在骂共党。五毛是网络封锁与洗脑造成的，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一旦放开网络，骂中共最多的可能是明白真相后的五毛。现在他们骂美国，如果他们知道美国在历史上最少十四次救中国，还会骂吗？看看蒙古，被斯大林屠杀后，形成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几十年后的今天都没有完全痊愈。看看台湾，被日本人屠杀后，也形成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几十年后的今天都没有完全痊愈。看看这本近 20 万字的《日治台七大罪》，台湾竟然有媚日者，而且数量非常庞大，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症候群！

大陆人不是没有反抗。没有八九民运，就没有东欧巨变，就没有苏联解体，就没有共产主义在全人类的坍塌。这种逻辑关系总得承认吧。是中国人撕开了魔鬼在人间布下的天罗地网、截滞了马列病毒在世界的大作战，中国人的功劳非常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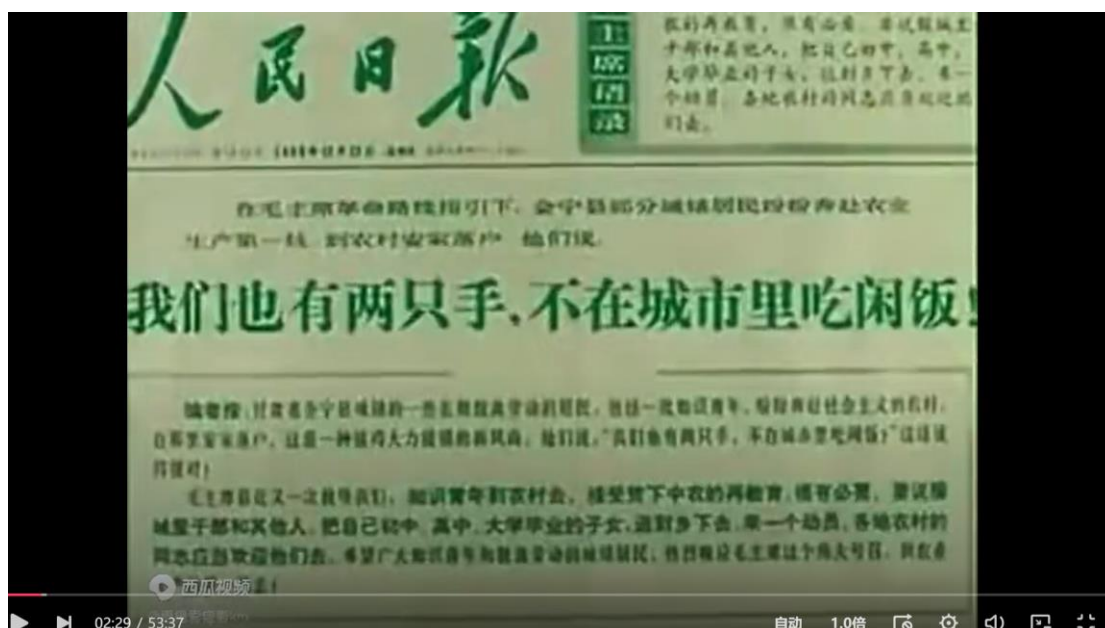
中共可以在全人类的注目下，在天安门开着坦克镇压、在香港街头镇压、在香港搞国安法。中华民族是个善良的民族，特别是汉族，很少这么暴力过，是中共之罪，是马列之罪，而非我们传统文化之罪，不是真正中国人之罪，而最大、最直接受害者是中国人。苏联共党不敢类似镇压、东欧共党不敢类似镇压，所以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只能说明中共远比苏联共党、比欧洲共党更加邪恶。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是幸运的，他们的幸运只是他们的共党没有中共邪恶。

中共甚至比朝鲜共党邪恶，朝鲜共党坚持马列，而中共篡改马列。朝鲜哪天发现马列的错误就会抛弃它，而中共早就发现马列的错误，却去篡改它、维护它，使它活命、使它继续作恶，中共比朝鲜共党更邪恶。朝鲜共党鄙视中共为修正主义者，称中共之国为“那个无原则的国家”。



（知青大反抗是八九民运的开始）

在纪念严佑民（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文章里说：“1979年，**上海新疆知青多次集体上访，要求回沪**。严佑民同志对此十分重视，亲自率领市有关部门的领导赴新疆，找知青谈心，细致了解他们的具体困难，及时与新疆自治区党委、建设兵团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商谈妥善解决知青问题的方案。回来及时向市委汇报，并提出建议。后经市委研究决定，让家庭确有困难的未婚单身知青回沪；允许留疆知青家庭的一个子女户口报进上海。这样既解决了新疆知青的实际困难，又维护了大局的稳定。”



（毛与中共欺骗城市青年下农村）

知识青年被毛与中共强行押送往农村，在那里他们经历悲惨，不少人终于看清了中共的面目，也有更多人出于自身未来的考虑而反抗中共。毛死后，全中国出现知识青年的大反抗，特别是云南知青，那个轰轰烈烈的程度，中共无法招架，只能让青年回城！知青大反抗是八九民运的开始！

辛灏年在一场演讲中说：“中国大陆的人民只有一次真正反抗中共。一九七九年，七九年万里为什么提出‘分田到户’也就是‘包产到户’？是因为安徽的农民、四川的农民，凡是内地贫困省区的农民，**开始像打游击一样地抢共产党的粮仓**。我是自己因为一个特殊的原因，看到了当时共产党的《大参考》。各地农民抢粮仓这种造反犹如遍地烽火，这才是‘包产到户’政策的来由，这才是共产党搞改革开放的前提。”

所谓改革开放，就是在人民的压迫下，中共不得以的行为，是人民推动中共不断地向前进。直到一九八九年，中共果断出动坦克、军队消灭手无寸铁的人民反抗，在众目睽睽之下的天安门广场，用坦克机关枪消灭学生的静坐。八九民运之时，许多城市的小偷宣布“罢偷”支持正义，这是世界小偷史上的创举。连小偷都有正义，难怪古人云：“仗义每多屠狗辈”，我们的民族很伟大。大陆人的不幸，只是中共比其它共党更邪恶，否则，我们早把它做掉了。

从 1976 年开始，中国人不断增强反抗中共暴政力度，也传染了世界，掀起了世界反抗共产暴政的序幕。中国暴发了八九民运，中国人民大规模反抗中共暴政，动摇了中国共产党的根基，也动摇了世界共产党的根基。中国反抗中共的运动虽然被中共镇压了，世界反抗共产主义并没有停止，从而导致世界共产党国家大都垮台，苏联解体、欧洲共产主义国家崩溃。人类大部分地区得以脱离共产主义的魔爪，主要得益于中国人的八九抗共。这就是中国的八九民运对世界人民的贡献，对人类正义事业的贡献。

八九民运就是一次中华民族的集体大觉醒、大反抗，也是人类的大觉醒。没有八九民运，就没有东欧共产党阵营垮台，就没有苏联解体。共产主义最先在中国受到了致命打击。

很可惜，当时没有针对中共核心问题的大反抗！提出这种“不让人民说话的政权不是人民政权！”，中共就怕死了！

有六四才有东欧社会主义解体与苏联垮台，或者说是六四引导了的。英国《卫报》在苏联解体 20 周年之际，独家专访了戈尔巴乔夫，当记者问他最遗憾的事情时，他毫不犹豫地，应该早点离开共产党。



（世界依然继续六四精神反抗中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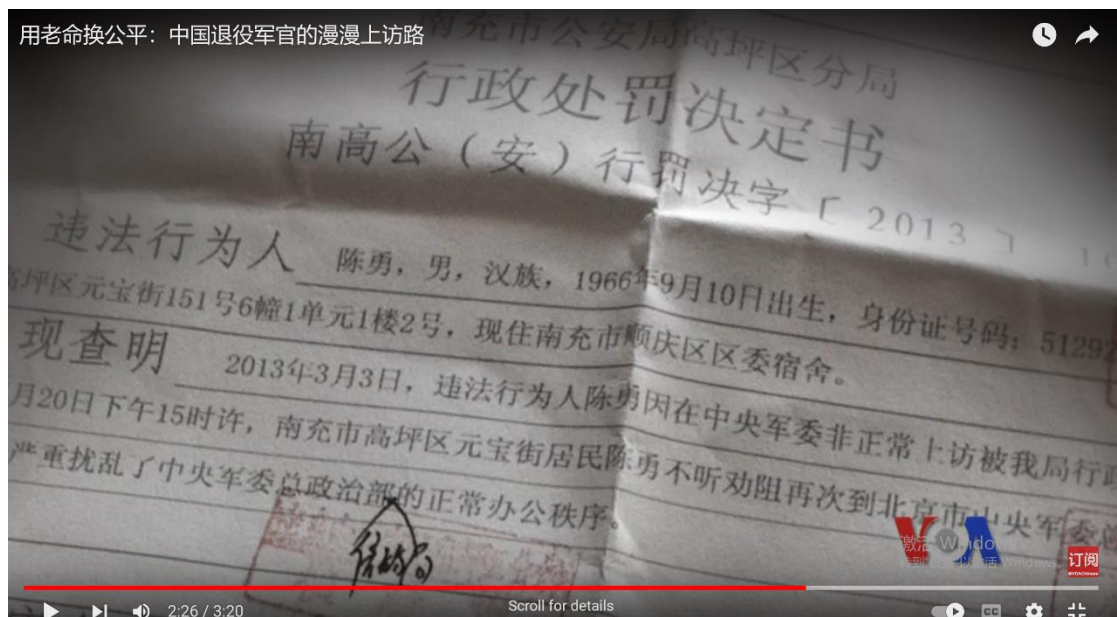
朝鲜战争中，超过 70%的志愿军战俘成为反共义士，顶住中共的威吓利诱，坚决不回中共国。这帮志愿军战俘反共义士们的伟大行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亮丽的图画，为世界颓废的反共阵营打了一针**强心剂**，让迷茫的世人信心大增，向共产主义所带来的黑暗世界撒下了光明，在世界范围内抵御了马列主义瘟疫的疯狂传染，拯救人类于无形之中！

无论是朝鲜战争的反共战俘，还是八九民运的民主青年，都是中华民族的觉醒行为，都是中华民族对共产主义的反抗，也为世界反抗共产主义阵线带来了信心和希望，冲破共产主义的黑暗，为人类带来了光明。所以，中华民族天生就是反共之民族，中华文化天生就是反共之文化，中华民族是人类的希望所在。拯救中华民族，就是在拯救人类。

所有对中共的大反抗，是对邪教的大反抗！将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永放光芒！

十六、上访大反抗

看看被多次绑架后继续上访的“上访专业户”（[这个视频](#)），看看（《[独家]1年抗议逾百起防民如防川》<http://cn./gb/20/10/22/n12493565.htm>），看看这个《[五中全会首日北京戒备森严访民挤爆信访局](#)》、《网民曝北京信访局万人上访打卡成网红语言》<http://cn./gb/20/11/13/n12546237.htm>，都是有视频可作证。



(中共公安对上访人的迫害——处罚书)



(成都退伍老兵大抗议)



（我们用老命兑换公平）

大有中共不灭反抗不止之趋势。



（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上访老兵）

正如杨佳所说：“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

有 27 年上访的，这些反抗是何等的坚韧？访民们大有中共不灭上访不止之势。这是在中国所能坚持的反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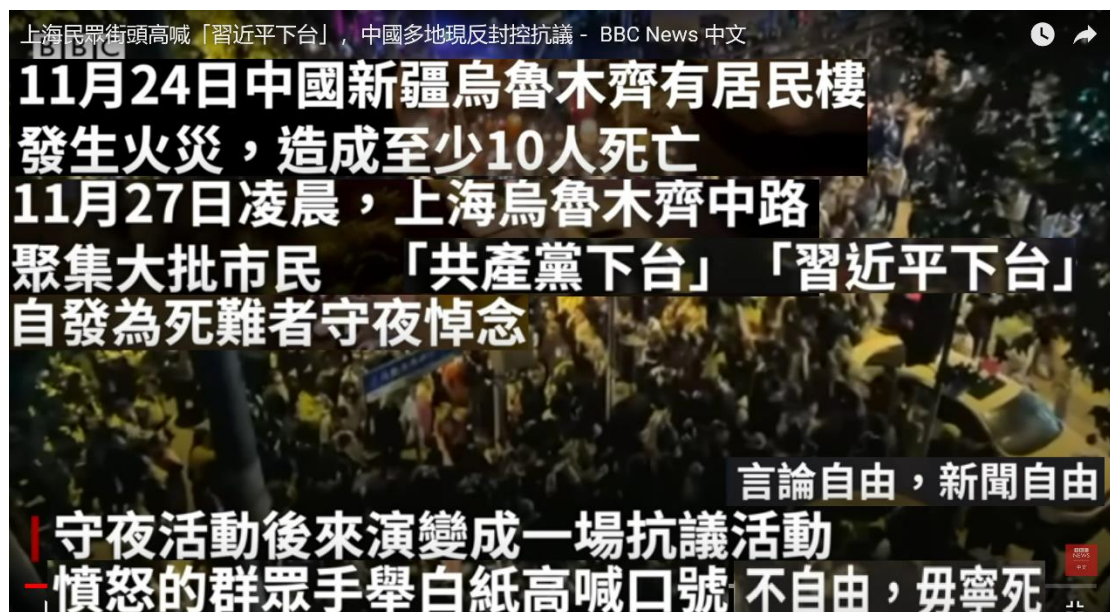
在一个上访却变成“访民”——上访专业户的国度里，所有的上访都是在反抗！

还有 2022 年的白纸运动，那一次可把中共与习近平吓得不轻！



（2022 年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的白纸运动现场）

由于中共国的过分防疫政策，全面监控中国人，并把中国人全面封锁、把中国人都关进了笼子里。2022 年 11 月 24 日，新疆乌鲁木齐火灾，过分防疫政策造成 10 死亡，千里之外的中国各地，举行了抗议活动。人们举着白纸，表达对中共政权的极度不满。



（2022 年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的白纸运动现场）

白纸运动就是借着对中共的过分防疫政策的极度不满，表达了对中共政权的极度不满，白纸运动喊出了：“中共下台、习近平下台，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不自由、无宁死.....”这一次可把习近平与中共吓坏了，马上彻底转变过度防疫政策。别看这次抗议时间短，却是最成功的抗议行动。

我看，下乡知青抗议与白纸运动，是中共国历史唯二的全面胜利的抗议！

十七、律师出版人信仰团体大反抗

中共相信的是无神论，这是信仰，无所谓的。可恶的是中共却对所有的信仰者进行迫害，对家庭教会与法轮功的迫害最重。所有的信仰团体都是共产主义者的迫害对象。

大陆的家庭教会的成员们，多少人被中共所关、所判刑、所迫害？高高在上不受威胁的教皇都低下头与中共苟合，而受到巨大迫害的、在中共眼里命如蝼蚁的大陆教徒们还在坚持。教廷真得好好想一想了。

法轮功的反抗更是持久与坚定。看看法轮功所写的《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等等一系列书籍，真是高明得不得了，真是一鸣惊人、一语惊醒梦中人，那是中共的彻底挖根断命。一个不参与政治的修炼团体，竟然能写出这种书籍，而与共产党恶斗了一百年的国民党却不能，不得不佩服法轮功的智慧与勇气，修正道者本来就比常人高明，马列主义是邪教，敢于与邪教对着干不是英雄就是圣人。某些人说他们是参与了政治。如果揭露邪恶就是参与政治，那么，参与就参与呗，政治有什么了不起？只能说明世道不清明，逼得修炼人参与政治、逼得方外之人入红尘；当年日寇侵略、**邪教“八紘一宇”害人**，多少不惹红尘的和尚、道士脱下袈裟、脱下道袍穿起军服，放下木鱼、放下拂尘拿起屠刀，达赖与班禅首先呼吁抗日，五台山僧人连直接上战，日寇在崂山烧庙杀道士、青岛抗日市长李先良说道人是最好的交通员，西藏所有的庙都举办诉求战胜日寇的法会等等。中日之战，不仅仅是民族战争，还是正义与邪教八紘一宇的战争，佛家与道家更应该庆幸在这场人间正义之战中没有缺席。**人是正义之人，道是正义之道，魔鬼祸乱世人，岂可置身事外？**邪教**马列主义**横行世间，岂可熟视无睹？如果那样修的是什么？再说，既修正道，必有邪魔阻挠，邪魔既出，必然祸乱人世，不除魔何为正道？正道之行必定留给人间一个清明世界！公民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那也是参与政治，参与政治本来就是我们人的权利，既在红尘中修行，岂可自废武功？说实在的，本人所写的书，既是受正义之心的驱使，更是受了法轮功书籍的启发与影响，真得好好谢谢他们。直至今日，法轮功还在不断给人作三退：退出共产党、共青团与少先队，我也曾经碰到过。20多年来大陆电线杆上不断贴上“天灭中共三退保命”，其灭共的信心与坚韧天地可鉴。

中共国是世界上关押律师最多的国家。

看看被重判的律师们，他们受到什么样的迫害才会在电视上认罪，知道吗？律师是最懂得法律的，如果真有罪，怎么可能去碰？律师们根本没有罪，而是扛不住迫害，不得已才上电视认罪。总不能认为律师们认同中共对他们的迫害吧？

同样，中共国也是世界上关押出版人最多的国家。

看看那些被判重刑的出版人，他们受到什么样的迫害才会在电视上认罪，知道吗？出版应该是自由的，怎么可能有罪呢？如果是诽谤嫌疑，应该让受害人来诉讼，关中共什么事？可见，是中共在迫害人。出版者根本没有罪，而是扛不住迫害，不得已才上电视认罪。

有的国内出版者中共甚至用经济罪来迫害，掩人耳目！

2016年8月，又有几位被定为死磕派律师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重刑。这些年，香港出版界被一锅端，许多从业者被中共抓走判刑，香港被中共彻底吃掉，香港多姿多彩的文化被中共消灭，并培养出一批红朝歌颂者。

现在的中共国，依然是世界上关押上访者最多、关押记者最多、关押律师最多、关押出版人最多的国家。为什么？这些上访者、记者、律师、出版人都是中共暴政的反抗者，中共害怕而关押他们，中共在迫害他们。

十八、中共穷凶恶极

清朝被推翻的前一年，人民反抗清朝 260 起，而 2014 年，大陆人民反抗中共达到 26 万起。中共为什么不和美国一样，让百姓拥有枪枝？中共很邪恶。访民们有枪，还用得着上访吗？

中共不但镇压人民严重，中共杀自己人也严重，一个如此凶残的生命，不是那么容易对付得了的。经常听中共说，张国焘在红第四方面军肃反，杀富农以上成份者超过一半，女红军因长得漂亮也被以特务罪名杀掉。但是，他的杀戮按比例和数量都不是最高的。贺龙红军肃反，把 3 万多红军杀得只剩 3 千多。中共中央根据地肃反，在胡耀邦当政时被平反，当时仅有名有姓的被平反者就有八万多人，当然地主富农及反革命是不会被平反的，说明八万多人都是中共自己人，中共杀戮自己人达到泛滥的程度。

为了镇压中华民族的觉醒，共产党无所不用，最利害的一条是败坏中国人的道德，一切向钱看，甚至把日本的势利文化“识时务者为俊杰”传播给中国人，造成中国社会的许多败像。中共为了它的生存，它在毁灭中华民族。

中国大陆人没有趴下。蒙古国被斯大林屠戮后趴下了，至今没有站直，台湾被日本屠戮趴下了，他们许多人至今没有站直，都是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至今没有痊愈，不恨日本反而恨中国，这些人有什么资格指责大陆人？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反抗精神的民族，所以，中国的朝代经常更替。“读空气”的日本是一个缺乏反抗精神的民族，台湾的某些人也受其熏染。一旦共党占据台湾，加上马列病毒具有极强的迷惑性，估计台湾人的反抗不会比大陆人强，凭什么就可以指责大陆人？

按照某些人的逻辑，红色高棉屠杀人民，坏透了，柬埔寨人又不反共，灭掉红色高棉时连柬埔寨人一块灭掉，那么那些人比红色高棉还坏了。

在朝鲜，只听说金家如何清理各种派系，什么南方系、延安系、苏联系……一批一批地清理（杀戮），没听说这些系是如何反金家的，更没听说是如何反共的。按照某些人的逻辑，灭金家皇朝时也把朝鲜人一起灭掉，因为他们怪朝鲜人不反共，是从共。这样做且不说应不应该，就说是什麼结果吧。朝鲜人会无条件地站在金家皇朝那边与你死嗑，用尽一切保卫金家皇朝，这是自卫，天经地义。因为，金家皇朝的统治，再耻辱多数人一时还是能活命的，某些反共人士来了，他们连命都活不成，这些反共人士不是比金家还坏嘛！这样做，不是消灭金家而是保护金家，把朝鲜人民推到金家的怀里来保卫金家。在中国也是同样道理，分不清人民与共产党的反共，就不是真反共，而是在帮助共产党。

人类的敌人是共产党，不只是中共。中共杀人按比例算不是最高的，柬埔寨共产党杀了三分之一人口；苏联共产党的列宁加斯大林杀的人，加起来应该超过 20% 人口；蒙古人民党（共产党）杀的人也差不多这个数，并且把汉人、内蒙古人杀得一个不剩；日本的赤军（红军）不是也杀人吗？秘鲁光辉道路不杀人吗？世界上哪个当政的共产党不杀人？印度共产党已经 200 万了，并且想武装夺取政权，它们当政不杀人吗？

不是在救国救民吗？把国与民都当成敌人了还能救谁？

中共是中共，中国是中国，汉人是汉人，三者不是一致的。中共作恶不是汉人作恶，不是中国人作恶，更不是地球人作恶。冤有头，债有主，要报仇，找债主。中共作恶，有的人却找汉人、找中国人报仇，把许许多多的无辜者甚至是受害者推向罪犯的身边，这样做不是在打击罪犯，而是在保护罪犯。凡是把被强奸者与强奸犯一起打击的，都是在帮助强奸犯。

一些少数民族人转移仇恨对象，其实是帮助中共脱罪。藏人也有共产党，某些藏人只骂汉人共产党，为什么不骂藏人共产党？为什么不骂地球人共产党？潜意识中是不是在转移仇恨、放过中共？再提醒一下，应该骂的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汉人共产党，汉人也是受难者。汉人 13 亿，中共才 9000 万，不是一致的，请不要把汉人当作中共，没有 13 亿的汉人帮助，仅反共人士也打不过中共，汉人才是反共的主力军，打败中共的最佳办法是从内部出击，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最好把中共党员也变成反共人士。不想团结汉人反共，就是不想赢得这场反共战争。蒙古人民党杀了那么多汉人与内蒙古人等中国人，我们又找谁要账？找蒙古人民吗？当然不行，只能找蒙古人民党，如果蒙古人民党已经灭亡，那我们的仇已经报了，不用再找人了，蒙古人民党杀的蒙古人民更多，只是顺便杀中国人而已。中共杀的汉人更多，只是顺便杀一点藏人而已，藏人与汉人都是同难者，何必再相害？

共产党害人时，都搞统一战线，反共者为什么不也搞个统一战线，把所有被害的人和反共人都团结一起，难道反共人士连这点智慧和能力都没有吗？如果真的没有也不想有，反共就难以成功。

中共对我们所有的民族都进行了杀戮与迫害，我们所有的民族、所有的中国人都是难兄难弟，不要再相互伤害，不要干那种亲者痛中共笑的事情，不要干那种把汉族推到中共的怀抱、为中共续命注入巨大能量的事情。要打败中共，首先得把中共与中国分开，也得把中共与汉人分开，还得把共产党与地球人分开，冤有头债有主，我们只打中共，把中国人、汉族人、各民族、甚至普通中共党员都变成反共同盟军，只对中共坚定党员及中共的捍卫者打击，大事何愁不成？

所以，凡是把中共与中国捆绑、把中共与汉人捆绑，不是蠢就是坏！

世界人民首先应该分清中共与中国，分清中共与中国人民，还应该帮助中国人民推翻中共的统治，才能彻底解决世界共产主义的问题，这才是人间正道。现在美国把中国人民与中共结合在一起，并想通过打击中共达到打击中国的目的，让它永远当世界老大，这是想多了、想歪了。美国是世界警察，是维护世界秩序的，中国才是王者，推翻中共后的中国，将把人类带向美好的未来。

有的人在想，大陆人不反抗才导致中共长命。是这样吗？不是的，这是马列主义者误导的错误信息，是中共太邪恶，外国人太麻木，如果美国人扒开互联网，何至于此？

中国人的反共历史悠久。文人们围殴马列主义就是反共，四.一二清党就是反共，五次围剿就是反共，四年内战（1945 年—1949 年）就是反共。1949 年前后，有 100 万大陆人逃到香港，大饥荒与文革时，又有 100 万大陆人逃到香港，这就是反共弃共。后来还组成了海外第三势力「自由中國抵抗運動」，并空降游击队进入大陆多省，这就是反共。蒋介石一直坚持找时机反攻大陆，这就是反共。甚至在中共的眼里，翻墙（以前叫做收听敌台）都是反共。

不要说大陆人不反抗，看看一聚餐就开骂共党的大陆人，看看 20 年来电线杆上不断贴上“天灭中共三退保命”的标语，看看八九民运中的青年与小偷，看

看 27 年不间断的上访者，看看打着红旗上访的军人，看看不断被判刑的律师与出版人，看看去年吓坏中共的白纸运动，还能说大陆人不反抗？

反共，应该先分清中共，否则，如何反？把受中共迫害的中国人民当成中共来反，这不是中共最想要的吗？

灭共是人类的事业 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共产主义是全人类的灾难，打倒中共是消除这场灾难的最重要部分，需要所有人的参与，现在的美国政府打击中共也是这场灭共大战的一部分。其实，只要人类觉醒了，打倒中共就不难了。

欧洲的文艺复兴，让人类走出黑暗的中世纪。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就会导致中华民族的觉醒，中华民族的觉醒就是邪教马列主义的死期，并让人类走向美好的未来。

十九、中共最怕回忆录

由于马列主义的邪性，作为马列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几乎所有的主要行为都是错的，只有改革开放才是对的。而改革开放却是在文化上复辟中华文化，在经济道路上复辟蒋介石道路。改革开放不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摸着中华民国过河，沿着孙中山蒋介石的道路前进。

在历史上，中共干了太多的坏事，说了太多的谎言，最怕人家把那些历史、那些中共的口号拿出来，于是，中共最怕回忆录。那些回忆录也是研究中共的现实材料。中共最怕回忆录，中共就用更大的谎言掩盖小谎言。

随便拿出一个回忆录，都可以要了中共的命，于是，消灭出版自由就是中共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中共也不敢让中共党员写回忆录，写出的都是中共的丑事，还会泄露中共的罪恶。

现在，拿几个回忆录看看：

在《在红军肃反中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和《萧克将军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中央苏区肃反累计杀了 10 万红军。国民党在红军长征前多年来消灭的红军也没有这么多。江西根据地内为中共完全控制的 15 个县，人口减少 50 多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闽西根据地的减少幅度也差不多（减少 50 万）；中央苏区人口下降 70 万……毛死后的 1983 年，江西有 238844 名肃反被杀的人被官方追认为烈士……有的老同志回忆说，在当时政治保卫局所在地附近河滩上，尸横遍地，河上腥红……”

《王明回忆录》与《张国焘回忆录》，记载了许多中共与毛泽东的恶行。

《一个革命的幸存者》：陶铸妻子曾志在回忆录里面记录了许多疯狂的革命崇拜。中共湘南特委为了执行省委“阻止敌人打通湘粤大道”的指示（阻断交通很无耻），在“使小资产变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极左精神影响下，在烧杀中又提出“焦土战略”，提出了“坚壁清野”、焚烧城乡以分散敌人的目标、焚烧湘粤大道（四百里长）两侧 15 公里内的民房”、片瓦不留。

《龚楚回忆录》：记录了中共在大革命时期胡乱杀人、胡乱杀戮中共党员。

《中共往事钩沉·浪底真金——中共十大元老》：记录了安源煤矿罢工工人自动把工作时间降为每天 4 个小时。刘少奇无法说服工人，苦闷欲死，眼看企业产量下降走向破产，他也极度痛心，极度抑郁于心，以致在十多年后的 1937 年，在给中央的信中说：“很明白，上述的现象，是中国革命工人运动初期的表现，幼稚的表现。‘流氓性’带得很重。”他把中国工人与流氓联系起来。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他在回忆录中承认：“在这场农村革命的大风暴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左’的偏差，诸如擅自捕人游乡，随意罚款打人，以至就地处决，驱逐出境，强迫剪发，砸佛像和祖宗牌位……“土豪劣绅”是农村重要的纳税人。农民的杀猪出谷、分田分地、逮捕残杀，就使得他们失去了纳税的能力，也失去了纳税的“权利”。农民擅自宣布的一些法令，严重影响着农村正常的经济运行。湖南农民禁止粮食输出，就使得乡村的粮食贸易无法进行，众多操贩粮之业者，本来也是要按章纳税的，现在生意做不成了，自然也就不再纳税。这样，各级政府都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等等……此外，还冲击了少数北伐军官家属，引起同湖南农村有联系的湘籍军官的不满。”

《李宗仁回忆录》中记录：工农运动中的“过激的作风，早已引起军中官兵的疑虑。到(民国)十六年夏季，两湖军队愤懑的心情，已到无可压抑的境地。因

当时中、下级军官多为中、小地主出身。其父母或亲戚在故乡都横遭工会、农会的凌辱，积愤已久。而各级党部竟视若无睹。纵使是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父亲，也被绑游街示众”。

《“书生气浓的革命家”——瞿秋白》，记录了大革命时期：武汉政府控制的两湖及江西三省，财政收入因此锐减 2/3 以上；而武汉政府赖以与蒋介石对抗的军队最高是湖南唐生智所部，该部官兵多来自湖南本地，农会除分其军官家中土地外，甚至截留士兵寄回家中的钱款，再加上政府欠饷，官兵怨声载道。武汉政府的国民党人自然要将这笔账记到共产党头上。

杨奎松依据台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史稿》说，从 1933 年秋到 1934 年秋，一年的时间里，国民党在全国捕获的共产党员是 4505 人，而自首叛变者则达到 4213 人，“自首叛变率”竟达 95%。“这足以证明国民党这时的自首政策，对被捕的共产党人影响极大”。极左的工农运动，对中国及中共危害巨大，没有苏联后来的倾力支持，中共就不再有上台机会。

《王茂恩日记》(《王茂恩回忆录》)：主要泄露了中共在抗日时期的胡作非为。

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记录了毛泽东一生所做的许多恶行，是研究中国近代史最重要的史料。

《聂荣臻回忆录》，记录了中共如何截杀抗日英雄赵侗及其队伍的，当然把他说成是土匪才好公开杀戮。

东北中共军队司令部的《阵中日记》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记载：“**顽区群众条件极坏，我军通过时沿村抗击**”。一位老战士回忆：“**又饥又渴赶到吉林市，满指望能吃点喝点，大街空荡荡的没一个人影，像座空城。**”离城过了桥，炸了桥，隔江看着国民党脚跟脚进了城，“老百姓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涌到大街上，挥动各色小旗，呼喊口号”。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记录了毛泽东在 1949 年以后的种种劣迹。

《“大饥荒”中国饿殍遍野日本战犯享受超国民待遇》，国军战俘待遇不及汉奸战犯，更不及日本战犯。日本战犯吃罐头吃到不想吃的程度，走后还能找到没打开的罐头，而国军战俘连罐头未曾尝过。

《庐山会议纪实》(《庐山会议实录》)：中共高官李锐记录 1959 年中共权斗的庐山会议。

林牧回忆录《烛烬梦犹虚》，记录了长时间中共的胡作非为：

{

大约在 1949 年，在中共统治下的晋绥地区，晋绥行政公署主任武新宇家庭是大地主，土改期间，当地农民在武父的鼻子上穿洞套绳，**要求武新宇牵着绳子拉他父亲游街示众**，武新宇竟然照办。贺龙批评武新宇说：“谁不是人生父母养的，难道你武新宇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农民要你把你父亲当牛牵，你就去牵。其实，提出那种无理要求的，决不是老实农民，**而是农村的流氓无产者**，他们并不能代表大多数农民。你以为你在尊重群……”

文革中，对五类分子更加残酷。陕西省山阳县组织五类分子和走资派游街示众以后，集中在一个广场上，用石头砸死，有一天就砸死了二百余人。陕南山区安康、旬阳、镇安等县，基层干部和农民建立了一个第六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六总司”。陕西省革命委员会按关中方言“六”和“刘”发言近似，就把“六总司”改为“刘总司”，诬陷那个群众组织是为刘少奇翻案的“反革命暴乱司令部”，逮捕了数百人，在刑讯中杀害了 50 余人，又正式判判处死 50 余人。其实，按陕南方言六读如禄，根本不会误读为“刘”。这一次大屠杀虽然在 1978 年平反了，

但是杀害一百余名无辜平民的省革委会负责人并未受到任何制裁。

}

《往事并不如烟》中，章诒和记录了中共的许多恶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恶行。

《谭天荣：我的右派经历》里，记载了中华民族精英的苦难历经。

回忆录《历历在目》记载：文革中，海口市分成两大派：海联司派和东方红派。海联司派获陆军支持；东方红派获海军支持；两派互斗，都标榜自己是革命造反派。后来，地方由陆军军管，海军悄然的淡出了，这就注定海联司派是赢家，东方红派是败家了。

著名右派陈奉孝的《“二劳改”这一名称的由来》：

{

一位年龄稍大一点青年对我说：“你们是大劳改，就业人员是二劳改，我们（下乡知识青年）成了三劳改了！”

（多数）其他的就业人员多半是原来国民党时期的保、甲长之类的下层人员，大都没有什么文化，经过多年劳改和“二劳改”生活的改造，他们除了知道干活、吃饭以外，几乎都成了“木头人”。

到四中队后不久，正好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建立邦交关系，全国上下都在学习“伟大领袖的这一伟大战略部署”，监狱、劳改队自然也不例外。在小组学习讨论发言时，有个叫王其本的老就业人员问了一句：“田中角荣来我国访问带不带粮票？日本的粮票在中国能用吗？”这一问不要紧，说他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粮食政策”、“破坏伟大领袖的伟大战略部署”，于是绑起来一连开了他三晚上的批斗会，差点把这个老家伙整死。

他问的问题的确有点令人好笑，但完全是出于无知。王其本是江西人，六十多岁，当过伪保长，念过两年私塾，因“历反”罪，在五一年“镇反”时被判刑十年，刑满后一直在乌兰农场就业，戴反革命分子帽子。此人的形象活像一个木乃伊，他对政治形势半点也不懂，对国际关系常识更是一窍不通。

第二件事就是有个叫陆山的老人，在院子里大骂日本鬼子，被绑起来，嘴里塞上臭袜子，吊在树上，最后关进了小号。（**骂日本鬼子都遭中共迫害，不能不相信中共与鬼子有一腿。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几乎不知道鬼子的罪行，连南京大屠杀也不知道，毛为鬼子掩藏罪行——金剑**）。

第三件事就是有一个叫张举元的老就业人员，六十多岁了，江苏赣榆县人，解放前在伪县政府里干过几天文差事，并无什么具体的罪行，“肃反”时被判刑十年，人很和善，象棋下的很好，休息时我常找他下下棋。就业十多年，他省吃简用攒下了五百多元钱，想请假回家看看，他家中还有老伴和一子一女。人老了总爱思念孩子，陈干事开恩批了他的假。可是回到家里他老伴和两个孩子都不认他，因为怕受牵连，早就跟他划清了界线，妻子不认他这个反革命丈夫，孩子不认他这个反革命爸爸，连他这五百元钱也没敢要他的。他伤心极了，找个小旅店住了一晚上，回到农场的当天夜里就跑到马号里吊死了，兜里还揣着那五百元钱。他死后钱当然是充公了。

第四件事就是七三年拔草时，有个叫范汝愚的刚刚释放出来不久的就业人员，三十多岁，哈尔滨市人，精神多少有点毛病，因为跟干部顶撞被吊了半宿，第二天他就喝拌稻种的农药自杀了。有人看到他躺在炕上吐白沫，报告了陈干事。陈干事命令两个就业人员把他拖到院子里，医务室就住在大院里，离就业人员的宿舍不到五十米远，要抢救的话，完全可以救过来。可是陈干事命令一个就业人员到厕所里用粪勺子舀了一勺子大粪汤子，撬开他的嘴巴往里灌，好让他吐，人没有救过来，死了，蛆虫、还在他脸上爬。我看到后身上直起鸡皮疙瘩，心揪的难受。

这就是我刑满释放，重获“自由”后不到一年亲眼目睹的几件事，这就是在那个年代，刑满释放后留场就业的“二劳改”的命运！简直连一条狗、一只鸡都不如！

（由于我不肯干一个怕被管教干部找我的麻烦的活），那一天是张指导员带工，他火了，抡起一把水平地用的二齿子就给了我一下，差点把我的左胳膊打断，这一下把我的左胳膊靠肩膀的地方打的全紫了，肿起来个大包，幸亏我穿着棉袄，不然的话，胳膊非断不可。这下不能干活了，他命令大组长潘玉林把我绑起来送回去。

按规定干部是不允许打人的，他可以给你戴刑具，也可以把你绑起来，吊起来，这些都是“法律”所允许的。他如果想收拾你，往往是让其他的“二劳改”动手，干部们一般不亲自动手，如果他要亲自动手收拾你，一般都是把你叫到队部或把你弄到一间空屋子里去，这样不管怎么收拾你都没有人看见，因此你想告也告不赢。

陈奉孝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

中共不但怕中国人的回忆录，更怕中共党员的回忆录，也怕外国人的回忆录。

在普京的支持下，俄罗斯多位历史学家编辑出版了《二十世纪俄罗斯史》，把列宁斯大林的事迹公开，震撼震惊全世界。列宁与斯大林真是坏事做尽。

赫鲁晓夫就作了《秘密报告》，里面记录一部分斯大林所做的坏事，就把毛泽东与中共吓得要死，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也是因它，因为中共与毛泽东所做的坏事比斯大林还多还坏。

《延安日记》是抗日时期苏联派驻延安的代表所写，把中共吓死了。里面记载了中共如何种植鸦片，如何勾结日寇的事例。

日本间谍岩井英一的《回想的上海》，记录了他与中共代表潘汉年秘密会面与秘密约定的事情，及潘汉年救走了汪精卫与日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日本作家远藤誉根据日谍的回忆录，写成了《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来自日谍的回忆与档案》与《那个勾结日寇的男人毛泽东》。

据《迪克在延安》记载，日本战俘的伙食（生活费）是5元，与毛泽东的一样高，高于俘虏他们的八路军无数倍。

.....

总之，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祸国殃民史，所以，不敢让人民了解，马列主义理论就是祸国殃民理论，也不敢让人民讨论。

对于回忆录，中共怕！怕！怕！

二十、美国九步可灭中共

其实搞垮中共并不难，不要想有天大难度似的。中共一直还活着，是因为没有像美国这样强大的敌人真心要搞垮它，否则，中共早就没命。换另一种说法，就是美国从来没有想过要搞垮中共。

美国与自由世界，可能是被共产党搞怕了，觉得中共力大无穷似的。美国以前没有做足工夫，现在一着急就抓瞎，胡乱出招，许多招数没有打在中共的身上，而是打在中国人民的身上。

美国人现在打击中共的方法，是想用搞垮中国经济从而达到搞垮中共，这一招如隔靴搔痒，效果很差。

中共是饿不死的，高官们也饿不死，他们也不用对人民负责，所以，不怕经济垮台，甚至从经济垮台中得到许多好处。有十四亿韭菜任中共割，怎么能饿死

它呢？饿死十三亿人之后，才轮到中共挨饿，那是多么漫长，且无辜者白骨累累。朝鲜饿了几十年，金三胖都饿不瘦更不可能饿死。

毛泽东年代后期，什么东西都要票，甚至卫生纸都不够，中国经济已经垮台，甚至是崩溃，毛泽东一样活得好好的，伤不着他，还受人民的极端爱戴，干部们也活得好好的。中国是个大国，经济等各种优势非常大，现在又是高科技时代，只要现在政策不全面回到毛时代，中国沿着修正主义这条道路走下去，中国经济不可能回到毛时代，更不可能大面积饿死人，经济只能不死不活走下去，如果没有其它因素催促，离中共崩溃遥不可及。

朝鲜的经济早已崩溃，全国只有一个胖子，金三胖一样花天酒地，想什有什，他肚满肠肥，饿不着他，只饿了朝鲜全国人民。就这样，也没看到金三胖选择投降，或者朝鲜人民大面积造反。

经济越落后，朝鲜越与世界脱钩，朝鲜独裁者控制社会的能力就越强，朝鲜人民就越没有造反意识与能力。朝鲜是越穷越稳固。

可见，想通过经济手段搞垮中共，不但如隔靴搔痒，效果很差，很可能是南辕北辙，适得其反。

美国打击中共国的经济，必然毁灭中国的未来，即使中国走向民主，也会受到巨大的伤害。在打击中国的同时，必然抬高日本，这是巨大的错误。对世界有巨大危害的是魔鬼在世间布下的四大恶卒：纳粹（民族先进论）、共产主义（阶级先进论）、伊斯兰国（信仰先进论）和八纮一字（征服天下论）。除了纳粹，后面三者都是活的，日本的八纮一字正蠢蠢欲动（看看这篇著名英国学者写的[《毫无悔意的日本极端民族主义》](#)），随着日本实力的壮大，八纮一字更加大量注入鸡血（看看注2里面的那些文章）。八纮一字的壮大，中国及世界的未来，正处在巨大危险之中。这是魔鬼最希望的结果，或者说是魔鬼的巧妙安排，也是中共最想看到的，中共不但捆绑了中国人民，也捆绑了世界，这也是中共敢于豪赌的原因。

搞垮中共，其实很简单，有几步就可以了，全是软刀子的和平手段，可以说是兵不刃血：

光明正大地亮出反共旗号、分开中共与中国人民、分化中共高层与普通党员并精准打击中共高层及抬轿者、推动信息自由化、扩大留学生人数、公布中美关系史、强迫日本公开二战时与中共的交往史、推动两岸和平统一、解剖马克思理论及辩证法。

这些步骤，有些是美国已经在做，未必做得完美，我为了完整地叙述自己的观点，也把这些步骤一起陈述。

1、光明正大地亮出反共旗号

这一条很重要。扛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

灭共是人类的事业，是一个巨大的事情，也是一个危险的事情，更是一个必须做的人类伟大事业。自然有人做，零丁反抗中共，只会被它一个一个地消灭，消耗了反共力量和意志。必须有实力者的号召，才能让人看到希望，才能聚集反共队伍，并使反共队伍越聚越大。有了队伍，有了统一部署，才能干倒中共。所以，必须亮出旗号。

是反共而不是反中！

反中，只会把中国人民推向中共的怀抱，增强中共的力量，所以，反中是在

保共，而不是灭共。台湾现在搞的反中抗中就是在保共。

2、分开中共与中国人民

这一条非常重要。

中共到处宣扬它与中国人民捆绑在一起。美国人应该反其道而行之，向世界及中国人民宣告：中共不等于中国、不等于中国人民，中共是施害者施暴者，中国人民是受害者，中国人民是中共暴政的最大最苦的受害者，是苦大仇深的受害者，中国人民是中共的债主。中共倒台，最大受益者是中国人民。

而且，美国在打击中共过程中，不能过分伤害中国人民的利益。

中共绑架了中国人民，才有这么大能耐。

把中共与中国人民捆绑在一起是中共与一些阴谋家的行为。

现在，当美国政府要把中国人民与中共分开的时候，中共在发抖，习近平马上高喊“绝不答应”。可见，美国的这一招打得准、打得好。只是这一招来得晚了，并且缺乏落实手段。

自从中共出生那天起，就在不断地把它自己与别人捆绑。一开始捆绑工人、后来捆绑农民，说自己代表工人阶级、代表贫下中农，都是它自己的瞎说，中共任何人都不能代表，它只代表它自己。

中共说它代表中国人民。真是胡说八道，中国人民什么时候授权要它代表啦？中国人民不但没有要求中共代表自己，而且，一直反抗着中共的代表。看看中共当政以来搞那么多的运动，镇压那么多的人民，仅死亡的人数就超过 8000 万，超过第一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其惨烈程度可见一斑。不是所有的死亡者都是反抗中共才被杀害的，是中共看到了可能的造反而动手的。甚至开着坦克在天安门广场上压学生，难道被坦克压的学生也请中共来代表？

最近二十多年来，每年反中共的事件（中共称群体事件），达到多少万起。

看看这篇《中共政权灭亡的十大征兆全齐了！》。中共畏民如虎，买菜刀要实名制。都到这个地步了，还有人把它与中国人民捆绑在一起，**要么是无知，要么是阴谋。**

可见，中国人民与中共不是一伙的，恰恰相反，中国人民与中共是死对头，中共在祸害中国人民，而中国人民在反抗中共，中国人民是中共的最大敌人。中共是为了保命而宣称与中国人民捆绑在一起。

习近平最近高喊五个“绝不答应”中就有：“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可见，中共最怕把中国人民与它分开。

我们必须明白，凡是企图把中国人民与中共捆绑在一起的，都是非常可疑的，或者说都是中共的同路人。所有有意无意这样做的，也得不到中国人民的信任。大陆人民一直不看好台独，就是因为台独一直企图把中国人民与中共捆绑在一起。

美国要打败中共，必须利用好中共的最大敌人——中国人民，才是正确的道路，还要支持、援助、推动中国人民造反。堡垒只有从内部攻打才是最有效的、最便捷的途径。

应该从签证、上学、工作等多个方面，把中共与中国人民加以分开，让中共千瞪眼。

3、分化中共高层与普通党员并精准打击中共高层及抬轿者

分化中共高层与普通党员

中共高层是中共制度的最大得益者，普通党员得益少。所以，中共高层与普通党员是可以分开的，也应该分开。

没有必要把敌人变大，而是把敌人变得越小越好。中共一路走来害人都是这么做的，中共每次搞运动，都是只打击那么“一小撮”。中共曾经说过：“民主派现在是革命的同路人，将来就是革命的对象。”可见，中共挖墙角的本事是很高的。我们也挖中共的墙角，就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精准把真正的共产党高层分出来，作为唯一的靶子。

告诉中共党员，共产党是罪恶的，但是，中共党员不一定是罪恶的，普通党员只是求得生活的便利，一般都是无罪的，只要不在这最后灭共之时帮助中共，都有光明的未来。谁如果死保中共，中共垮台之后，一定会被清算。

精准打击中共高层及抬轿者

人做坏事，是因为从做坏事中得到好处，当做坏事必然受到惩罚的时候，谁还去做坏事？谁还做中共的帮凶？

中共的抬轿者不是无知就是无耻，必须严厉打击，绝不手软。

清除海外五毛，司马南之类的绝对不能放过。既然生活在民主社会，却仇视民主帮助罪恶的中共，这种人比中共还坏，就应该被整肃。把像司马南这样的抬轿者以间谍嫌疑直接抓起来，不与保释，关在看守所。

对于所有的间谍嫌疑人抓起来后，不要放过这个好机会，在看守所里天天 12 个小时以上播放《九评共产党》、《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等 D V D，和《延安日记》、《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二十世纪俄罗斯史》、《马克思谬论》、《人世间最大的谎言——辩证法》、《中共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来发动内战》等书籍的语音，说不定还可以从他们中招到反共义士。过一段时间后没有找到证据再驱逐回中国。

到时候，连中共都不再相信他们了。中共最怕对它了解的人，中共最不相信看过《九评》的人。

美国现在对中共的制裁很好，但是还要加重、还应该扩大，可以考虑达到包括省部级官员、全国人大代表以及人权迫害者。冻结他们财产，并宣称中共垮台后发还给中国人民。

美国的制裁，应该进行三级制裁，就是要扩大到旁系亲属，因为，与白种人的个人主义不同，中国是人情社会，情大于法、情大于理，兄弟姐妹的账户里完全可能隐匿被制裁者的金钱。在中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旁系亲属绝对能得到权力者的好处，被牵连也在情理之中。调查被制裁者及配偶的所有兄弟姐妹，要求他们申报财产，并证明他们的财产与被制裁人无关，并要求这些人观看《九评》等，考试合格才能作为普通人对待。

如果可能的话，联系瑞士的银行，把中共高层及其亲人的存款公布，并且冻结，宣布中共垮台后归还给中国人民。

中共高层贪污了无数钱财，他们既希望保住自己的权力，他们又希望中共垮

台，这样，他们的钱就可以洗白，变成合法资金。当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贪污来的钱被卡住的时候，可能转手帮助把中共推翻。

有人可能攻击说美国政府剥夺自由、违反人权。自由应该是有限度的，不应超越正义，为了正义、为了人类，可以暂时缩小自由度。让共党嫌疑观看《九评共产党》，是帮助他们了解共产党历史，他们最有权深刻了解共产党，这就是他们的人权。共产党限制人民观看《九评共产党》才是最违反人权。

4、推动信息自由化

宣布网络自由是天赋人权，中共搞长城防火墙工程是反人权、反人类工程，必须彻底拆除。

共产党为什么能活命至今，最大的原因是控制了所有的媒体，消除了自由信息，把共产党治下的人变成又聋又哑又盲又愤怒。

中共为了限制信息自由，强力拆除大陆人民的卫星天线，甚至把安装卫星天线的人判刑。

一旦信息能自由流动，就是中共的死期。因为，中共在历史上造下巨大的罪恶，一旦公之于众，没有多少人想保中共。并且马克思理论尽是谎言，捅一捅就破，中共有自知之明，所以它高喊：“坚决打击敢于对马克思理论进行挑战的人”。

如何推动信息自由化，主要有两个办法：

一是低轨道高密度通讯卫星，让大陆人民自由接入互联网，或者自由接收卫星电视、广播信号。让马斯克的星链向中国人民免费开放，所有费用由美国政府支付（垫付），中共垮台后中国人民自己支付。现在中共准备搞一个低于星链的卫星网系统，就是想规避星链的可能影响。

一是命令谷歌和微软，帮助打通互联网，并且直接把自由门、无界的功能置入浏览器中，对于一些著名的被封锁网站，直接用代理等办法绕过封锁。特别是微软，让阻断互联网的软件在微软系统下无法运行。美国政府应该对防火墙公司与个人进行制裁。

5、扩大留学生人数

打败中共很容易。中共的弱点在历史和理论上，就从这些弱点处打败中共。

所有的独裁政权，最大的法宝是脱钩——与世界脱钩，限制信息自由流通，限制人员自由来往。越与世界脱钩，人民越没有造反意识与能力，独裁者控制社会能力就越强，看看朝鲜就是这个样。

那么自由世界要打败中共这个独裁且邪恶的政权，必然反其道而行之。打败中共不是靠脱钩，而是紧密挂钩。

现在美国在缩减中国留学生人数，这是不对的，对中共的打击没有什么直接。不如让中国留学生更多进入美国，可以更好打击中共。

不是简单进入美国，而是加上条件，让中共更加害怕的条件。

限制中共党员申请美国留学，并且，所有的留学生，到美国后，必须认清中共的面目。要求留学生必须看《九评》、.....《延安日记》，并且考试，合格才留下，

多次考试不合格则驱逐。特别是现在疫情期间，要求留学生做十四天隔离，在政府安排的地方看《九评》、《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等。多数人是具有良知的，看过这些之后，哪怕是中共派来的人，都可能成为反共战将。

中共是最怕人家了解它的底，看过《九评》之后，中共就认为他是敌人了，最起码也是不再相信了。到时，限制留学生的就是中共。

对于必须驱逐的学生和学者，美国也用这个法子，先关一段时间，逼他们天天看《九评》等，回到中国后，就变成反共分子。

同时建议美国政府，在中国人入籍美国前进行考试，考《九评共产党》，考《延安日记》、《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人世间最大的谎言辩证法》、《马克思谬论》、《欺世大观》视频，等等等等，甚至在中共国学生报考美国大学前进行同样的考试，甚至在中国人申请进入美国时，发一个U盘，把应该学习的内容加进去，让申请者回去自己学习，考试通过才能发签证。甚至在关押的中共国逃到美国的难民中，强迫长期观看这些内容，并且宣称，美国只灭中共不灭中国，看够时间才送他们回去，说不定还能招收一批美国间谍进入中共国。如此这般，中共会关闭与美国的交流渠道，再也不敢让间谍进入美国，甚至闭关锁国，像朝鲜国一样，再也不敢让国人踏出国门一步。

6、公布中美关系史

中共一直在妖魔化美国，妖魔化美国式的民主制度，把美国当作邪恶的国家向人民灌输。中共篡改中美交往历史，煽动人民仇恨美国。

美国政府应该打破中共的这一条黑诅咒，发表中美二百年交往史，把中美交往历史完全展现在中国人民面前。

美国从来都不是中国的敌人，而中国的恩人，多数时候都在救中国。本人已经总结出，在历史上，美国最少有十四次救中国，仅救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最少三次。只能用“救”这个词。没有美国这个国家，中国在清朝时就可能灭亡，被帝国主义瓜分。

美国最少三次救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战争时干掉毛二。大饥荒时，美国想援助中国几千万吨小麦，被毛的特别代表王炳南戏弄并拒绝。苏俄想用原子弹对中国作外科手术式的切除，被美国吓退。

公布中美关系史，一是揭穿中共的无耻谎言，二是增加中国人民对美国的信任，三是增强中国的民主风潮，四是增强中国人民对历史的追忆。这四点都是打击中共的好战术。

7、强迫日本公开二战时与中共的交往资料

现在，日本也高调喊出保卫台湾民主。日本人真的要保卫台湾吗？要知道，威胁台湾的是中共，而不是两岸民主后的中国，就是说，只有中共才是敌人，反共才是保卫台湾的唯一途径。

日本有一个灭共的最好办法，公开二战时与中共所有的交往资料，公开日军与曾庆红父亲曾山所签的秘密合约、公开潘汉年杨帆交给日军的资料、公开黄桥

决战时粟裕为什么敢在日军眼皮底下进攻国军并且不留后备队、公开彭雪枫为什么配合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背后进攻国军、公开日军为什么只大轰炸遥远的重庆而不轰炸日军运城大机场附近的延安、公开日军为什么不进攻离日军地盘只有80 多公里的延安、公开两王五千人的大部队为什么可以在日军眼皮底下纵横万里？公开毛泽东为什么第一个接见的日本人是差点炸死蒋介石及国军高级将领的远藤三郎……

这些秘密都是中国人自己挖掘出来的，日本人对任何文字的东西保存得非常完整，绝对完全在日本人的手里。为什么不公开，就是为了胁迫中共而获得更多的利益，让中共放弃战争赔款就是一个最大的收获。

日本只要不公开二战时与中共的交往史料，日本就是在保护中共，就不可能是保卫台湾民主。而是以这个为借口，谋图新一轮的军事崛起，谋图军事霸权，谋图八紘一宇。我们不能被它虚假的口号所迷惑。

善恶之间，没有中间线，正邪永远不可两立，中共就是祸害世界的根源，不选择推翻中共，就是助纣为虐，必将祸及子孙、祸及世界，不解决中共，就将被中共解决。

中共为什么不敢要战争赔款，是怕日本人公开这些资料。

美国一定要强迫日本公开与中共的交往史，主要是二战时，当然也包括后来。

当中共这些罪恶的勾当公开时，就是中共的末日之时。

8、推动两岸“一国一制”和平统一

灭共是伟大的事业，也是人类的共同事业，没有人能置身事外。台湾人更不能想着置身事外，否则，最被威胁的是台湾人。如果通过和谈，把中共谈灭了，对台湾人来说岂不是天大的喜事？

中共有两怕：死了孙中山与蒋介石，偏安了的中华民国。中共一直抹黑孙中山、蒋介石与中华民国，为的是保命。讨论两岸统一，三者的功劳就摆在中国人民的前面，与中共的罪恶相比，必然让中共毙命。

既然是统一，那必然是一国一制。一国两制是分裂而不是统一，现在中国的现状就是一国两制。中共打出的一国两制是想沦陷台湾，把台湾与大陆都变成一样的制度，香港就是例子。

真正的统一必然是一国一制的统一。要么社会主义统一两岸，要么民主制度统一两岸。既然是和平，必然是让百姓自由选择，两岸的百姓必然选择民主。这是我们最希望的结果，也是中共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这时中共会露出它不想统一的真面目，会遭到大陆人民唾弃。

美国支持一国一制的统一，其实是在启发大陆人民追求民主，中共敢吗？

美国与中华民国应该向世界宣布：追求一国一制的两岸和平统一。如果大陆与台湾人民都喜欢民主制度，就用民主制度统一，如果都喜欢社会主义制度，那么两岸都用社会主义统一，如果无法达成共识，就暂时不统一。

既然要统一，就得讨论国号，讨论制度，讨论宪法。

中华民国十大荣耀，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都没有。

中华民国的十大荣耀：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中日战争战胜国、联合国四大发起国、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亚洲及中国 2000 年历史中第一个共和国（共和制之国）、亚洲及中国 3000 年历史中第一个民国、

废除中国所有的不平等条约之国、把台湾从黑暗的日本殖民统治下解救出来、守住并建设台湾为民主基地免遭马列病毒的荼毒。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位置也是盗坐了中华民国的。《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三条规定安理会第一个常任理事国就是中华民国（注 4），虽然中华民国主动退出了联合国（蒋中正英明），但联合国却保留着中华民国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位置，中共无可奈何且无耻地坐上去（中共无法修改《联合国宪章》）。中共的这桩丑事闹得可够大的，某一天被赶走都有可能。

中华民国结束了 2000 年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制度，从独裁、腐朽、堕落、崩溃、灭顶之灾的大清国中站起来，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统一了中国，付出惨痛的代价打败了侵略中国的军事强国日本，阻止了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对世界的危害，解除了列强对中国的所有不平等条约，结束了世界列强百年来对中国的欺侮，让中国人真正地站起来，也把台湾从日本的殖民中解救出来，坚持反共、守住台湾不受共产主义荼毒，把台湾变成民主堡垒、反共基地。

中华民国所经历的是中华五千年历史中最艰难困苦时期，中华民国扛过了中华民族灭亡的危险，在最艰难的时刻战胜了凶残的日本法西斯，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中最伟大的功勋和最辉煌的业绩。有一个美国历史学家说过：“如果不是国民党在内战中战败，如果不是国民党逃到台湾，那么全世界的历史学家都会以无比崇敬的心情，歌颂中华民国的抗战。”（辛灏年演讲）。可见，中华民国的抗战史是人类历史的最辉煌篇章。

中华民国对中华民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人类的正义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华民国是中华民族的功臣，是人类的功臣，光芒四射。中华民国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真正的中国是中华民国。

所以，只有中华民国才有资格统一两岸，并延续中华民国的种种荣耀。如果国号更改，便截断历史，就会丧失上述的光芒，将来中国的历史不再那么辉煌，在世界上的地位也会自我矮小，对中日关系的处理增加难度和变数。中华民国才是正统，才有资格统一中国。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还可能追回日本战争赔款。

（讨论国号，本人刚好写了一本书《两岸统一该用什么国号》，从十几个方面进行论证，已经有 43 万字之多，最后得出结论：两岸统一最好用“中华民国”作国号。这本书，正好派上用场）。

国号，两岸人民一经讨论之后，必然选择中华民国。

这时的中共，就不敢统一了，甚至不敢讨论统一。这时的中共，就会露出台独的真面目。而且，讨论统一，也会加大大陆的民主风潮，中共极可能被这个风潮打翻。

中共垮台，中国如果分成多个国家，就可能发生内乱，并且危及全世界的安全。而中华民国是非常好的民主国家，理应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权，当然应该光复大陆。

台湾那么小，对增加中国的国力不会有太多的帮助，所以不用担心。

所以，美国应该扶持中华民国光复大陆。如果当政的台湾政府不乐意，应该强迫台湾政府执行。并且告诉台湾人：两岸统一后，台湾会不会独立，那是台湾人自己的事，美国不干涉。

9、解剖马克思理论及辩证法

这一条很重要，马克思理论已经在实践中证明它是极端错误的、极端荒谬的和极端罪恶的。但是，只是实践证明，理论的东西还得理论来解决，否则，共产主义死而不僵。

要在世界范围内消灭共产主义，其中包括美国的共产主义，没有解剖马克思理论这一条根本就行不通。一个地方的共产主义垮台后，其他地方的共产主义又兴起，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共产主义还是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在中国、在朝鲜、在印度、在美国、在全世界继续兴风作恶。印度共产党员有 200 万之多，控制群众组织人数达 4000 多万人，号称在 2050 年之前武装夺取政权。美国现在的骚乱，是无知且无耻的共产主义者在胡闹。

因为马克思理论还没有被彻底打倒，共产主义死而不僵，仅从实践中打倒还不够，还得从理论上彻底打倒它，否则，共产主义根本不会退出历史舞台。

仅打败中共是不够的，共产主义才是最后的敌人，而马克思理论是共产主义的根，要想打败共产主义，必须先打败马克思理论。再说。如果马克思主义没有错，凭什么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会垮台？

共产党国家全部都是贫穷落后血腥罪恶的，所以，马克思理论是罪恶且荒谬的。这就好办了，既然是荒谬的，那么一定能找到其荒谬之处，把它揭露出来，只有这样，共产主义才能在世界范围内彻底消失，否则无法根除。

因此，找一批人，对马克思理论进行研究，《金剑：马克思谬论》有所帮助。戳穿马克思理论，戳穿习近平的制度自信，让人类见到光明。

如果马克思理论被戳穿，说不定习近平与中共主动投降，全世界的共产党主动投降。

其实，马克思主义从头到尾都是错，稍为用心就能看出错误。本人水平不高，已经论证了马克思的许多错误：剩余价值与剥削、无产阶级先进论、无产阶级专政论、阶级与阶级斗争、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对国家与法律的错误定义、错误的马列真理观等等。

辩证法也是错误的，它的三大规律都不能成立，辩证法是人世间最大的谎言。辩证法是进化论、纳粹理论与马列主义的根。所以，要打倒共产党，必然也要打倒马克思；要打倒马克思，必然也要打倒辩证法。只有打倒辩证法，才能彻底挖断共产党的根，彻底挖断纳粹的根，人类才能安全。希望《金剑：人世间最大的谎言——辩证法》有所帮助。

.....

也许，这些招数不用全部实施，中共就已经垮台。但是，即使是中共垮台后，这些步骤还是要走完。特别是第九步。

大家看这九步，只有“解剖马克思理论及辩证法”有一点难度，其他的都是像玩似的，而且还伤不着中国人民。

多好的灭共九步舞！

注 1：安德鲁·罗伯茨：《毫无悔意的日本极端民族主义》

<https://cul.qq.com/a/20161116/030330.htm>

日媒歪曲二战历史俄外交部：日本有些人仍活在假想中

<https://mil.ifeng.com/c/7yvWGXDKDWu>

注 2:《简析日本近代的皇国观念》——史桂芳

<https://www.ixueshu.com/document/1ac2992c2edbc0acaba5ee087e5e0ac1318947a18e7f9386.html>

从《新历史教科书》看“皇国观念”在日本的影响——史桂芳

<https://www.ixueshu.com/document/d2ef2e3ca188c3e14ed1ba6a94d7eccb318947a18e7f9386.html>

日本侵略中国是处心积虑且由来已久——读《日本侵华思想理论探源》

<https://www.ixueshu.com/document/2824c82399116b76d9d11a37156fa83e318947a18e7f9386.html>

学者解析：日本对外侵略的文化特质

<http://theory.rmlt.com.cn/2014/0721/294225.shtml>

注 3: [中共政权灭亡的十大征兆全齐了！](#)

<http://cn.ntdtv.com/gb/2020/09/15/a102940962.html>

注 4:《联合国宪章》

<https://zh.wikisource.org/wiki/%E8%81%AF%E5%90%88%E5%9C%8B%E6%86%B2%E7%AB%A0>

金剑

2020 年 9 月 17 日星期四

廿一、附：中共十九大恶行：分裂民族杀戮人民摧毁文化通敌卖国...

中共的十九大恶行：

分裂民族、杀戮人民、摧毁文化、通敌卖国、分裂中国、种毒贩毒、出送国土、发动内战、劫夺财富、灭绝子孙、篡改历史、封民五巧、消灭思想、消灭善良、教坏人民、欺骗百姓、破坏环境、党棍吸血、推广谬论。

中共的恶行，罄竹难书。这里列的只是中共的十九大恶行，条条坐实，每一条都是万死之罪！！！！

一、分裂民族：

中共用阶级斗争把民族分裂成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诱惑且强迫人民窝里斗。搞群体迫害、群体灭绝。它说法律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那么美国的法律代表哪个阶级？她不代表阶级，她体现了全体公民的共同意志！阶级斗争就是群体灭绝，非常荒谬和罪恶。

二、杀戮人民：

中共当政后，使人民非正常死亡超一亿，是日本兵杀中国人的四倍。1958—1962 年人造饥荒饿杀六千万农民，比日本人杀中国人还多，还省事、还省时、还省钱、还不用牺牲自己人。仅文革时在内蒙就屠杀 30 多万所谓的“内人党”。中共当政前也杀戮了许多无辜的人，内战时，中共兵围长春饿死 30 万无辜百姓。扶植和指导柬埔寨共产党（即红色高棉）屠杀了柬埔寨 1/3 人口，其中包括柬埔寨大部分华人。纳粹杀是民族外的人，共产党杀的是本民族的人。

中共用计划生育屠杀的人更多。

三、摧毁文化：

中共对中华民族文化进行彻底摧毁，其行为令人发指、罄竹难书。多少古书古物古迹全被毁，连门派众多、习练者广泛的高深武术都失传，其他名气小、人数少的绝技多数灭绝，中华民族五千年辉煌的文明毁于中共之手。中共毁坏中华民族文化是八国联军的一万倍而不只。八国联军被我们骂了一百年，而中共却骗百姓对它歌功颂德七十多年！邪！

四、通敌卖国：

苏联成立中共的目的，是想把俄罗斯侵占中国的土地永远归于它，并且把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共不折不扣地做了苏联人的走狗，在中共的帮助下，苏联人终于完美地实现了这两个目的。

抗战时，中共为了它将来能上台，暗中勾结日本打击国民政府，参与此事的仅新四军中就有饶漱石、潘汉年、杨帆、曾山（曾庆红父亲）。毛 1959 年在庐山会议上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毛多次说感谢日本军阀。

中日关系“正常化”时，中共放弃了日本的 6000 亿美金战争赔款，并不是

中共宣传中所说的“大方”，而是它有把柄在日本人手里，不敢要。直至今日，在中日关系上，只要日本一硬，中共就软下来。

五、分裂中国：

中共趁国难之机-九.一八事件后的第三个月，在苏联的国庆日，成立了苏联的殖民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甚至呼出低贱的奴才口号“武装保卫苏联！”，并号召中华民国治理下的人民，“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学生罢课、军队起义”，严重破坏了经济、扰乱了社会秩序，用实际行动支持了日本侵略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中说：“在中国国内所有的少数民族和各地区的人民，都有独立建国的自由，都可以自由脱离中国，加入那个先进的联邦（指苏联）”。日军在中共的号召和示范下，也成立了伪“满州国”。

中共帮助苏联把蒙古拖离中国。抗战时，中共在新疆协助盛世才搞独立。中共1928年指示台共宣布三大主张“台湾民族、台湾革命、台湾独立”。台湾二二八发生后，中共中央又宣布：“我们赞成台湾独立…我们赞成台湾自己成立一个自己所要求的国家”。1950年初，毛在苏联时，想不要西藏，被斯大林硬推回来。中共是满独、台独、藏独、蒙独、疆独与一切分裂中国势力的老祖宗和精神领袖。

中共迷惑于马克思的“为被压迫的民族求解放”，其实中华民国内部的民族是平等的，根本就没有被压迫的民族，正好相反，中国的近代是被外邦欺压的时代，是中国所有的民族和人民团结一致才能求生存的时代，中共在这个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竟然挑起我国民族之间和民众之间的窝里斗，就是用实际行动支持侵略者和帝国主义灭亡中国。

共产党革命的第一个目的是消灭国家，日本侵略中国是消灭中国，它们是同路人。**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第一个目的是推翻中华民国，日本侵略中国的目的是打败中华民国，日寇与中共是同路人。**国民党、中国人及美国人看不清这一点，结果上当受骗，被中共抢走了江山。

共产党的阶级斗争是分裂民族、民族斗争是分裂国家、国际主义是卖国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是独裁加暴政，马克思理论很谬误、很血腥、很罪恶。

六、种毒贩毒：

抗战时，中共在延安南泥湾种植鸦片，并售往抗战大后方——国统区，一方面为自己带来暴利，一方面打击抗战的国民经济和民族的抗战信心，为它日后夺取江山打下基础。中共当政后没多久，就把当年替它贩毒的地痞、流氓全灭口。

七、出送国土：

送出去给俄罗斯的土地相当五十多个台湾省的大小。把俄罗斯占我们的土地全部承认。正式承认蒙古独立。把与朝鲜没有争议的中国长白山部分地区给了朝鲜。把与越南有争议的土地给越南。把与缅甸有争议的土地（果敢族（即汉族）世代居住地__果敢、班洪和掸邦其他地区）给了缅甸。

北部湾的白龙尾岛，被毛送给越南。岛上的几千居民都是中国人，不愿意加入越南。中越两国政府在岛上庆祝岛屿移交时，没有一个当地居民参加，他们说：“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变成越南人？”居民们带中国基因、流中国血、讲中国话、用中国文，中共把他们变成越南人，不顾及他们的意愿，也没有把他们迁移回来，一点道理、一点人道都没有。中共真是地地道道的卖国贼，在中共眼里，

老百姓的命、意愿屁都不算。类似的情况还有。

中共的用“领土换政治”的卖国蠢招：

与中国有领土接壤的国家有 14 个，朝鲜、苏联（俄罗斯）、蒙古、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锡金）、不丹、尼泊尔、缅甸、老挝、越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

让人无法接受的是，中共在与周边国家的领土谈判中，全部做出了巨大的退让，想获得这些国家在政治上的支持。结果是事与愿违，换来这些国家更大的贪婪和索求、换来这些国家更大的敌意和围剿。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周围国家的关系都不好，就是中共卖国求荣造成的。

“用领土换政治”，与“卖国求荣”差异不大，这从理论上讲，就是卖国行为，赵构秦桧当年也是“用领土换政治”，同样是卖国的。赵构卖的是自己的国，中共卖的是腐败清朝固有的疆土，在清朝没落之时、在中华民国内乱与艰难抗日之时都没有敢做的事情，被中共在强大之时做出来了，中共卖国比清朝还利害。看到这段，中国人心里不滴血吗？五毛看到这段不知如何感想？

中国人睁大眼睛看看，大陆历史学家是如何说的？《沈志华：毛泽东用领土换取邻国支持内幕一事与愿违：冷战年代中国处理陆地边界纠纷的结果》（注 18）。中共一次次地送钱、送领土给别人，买来的都是仇恨。

1957 年中共政府才会轻易将白龙尾岛赐予“同志加兄弟”的越南；1959 年毛泽东才会向印度共产党表明“麦克马洪线”没有任何意义；1962 年中共领导人才会认为与朝鲜进行的边界谈判只是在办“内交”而不是“外交”。实际上，真正对中共领导人处理边界问题形成挑战的，不是别人，而是他们自身的中央王朝观念和世界革命理想。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至少到 1970 年代，中共现代领土属性转型的历史过程尚未彻底完成，中共与周边邻国的关系也没有正确地定位于现代民族国家关系，即一种正常的国家关系。

八、发动内战：

中共从成立的那天起，就带给中国人战乱，就使中国内战不止。

所谓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实际就是中共搞的内战时期。甚至利用日寇发动九一八的国难时机，扩大地盘，发动对国民政府中小城市的进攻，一度拿下过湖南省城长沙。

当日本 1945 年 8 月 10 日决定投降的当天晚上，中共打着《向日寇的最后一战》的旗号，发动了内战。之后在美国等国际与国内压力下，虽然出现了短暂的和平，但是，中共从来没有停止过聚蓄力量，打内战的准备。由于中共崇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内战不可避免地暴发。中共走“枪杆子”暴力取政的道路，是因为它知道：人民不可能选中它。陈水扁上台靠选票，中共还不如陈水扁呢。

九、劫夺财富：

共党以前“劫富”，现在“劫贫”。共党以前用马克思编造的“剩余价值理论”“证明”富人即罪人，把富裕农民定为地主，非常残忍地、肆无忌惮地对他们谋财害命。

现在反过来“劫贫”，它造谣说“穷人即懒人”，放任及勾结权贵阶层劫夺贫穷百姓的财产：暴力拆迁、暴力抢劫地皮及房产、哄抬物价。歧视及迫害真正的无产者-三无人员。

总之，个人神圣的财富在共党的眼里，只是夺取政权和捍卫政权的筹码，随

时编造一个谎言就可以劫夺。

十、灭绝子孙：

计划生育是谬论！朝鲜的国土面积是韩国的 1.2 倍，为何 2200 万人的朝鲜比 4900 万人的韩国贫穷落后？为何人口少密度低的蒙古非常贫穷落后，日本人口多密度高（人口密度是中国的 2.6 倍），反而发达呢？为何日本和新加坡等人口密度高的国家反而提倡生育呢？

印度的人口已经超过中国，他们的领土不及中国的三分之一，按照这个密度，中国的人口可以达到 3 倍。一说到这个问题，就会有人说中国如何有山地与沙漠。但是，中国的人口即使是迁到东边，人口密度也比印度低。印度也有山地与沙漠，在人口分布方面，中国与印度有很大差异。中国的人口分布较为均匀，北方较为稠密，南方相对不太稠密。而印度的人口则主要分布在南亚次大陆，也就是在南方地区，占总人口的 70% 以上，导致了印度人口分布的不平衡。

其实人口多密度高（城市化率高）社会效率就高，经济就发达，这是铁的经济规律，中共连这么简单道理都不懂。中共用计划生育使中国人二户绝一户，何其毒也，计划生育其实是禁止生育。

现在，这个罪恶的计划生育政策恶果出现了，中国大量缺乏劳动力，工厂招不到人来打工，许多工厂只好搬迁东南亚等国家。

中国大陆从 1971 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1970 年末，印度人口 5.55 亿，中国 8.3 亿，刚好是印度的 1.495（约 1.5）倍。中国的卫生水平、国土面积、发展前景与生活水平都比印度好很多，计划生育前的 1970 年，中国人口增长率（2.6%）也比印度（2.2%）高很多。2021 年底，印度人口是 13.93 亿，中国人口是 14.13 亿（估计是中共放大了）， $13.93 \times 1.495 - 14.13 = 6.695$ （亿），中共仅用两户绝一户的计划生育，就最少屠杀了 6.695 亿中国人。如果用计划生育前中国的人口增长率来推算，中共屠杀的人就更多。到 2021 年，中国的人口增长率降到 0.03%，远远低于维持人口不下降的平均一对夫妇 2.1 个小孩的生育率水平。现在，中国人口极速老化，缺人缺工，把世界工厂无偿送走，中国未来堪忧。中共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华民族祸害巨大。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很快消失，很快走入老龄化社会。

中共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通过“两户绝一户”的办法灭绝中国人。



（中共的计划生育宣传画——狠毒无比 愚蠢无比）

中共说中国人口太多，人口多妨碍经济发展。中共真是胡说八道。要知道，人口是否多是以人口密度来计算的，中国的人口密度在世界排名是 60 多位，印度的人口密度是中国的 3 倍多，日本是中国的 2.7 倍，而日本许多小岛上根本就不能住人，真正的密度更高。总人口越多，经济越发达，国力也越强，密度高经济也发达。日本的经济发达主要得益于它的高人口密度与总人口量。仅从经济的角度上来看，如果中国是正常国家，中国的国力将是日本的十几倍，美国也将远远落在之后。韩国人口密度是朝鲜的 2.5 倍，韩国的经济发达，人口密度高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即使朝鲜也是资本主义，经济上也赶不上韩国，因为朝鲜人口少、密度低。其实中国的人口并不过多，而是少了。以 10 年前的科技和生产水平，中国的国土最少可以承载 40 亿人而不至于经济倒退，随着科技的进步人口可容量还会增加，就是按照印度的人口密度，中国也应该可以容纳 40 亿人左右。

中共的计划生育非常残暴，竟然喊出了许多疯狂地灭绝人性的口号，其残暴程度可见一斑：“该流不流扒房牵牛”、“一人超生全村结扎”、“谁不计划生育，就叫他家破人亡”、“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一胎环二胎扎三胎四胎--杀！杀！杀！”、“一人结扎全家光荣”、“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中共在打一场“计划灭绝”的人民战争，战争的对象是人民。把这些记录下来，人类一定要记住，人世间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如此愚蠢且残忍的政权，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如此残暴的时代。

中共愚蠢的“计划生育”（实际是“两户绝一户”的“计划灭绝”）是巨大的祸国殃民政策，竟然没有发现荒谬至极，实施了几十年导致中国人口锐减、劳动力缺乏、老年化严重、独生子女难教养、降低中国人素质、经济增长乏力……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难题，使中华民族再次面临巨大的危局。愚蠢的中共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还敢抢江山来坐，真是胆大包天。

十一、篡改历史：

毛贼东号召篡改历史：“文艺为政治服务”。中共把历史作为它美化自己和打击别人的工具，把历史篡改得一塌糊涂（且看《金剑：略述中共谎言录》）。

十二、封民五巧：

被中共称为万恶旧社会的民国时代百姓都可以自己办媒体，中共一上台就剥夺了人民这个权利，所有的媒体都成它的喉舌（舌），信息过滤后才给百姓，现在连互联网都上锁。堵住人民的口耳眼，七巧封了五巧。至今还实行“华人比狗不得言论”的政策，建立了中华囚民共和国、中华残民共和国。

十三、消灭思想：

马克死主义是彻头彻尾的谬论，经不住仔细推敲，有独立思想的人就成了它的天敌。中共为了把中国人变成没有思想并被它操控的机器人，它一边向中国人灌输马克死谬论，一边通过打击会道门、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六四，一次次地消灭中华民族中的精英——有独立思想的、敢为民请命的知识份子，从精神和肉体上消灭。

十四、消灭善良：

中共一贯编造谎言煽动仇恨鼓吹斗争滥用暴力，它真正崇拜的是假恶暴，仇恨是它的中心，它把所有的善良当成敌人。教人向善的教育、理论（其中包括向善的宗教），能使社会良性发展，中国几千年能延续下来，主要得益于儒佛道和民间向善教育，天主教基督教使西方社会长期稳定繁荣。中共把这些视为眼中钉，一直在努力消灭，直到今日都在继续。

没有善良就是没有资格有明天，中共消灭的就是中华民族的明天。

十五、教坏人民：

马克思主义是教人肆无忌惮地行邪作恶的理论说教（即邪教），中共把它强硬灌输给中国人，从幼儿园就开始。并且过滤封闭一切正常信息，把中国人变成又聋又哑又瞎又蠢又愤怒又贪财的人。在中共贪官示范下，不少中国人昧着良心赚钱，毒大米、地沟油、毒疫苗、三聚氰胺奶粉、无良传销肆虐中华大地，成千古笑柄。中华民族在自杀。

十六、欺骗百姓：

捆绑了人民的手脚口耳眼睛和大脑之后，告诉人民说“解放”了。把农民变成二等公民，告诉农民说翻身作了“主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实不是教育，而是解决城市就业和疏散城市人口的移民政策。中共以谎言取国，又以谎言治国。

十七、破坏环境：

中共鼓吹战天斗地、人定胜天。天太高够不着，就对大地胡整。对不适合农业的内蒙大搞农业，造成植被遭破坏，使沙尘暴肆虐北京华北。长期在全国范围乱垦乱伐，使植被遭严重破坏、绿地湿地锐减、江河枯竭。乱造水库，甚至鼓吹边设计边测量边建设，造成遍地豆腐渣水库，危及中国人人身安全。现在每年沙尘暴、旱、涝、泥石流频发，都是中共一手造成的。中共还放纵污染工厂放毒，并且镇压群众的自发禁毒活动，使中华大地黑水、毒水长流，地下水都遭污染，每年儿童恶性肿瘤人数激增。中共破坏环境，已经严重危及中国人及子孙后代的生存空间，再继续下去中国大陆可能不再适合人类居住。

十八、党棍吸血：

党务工作者（书记等官）拿纳税人的血汗钱（财政工资），为党工作却理直气壮地拿人民的钱（无耻），这在世界其他国家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朝鲜、古巴等共党国家除外）。

贪官污吏吸尽民脂民膏。农民工几百块钱的工资都被克扣，贪官一贪就是多少亿。以前当官的还偷偷摸摸地贪污，现在以企业改制的名义，光明正大地瓜分国有和集体企业，太子党个个盘满钵满、富可敌国。

十九、推广谬论：

一分为二、辩证法、唯物主义都是彻头彻尾的谬论（见《金剑：人世间最大的谎言——辩证法》），中共推广它们，使得中国人的智力下降、并且丧失是非心，对中华民族危害巨大。

“识时务者为俊杰”是日本“读空气”的势利文化，中共推广它，使得中国人的道德下降。

马列主义是最邪恶的谬论（见《金剑：马克思谬论》），中共推广它、使用它，使得中国人不但道德堕落，还相互仇杀，把中华民族推向深渊。

中共的恶行，罄竹难书，只能用“无恶不作”一词来形容，这里列的只是中共的十九大恶行，条条坐实，每一条都是万死之罪！！！！

注释：

注 18：沈志华：毛泽东用领土换取邻国支持内幕

<https://www.aboluowang.com/2018/0505/1109498.html>

<https://5455.org/history/85858.html>

冷战年代中国处理陆地边界纠纷的方针

事与愿违：冷战年代中国处理陆地边界纠纷的结果

<http://www.aisixiang.com/data/89119.html>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history/xiandai/20150610125631.html>

逆天而为痛悔迟 65：1950——顺天出战逆天惨 两共欺天待天谴

<https://www.epochtimes.com/gb/19/6/9/n11310735.htm>

金剑

2011 年 2 月 2023 年 12 月修改

后记

特别声明：本书有些内容是从其它地方抄来的，积腋成裘，由于本书收集资料的过程时间太长，存在着当时只顾收集，忘了注明出处的情况，如果有人发现本书引用了某人某文某书的言论而不注明出处，那是我的疏忽，在此特表歉意！写本书并非出于经济目的，看到好的言论当时就只是收集，以致后来整理时找不到出处，出现这类情况，也请作者谅解！

中共对中华民族犯的最大的罪行，就是灌输荒谬无比的马克思谬论与辩证法谬论，扰乱了中国人的思维，破坏了传统价值和道德观，破坏了人们心中的美好的东西和对美好的向往，纵欲、贪婪，只求今朝，不想来日或来生……

共产党叫嚣“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实就是杀天、杀地、杀人。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就是一个大规模屠杀的历史，数以千万的人被共产主义者残酷杀害，连环境都遭破坏。如果你问马克思主义留给后人什么，那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凶残的杀人机器。在共产主义控制的每一个国家，都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被杀害。在和平年代被大规模屠杀的人数比历史上所有战争加起来死的人还要多。

笔者认为：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机器，每一个人（甚至生命）都是这部机器的一个小零件，每一个群体是由小零件组成的部件。零件与零件之间，零件与部件之间、部件与部件之间，必需和睦与协调，这部机器才能健康地、高效率地运转，反之他们之间出现争斗、仇恨和残杀，这部机器就会低效率、病态甚至毁灭，这就是“家和万事兴，家斗万事败”，地球只是一个村。马克思哲学是斗争哲学，是煽动各零件和各部件之间的斗争、仇恨和残杀，所以马克思理论就是毁灭世界的理论，是反人类的理论。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已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但现实是资本主义却反而发展愈加迅猛，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却一个个灭亡，让马克思颜面无光。马列主义学说认为资本主义已进入已发展到了腐朽的、垂死的程度，要依靠革命夺取政权。列宁已经去逝 98 年了，他所说帝国主义没有一个死亡，反倒是自己的社会主义阵营没有了。

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垂而不死”。本人认为，最重要原因资本主义社会提倡“平等、自由、博爱、民主、法治”的价值观念，实行民主宪政体制。通过在金融业、股份制、民主宪政等经济、政治的元素中，进行相互制约、自我更新，自我调节，自我新陈代谢，使矛盾的各方在竞争中互学借鉴，磨合碰撞适应认同，从对立走向认同，以达到社会长期稳定发展，和谐富裕。

由此可见，阶级斗争思想和无产阶级专政哲学极大地损害了社会的发展，造成了大量的社会悲剧。

马列主义把人的社会和精神独特作用、感情和意识这些无形的因素排除掉，抛弃宗教的精神寄托和道德伦理制约；解放兽性，丧失人性，扩散恶的东西，如仇恨、暴力、非理性、残忍。马列主义是弃善扬恶的丛林法则哲学，往往造成良知与理性，德性、悟性与人性的丧失，造成天、地、人秩序的混乱，使人类的精神萎缩凋枯致使物质世界的异化。造就道德沦丧、放纵权力，造就专权，产生腐败。最终在唯物的泥潭里沉沦而被埋没，缺德和斗争成为了习惯，导致社会失序

走向崩溃。

虽然共产党现在表现的是独裁制，但是，共产党最邪恶的是它的理论——马列主义，共产党无论是采取民主制还是独裁制，都是邪恶的，不要认为中共走向民主它就变好了。文化大革命就是中共的民主制，它的邪恶性甚至远比其他时间段高，是毛鼓动起来的学生民主运动，毛就用共产党的民主运动打败魔性不够强的刘少奇及其他中共干部。大革命时期的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罢工后，工人自动把每天的工作时间降为4小时或者以下，还可以任意缺勤，连领导罢工的刘少奇都无法阻止，这就是工人们的民主行为。陈赞贤在赣州领导工人大罢工，总工会代表工人要求商店店员工资增加到原薪的14倍，和每年最少3个月的有薪探亲假。这就是工人阶级的民主行动和强烈的当家作主愿望。所以，最害人的是马列主义，无论它是实行民主还是实行独裁，都是害人的。

马列主义、纳粹都是妖魔邪说。很不幸，马列主义在人间到处横行，迷倒不少人，人世间被纳粹和马列主义搞得血流成河、腥风血雨、哀鸿遍野，使人类几乎走向灭亡。现在虽然纳粹已经灭亡，社会主义也在世界上奄奄一息，但最恶的中共还在，中共还在高呼“理论自信”——坚信马克思的妖魔邪说，世界上还有一大批马列主义的追随者，马列主义的幽灵在世界上还未驱除，随时得以还魂，继续行恶。人类的使命任重而道远。

我认为近代世界上最邪恶的人，它们依次是：列宁、马克思、毛泽东、福泽谕吉、斯大林、希特勒、明治天皇、洪秀全、黑格尔、波尔布特。前面三大邪头是马列主义者，十大邪头五个是马列主义者，可见马列主义有多么邪恶。

共产党很邪，它的理论如此这般的荒谬，只要多想一会就能推倒，共产党却把它认为是宇宙真理，并且强迫世人认同它、实行它，对不认同者或者批评者杀戮。共产党强令它治下的人民只能相信它的理论，用尽一切手段达到这个目的，甚至对无知的儿童进行诱导，让小小年纪的他们加入共产主义的所谓少先队，发誓把生命献给共产主义，打上共产党魔性的兽印，上共产党的贼船，任何一个邪教组织的罪恶手段都无法精致到这种程度。共产党是集古今中外一切流氓下流法则于一身的邪教组织。

在《冰山上的来客》的电影里，当解放军达到西藏某地时，喇嘛高喊“红魔来了”，共产党真的是红魔，喇嘛不愧是修炼人，知道共产党的根底。

共产党的邪恶根源是马克思理论，对马克思理论进行解剖，以肃净人世间的魔性和共产党的流毒，才能跳出马克思谬论的黑色桎梏。现在我们就戳破共产党的理论，看看它是如何的荒谬。希望我以自己呐喊，抛砖引玉，让更多的人起来批判马克思谬论，开启肃净马列主义流毒之风气，让光明在人间再现，让人类走向正道。

邪不胜正，“魔高一尺，道高万丈”！神佛一定战胜妖魔，人性一定战胜魔性，但是，人一定要做出正确的选择，为了您与家人的永远，为了世界的永远，人一定要站在神佛的一方，站在善的一方。不要怕，神佛与我们同在！

本人经过认真思索，看出了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能成立的谬论，辩证法和唯物主义也是非常荒谬的，计划生育理论更是非常错误的，所有这些理论根本不值得一驳。相信能看到这些人很多很多。

张东荪在1931年出版的《道德哲学》一书里，说“共产主义不能实现。如实现则劳动者都就会饿死。”、“把马克思主义列为学说，乃人类之奇耻，是思想史上的大污点”。他真是智者。

中国的封建制度是秦始皇结束的，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必然出现的奴隶社会，

人只有民族性没有阶级性。马列主义的谎言随处可见。马克思理论是假理、是谬论，不能拿出来讨论，更不能拿来研究，一讨论就破，一辩论就倒，中共只能暴力维持，放开媒体中共就得死。

出版自由就是言论自由，是人的基本人权，中共敢在大陆出版本人的《马克思谬论》吗？敢拿马克思理论出来辩论吗？

在这里，笔者向习近平及中共的中科院提出挑战，本人已经看穿了马克思诸多理论的谬误，你们敢把俺的文章在大陆主要媒体上刊登吗？这些理论包括：剩余价值与剥削、阶级先进论、阶级与阶级感情（阶级性）、无产阶级专政论、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中共的法律是恶法、对国家和法律的定义、唯物论、辩证法、中国人应不应该纳税。顺便给你们提醒一下，让你们心里有底，不要无知加狂妄：本人给一些人讲过辩证法，听过的人，就不再相信辩证法了。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你们捧之为圣经般的东西啊，轻易地倒下了！马克思理论就更不用说了，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皇帝的新衣，五年级水平就能驳倒它！

真理越辩越明，只有谬论才需要暴力来维护。现在中共公开叫嚣：“坚决打击敢于对马克思理论进行挑战的人”，就是说中共也看到马克思理论很假，怕人家点破，才出此下策。中共用暴力来维护马克思理论，说明马克思理论就是谬论，也说明中共在否定出版自由，在否定服贸中的出版条款。

戈尔巴乔夫及叶利钦在取缔苏共的文告中宣布：“马列主义这一套荒谬绝伦的邪说过俄罗斯七十年的试验，从理论到实践都彻底失败了，并用历史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是彻头彻尾祸害人类的谬论邪说。……为推行这个极权暴力恐怖的社会制度，给不少国家造成内战、饥荒与极大的罪恶和灾难，世界任何角落只要出现共产党，就把烧杀、掠夺、暴乱、篡国夺权、血流成河带到哪里。……”这是过来人的呐喊，国民党听见了吗？这是用几亿人的生命才换回来的真理，中国人明白了吗？共产党把世界祸害到如此地步，扭过脸来高喊三个呆婊：“始终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始终代表最广泛人民的利益……”世上有一个厚颜无耻到如此地步的生命，这是整个世界的羞辱，是所有人的污辱。习近平还高喊“俄罗斯无男儿”，可见他愚昧到什么地步？

前几年，中共向中共的社科院开刀，指责社科院“穿上學術的隱身衣，製造煙幕；利用互聯網炮製跨國界的歪理；每逢敏感時期，進行不法的勾連活動；接受境外勢力點對點的滲透”。也许是有一点点智力的中共科学家们看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荒谬，说了点什么，中共找他们算账。社科院是中共最高级别的御用智囊团，连智囊团都在拆台、造反，中共还能撑多久？看吧，中共的后院燃起了熊熊烈火！中共的气数已尽！

中共到处打黑社会、黑恶势力，共产党就是最大的黑恶势力！

马克思主义已经失败，被包括共产党国家在内的全世界人民所抛弃，连中共的党员中也很难很难找到真正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现在贪官遍地，是因为贪官不相信共产主义了。薄熙来也不相信共产主义，他在大连是要把大连建成小香港，他唱红是为了骗取政治资本。**稍有思维能力的人就能看出马克思主义的荒谬来，习近平却还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宇宙真理”来供奉，并要全党学习，真的要把共产党变成真理教，可见他智力是如此低下。

习近平学习了马列主义与辩证法，就以为掌握了宇宙真理，到处树敌：在内，打击民运人士、连律师都抓了不少、向社科院开刀、断网络、封微信、继续暴力拆迁、揭开新疆维吾尔族妇女的头巾、打击西藏民族宗教、继续强征强拆农民土地住宅，否定香港基本法和一国两制。在外，膀挎北极熊对抗世界、东逗日本、

南压东南诸国、携朝鲜玩耍美国及国际社会，真有点笑傲江湖唯我独尊的真理教教主的派头。拿 300 亿美金收买英国，以失败告终。

中共与习还是暴力加金钱那一套，忘记了世界上还有精神存在，还有正义存在，中共终究会彻底失败。习，满脑子暴力思维，真像暴力五毛党的作派，狂妄之极，是最后的疯狂，中共将在狂妄中死去。

五毛要好好看清楚什么是世界潮流，**什么是天意**：非洲的共产主义失败，苏联解体，两德统一，共产主义在欧洲崩溃，乌克兰禁止共产党，越南正在去共化，朝鲜摇摇欲坠，大陆风起云涌的抗暴潮。**现在大陆人坐在一起就骂共产党，就算不反党的人也骂共产党，这就是民心，民心就是天意！**共产党垮台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世界的潮流。共产党罪恶滔天，不垮台就没天理了，不被清算就没天理了。“君子不立危墙下”，五毛可得看清楚啊！

共产主义是魔鬼向人间施以的魔咒，可怜的人类受其所害。

马列主义者以建立一个“美丽新世界”为谎言，诱骗人们跟随它行恶。共产主义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大部分推行共产主义事业的人并不是共产党，也没有对共产主义深入了解，他们是列宁口中的那群“有用的白痴”。看到马列主义者如此丑恶，我以一己之力写成此书，试图拆解这个美丽而丑恶的谎言。本人能力有限，希望读者包容，更希望这是抛砖引玉，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让世界看破共产主义美丽且丑恶的谎言，

马列主义的荒谬是整个理论体系的谬论，它的根是辩证法。所以，本人强烈推荐，在阅读《马克思谬论》的同时，也请阅读本人的《人世间最大的谎言——辩证法》、《日本文化的……》。本人还有许多能让人耳目一新的书，大约能写十几本，希望各位看客，常来这里看看：<https://readmoo.com/contributor/92680>

非常遗憾的是，如果《金剑：马克思谬论》与《金剑：人世间最大的谎言——辩证法》能在 100 年前出版，将极大地抵制马克思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没有中共的胡闹，日本人也不敢侵略中国，中国就可以躲过日本侵略与共产党占领这中华民族近代二大巨难！亡羊补牢，我们只能寄托于将来！把这两本书传播开来，把中国及世界共产主义打败，让人类迎来光明的明天！

说起来，共产党总是觉得自己聪明，其实共产党是够笨的，竟然相信得了马列主义与辩证法如此荒谬的理论，他们一旦发现一辈子所信仰的东西是如此的荒谬，不知如何面对？

中国人应该搞一场文化反思运动，一旦这样做了，马列主义与辩证法会垮台，接着儒家文化回归，日本文化也会垮台，如果还能把纳粹与 I S I S 搞垮，那就更好了，人类从此远离这些有毒文化，人类就会有美好的未来。人类应该经常搞文化反思，不断地去除恶质文化，人类才会有美好的未来！最需要文化反思的是日本，这是拯救日本民族最好办法，否则，日本民族没有未来！

其实，打败共产党很容易，把共产党员抓起来，然后给他们每天看《九评》、《延安日记》、《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红太阳是如何升起来的》、《抗战时期中共之扩张策略》、《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来自日谍的回忆与档案》、《欺世大观》的油管视频、《庐山会议实录》、《中共壮大之迷》、《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二十世纪俄国史》……再加上《马克思谬论》、《人世间最大的谎言——辩证法》等对共产党理论的批判，看着看着，共产党员就变成反共义士。对付共产党间谍也是如此，保证间谍一个个叛变，一个个变成共产党的掘墓人。其实，共产党已经知道了这个灭共的办法，所以，共产党国家都是控制媒体、废除出版

自由与言论自由，共产党为了保命行恶政。

再大的泡沫，终有破灭的那一天，马列主义理论是巨大的谎言泡沫，共产主义也是幻想泡沫，终破灭之时，只是人类，特别是中华民族为此受伤惨重。共产党员们，清醒吧，为了人类、为了中华民族、也为了你们自己。

共产党的最大罪恶，不是在历史上做了多少坏事，当然，它做的坏事是绝对的多，共产党的最大罪恶是，用邪恶的理论为迷惑世人，让世人相互残杀，扯把人类拖向地狱。马列主义不灭，人类就灭亡。

本书引用了不少人的研究成果，多数我都没有列出来，很抱歉。今天我把书中所引用文章的作者列出来，明天中共的特务就去绑架他们，给作者带去不必要的祸端。由此，特意向未出原作者的事向作者道歉，也感谢他们的好成果。

金剑的《马克思谬论》系列书籍：

《马克思谬论》

《人世间最大的谎言——辩证法》

《两岸统一该用什么国号》

《中共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来发动内战》

《中华民族之觉醒与反抗》

《简述中共谎言录》等。

还有其它书籍：

《日本文化的十大特质之八、侵略性——八紘一字》

《通共媚日的二二八 可怜的外省同胞》

《日殖台七大罪》等。

欢迎各位观看及评论。

金剑

2022 年 11 月 2023 年 12 月修改

版权声明

《墓碑》作者杨继绳先生在北京大街上碰到销售盗版《墓碑》的人，销售者说：这个是写大饥荒的，写的可好了，看了都哭。杨先生把封面折页打开说，这个人就是我。摊主大惊失色随即道歉。杨先生问这个卖得好吗？销售者说还不错，又是道歉又是感谢。两个人站着聊了半天。杨先生最后说，这就是中国很荒谬的地方，一个作者与盗版卖家居然能够如此和平相处。

《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作者张戎女士也在北京遇到同样的事情，她也与盗版卖家和平相处，并鼓励他们盗版。

如果有某一天，我的书在中共国有人盗版，我会对他们千道谢万感激，因为他们在这件事情上很伟大，中国的未来靠他们。

本书版权属于作者，未经允许，不得篡改，可以随意引用，可以不注明出处，可以自行印刷、赠送与销售。

特此声明。

金剑

2022 年 11 月

2023 年 12 月修改